

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影響因素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factors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指導教授：張景安 博士

研究生：李學昌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謝辭

研究所生涯經歷的二年半，絕對是我人生中最為充實也最為寶貴的時光，很榮幸能在政大豐沛的學術資源當中成長。回首過去的求學歷程，時常會經歷許多困惑、徬徨的艱難時刻，但總能受到師長、同學與家人的支持與鼓勵，使我能不斷地堅持在學習的路上。在這些歲月裡，我曾受到太多太多人的幫助，心中的感激早已溢於言表。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總是尊重我的任何決定，並且給予我無條件的支持與關愛。每次當我徬徨無助時，我的父母總是成為我最堅強的後盾，推動我努力不懈地勇往直前。

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張景安老師，謝謝老師在撰寫論文的這段期間，給予我大量且深入的寶貴意見，並且不厭其煩地幫助我修改論文裡的一切內容。同時也非常感謝景安老師在學習過程的鼓勵與啟發，引領我有今日的成果。

感謝口試委員崔進揆老師與陳秉達老師，從我的論文計畫大綱審查到最後的碩士學位口試，兩位老師往往給予我非常精闢且寶貴的建議，使我能夠在茫茫的學術大海中，找到正確的前進方向，非常感謝您們的幫助。

感謝傅怡萱老師、王經仁老師、蔡源林老師、李珮玲老師、魏百谷老師、顧朋老師。在政大學習的過程裡，感謝這些師長們對我的啟發與關愛。另外，我要感謝我的研究所好友們，友綸、韻如、材瀚、雨珊，有你們的陪伴與相互扶持是我成長的動力。感謝芃芃、映羽、安育、茵茵、浩語、柏育大哥，謝謝你們讓我的研究生涯精彩無比。

感謝印尼的師長 Dugis、Johnny、Safril、Sarah 對我的教導與關懷，也感謝一起學習印尼語的夥伴詠心、亮好、品鴻、壁綺、維容，謝謝你們對我的鼓勵與幫助。我也要感謝義凡、詠琪、博宇、孟航、佩文、俐蓁、郁璇、彥均、宥辰，謝謝你們在我撰寫論文的歲月裡為我加油打氣。最後，我要感謝三一寰宇文化協會的執行長以及在天上的執行秘書，謝謝從小的灌溉，造就今日的成長茁壯。

研究所的生涯告一段落，接下來，我仍會帶著勇氣與不畏挫折的精神，繼續朝未來的人生旅途邁進。能有今日的結果絕非憑一己之力就能辦到，在這段過程裡，我受到數不盡的協助與照顧，我要再次向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表達感謝。謝謝所有曾幫助我、關心過我的人，因為有你們而使我成為更好的人。

學昌 2021.01.29. 於木柵

摘要

本文將分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以下簡稱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變化之影響因素。自 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沙國與以色列隨著中東局勢的變化，相應地發展出不同的外交互動模式。因此，本文將從 1948 年至 2017 年為止，在大約七十年的時間脈絡中，分析沙以外交關係變化的影響因素。此外，本文將以利益平衡論(balance of interest)做為分析的理論基礎，再輔以內部因素、區域因素與外部勢力三大面向作為分析的切入點。

本文首先根據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脈絡，將其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 1948-1979 年、1979-2001 年與 2001-2017 年。再者，將利用內部因素聚焦於沙以政權穩定與意識形態之分歧，以區域因素分析沙以對區域強權變化所採取的外交政策，最後，則探討國際勢力如何對沙以外交關係產生影響。透過三大面向的分析後，本文將再使用利益平衡論對沙以外交關係的變化因素提出解釋，探討沙國與以色列究竟是採取制衡、扈從，亦或是其他類型的外交戰略來處理雙方外交關係之改變。

最後，本文發現 1948-1979 年沙以外交關係大多受區域因素所主導，因為此時國家安全的責任主要由沙國與以色列各自承擔。然而，在 1979-2001 年以及 2001-2017 年，沙以外交關係則受外部勢力之影響較深，原因在於有很大部份的安全責任轉移至美國，此外，沙以外交關係中的合作遠大於對抗，意識形態的障礙雖存在，但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較小。

關鍵詞：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外交關係、利益平衡

Abstract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Since 1948,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active molds following the changes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Middle East. Thus, the thesis will expla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factors from 1948 to 2017, within about 70 years. Also, I will apply the theory of balance of interest for the base of explanation and use the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internal factor, regional factor and external factor to be the point of access.

First of all, the thesis i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nd categorizes it to three periods which are 1948-1979, 1979-2001 and 2001-2017. Moreover, I will use internal factor to focus on the stability of regime and the conflict of ideology and utilize regional factor to analyze Saudi and Israel's reaction toward the power change of regional countries. Finally, I will research how the external factor influences Saudi and Israel'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the thesis will use the theory of balance of interest to submit explanations of the change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 will make it clearer that whether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adapt balance or bandwagon or the other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audi and Israel'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s influenced by the regional factor in 1948-1979 because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responsible to themselves. However, in 1979-2001 and 2001-2017,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s influenced a lot by the external factor. The reason is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transferred to the United State in large part. Also, the cooperation is stronger than confrontation in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e obstacle of the conflict of the ideology still exist but it doesn't impact a lot on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Keywords: Saudi Arabia, 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alance of interest

目次

第壹章：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	4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7
第五節 分析框架	17
第六節 章節安排	21
第七節 研究限制	22
第貳章：1948-1979 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	23
第一節 1948-1967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24
一、內部因素	24
二、區域因素	29
三、外部勢力	33
四、結論	37
第二節 1967-1979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38
一、內部因素	38
二、區域因素	42
三、外部勢力	44
第三節 結論	46
第參章：1979-2001 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	49
第一節 1979-1991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50
一、內部因素	50

二、區域因素.....	54
三、外部勢力.....	58
四、結論.....	62
第二節 1991-2001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63
一、內部因素.....	63
二、區域因素.....	66
三、外部勢力.....	67
第三節 結論.....	70
第肆章：2001-2017 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	72
第一節 2001-2009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73
一、內部因素.....	73
二、區域因素.....	76
三、外部勢力.....	79
四、結論.....	82
第二節 2009-2017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	83
一、內部因素.....	83
二、區域因素.....	85
三、外部勢力.....	87
第三節 結論.....	90
第伍章：結論	93
研究建議.....	96
參考文獻.....	97

圖次

圖 1 利益平衡論之國家類型光譜圖.....	19
圖 2 第一次中東戰爭傷亡人數對照表.....	26
圖 3 國際油價圖(1950-2010)	39
圖 4 沙國人均 GDP(1970-2015).....	40
圖 5 以色列人均 GDP(1960-2010).....	41
圖 6 1948-1979 年沙以關係影響因素示意圖.....	48
圖 7 國際油價圖(1950-2000)	52
圖 8 美國歷年對中東軍售圖.....	59
圖 9 美國援助以色列圖.....	61
圖 10 沙國武器進口趨勢圖.....	86
圖 11 1979-2017 年沙以關係影響因素示意圖.....	92

第壹章、緒論

一、前言：

本文將針對以色列自 1948 年至 2017 年，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以下簡稱沙國）之外交關係進行研究。以色列自 1948 年建國後，大幅改變中東地區的國際情勢。冷戰時期的兩大世界強權美國與蘇聯在以色列宣布建國後，隨即承認以色列，因此確立以色列的獨立地位。然而，以色列建國後旋即遭受多個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但戰爭卻由以色列獲勝，大量巴勒斯坦難民被迫逃離家園，阿拉伯人將此稱為大災難，從此開啟難解的以巴問題。在往後的數十年間，以色列與周圍阿拉伯國家分別爆發多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緊密牽動國際局勢的變化。

沙國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為阿拉伯半島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東臨波斯灣(Persian Gulf)，具有豐沛的石油資源。截至 2019 年，沙國的石油出口量排名全球第 2，高達 1 天 1241 萬桶(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9)。此外，沙國身為伊斯蘭發源地，聖城麥加與麥地那均位於其領土內，在伊斯蘭信仰乃至阿拉伯世界享有崇高的地位。瓦哈比主義(Wahhabism)¹與沙國政治相結合，導致沙國積極實踐伊斯蘭教育，大力向外傳播伊斯蘭的意識形態，漸成為沙國重要的軟實力²，進而對所有穆斯林國家產生深厚的影響 (Peterson, 2002 ; Bronson, 2006)。

儘管沙國與以色列由於官方的敵對立場，至今從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隨著中東地區的權力變化及國際關係的變動，沙以之間的外交關係並非保持恆定，反而隨著不同時期的區域和國際變化而影響雙方的外交發展。另一方面，沙以由於以巴問題，致使沙國官方對以色列的態度必須強硬，堅決不承認以色

¹ 興起於 18 世紀的原教旨伊斯蘭主義，日後並與沙烏地家族結合，成為沙國的統治合法性基礎。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Wahhabi>

² 由 Joseph Nye 所提出，指國家除了軍事與經濟之外的力量。透過吸引力、價值觀以及道德使他國願意服從要求。<Joseph Nye (1990). Twentieth Anniversary. *Foreign Policy* No. 80, pp. 153-171>

列的存在正當性。沙國在處理對以關係上往往格外謹慎，任何的接觸都得私下進行，以免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彈威脅沙國的正統性。此外，沙國在安全戰略上相當大程度的依賴美國，但美國的中東政策卻始終堅定支持以色列，使沙國不得不面對政治上的現實。倘若堅持敵視以色列，對於自身的國家安全與沙美關係將無法有正向發展。

對於以色列而言，擁有強權美國的支持固然重要，但若能獲得其他中東國家的支持，特別是中東區域大國—沙烏地阿拉伯，將會更加穩固以色列位於中東的安全地位。以色列近年來逐漸在外交、經濟等議題上與沙國採取合作，除了能鞏固以色列的生存之外，還能減少外部威脅以及確保能源穩定。在不威脅以色列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以色列始終盡可能地尋求與沙國接觸的機會，藉此提升以色列的安全。

本文試圖從沙以互動的脈絡中，釐清沙國與以色列自 1948 至 2017 年，外交關係的影響因素為何。探討何種因素促使沙國與以色列在不同時期，展現出不同的外交關係。本文之起始年份由 1948 年以色列建國至 2017 年為止，原因在於沙以外交關係也受美國勢力所影響。儘管川普由 2017 年執政至今，但其任期尚未結束，並且暗藏許多變數，倘若貿然分析恐因變異太大而與現實失真。因此，截至 2017 年歐巴馬任期為止，剛好形塑出一完整的時間序，能對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作出可靠、真實的探討。最後，本文將採用三大面向—內部因素、區域因素、外部勢力，以此分析沙以不同時期之外交關係的變化。

二、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文之研究問題為「影響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的因素是什麼」。回顧過往的研究，大多將以色列與沙國的外交關係，看作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多強調沙以的對立關係。較少文獻以沙以為中心探究「什麼樣的因素影響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之變化」。

本研究將分析沙國與以色列之外交關係，期望能找出沙以外交關係背後所隱藏的影響因素。同樣身為中東強權的沙國與以色列，維持互不承認的外交關係，給予大眾敵對的認知。然而，隨著全球政經情勢的變化，沙以關係未必永久處於對抗，逐漸產生更多接觸、合作、衝突與利益盤算的可能。期望能藉由本文，釐清何種因素影響沙以之外交關係，使讀者以見樹又見林的方式來理解複雜的中東局勢。

目前多數文獻多聚焦於沙以的衝突面向。然回顧過去的歷史後，筆者認為沙以之互動關係並非只有衝突，反而有許多合作的行為發生，但目前並未有足夠的討論對這一現象提出解釋。多數對沙以合作的文獻僅著重於 2003 年後伊朗崛起、2010 年阿拉伯之春以及 2015 年伊朗核協議對沙以關係帶來的影響。這樣的研究脈絡僅關注 2003 年以後的中東局勢，海珊政權垮台固然可以比較出伊朗崛起對沙以關係的影響，然而沙國與以色列自 1948 年後旋即不斷地在不同的中東局勢下產生互動，過於強調 2003 年後的情勢不免忽略過去 55 年來沙以關係的競合。因此，本文將針對此一不足之處提出討論，將嘗試對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提出解釋，並將時間序延伸至 1948 至 2017 年，透過自以色列建國至美國歐巴馬政權為止，剛好形成一完整的時間序列，足以審視沙以兩國歷年來的局勢變化，如何影響沙以關係的競合發展。

此外，過去研究多將海灣國家視為一個群體，這樣的看法是基於海灣國家內部的同質性相當，並大多採取一致的外交政策。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過度簡化海灣國家間的差異性，易產生以偏概全的謬誤。反之，應將海灣國家區分出來，探討以色列與各別海灣國家的外交關係。因此，本文將補足此一不足之處，決定將焦點置於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發展。由沙國與以色列自身的國家特點與雙邊之互動為切入點，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最後，當前主流論述多認為沙以關係主要受以巴問題的影響，進而形塑出沙以外交關係的互動模式。然而，以巴問題或許仍對沙以外交關係產生牽制，但絕非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諸如區域變化、外部勢力等因素對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反

而更甚以巴問題。藉由本文之分析，將帶給公眾更深入的角度看待沙以之間的交往，並試圖破除以巴問題為沙以關係中最重要影響因素的迷思。

本文之研究結論為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到現實利益的影響較深，反觀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如以巴問題，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較弱。沙以面對物質利益的改變時，通常能輕易跨過意識形態的障礙採取合作。

三、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將分為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回顧過往沙國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以梳理沙以兩國外交政策的成因。第三部分將針對沙以之雙邊互動關係，藉由過去的研究脈絡進而理解沙以互動的發展模式。

(一) 沙國外交政策之研究

本節將探討沙國外交政策之過往文獻，主要可將過去沙國外交政策的研究面向分為三大主題。首先是沙國內部因素，過去許多學者根植於沙國的國家特點，以此角度對沙國的外交政策展開研究，較著重在沙國國家內部因素與外交決策之間的關聯。另一面向則是奠基於地緣政治，部分學者將地緣政治作為影響沙國外交決策的因素，特別強調沙國與區域強國之間的互動，間接形塑出沙國的外交政策。最後一面向則根基於沙美關係，在此面向下，過往研究特別強調美國對沙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因而有大量文獻特別針對沙美關係進行探討，此面向將沙美關係變化視為重點，導引出沙國外交政策之改變。

1、 沙國內部因素：

學者 L. Carl Brown 與 Mai Yamani 針對沙國本身的內部因素行分析，認為沙國外交政策受到四種因素互動而形成，分別為宗教因素、民族因素、石油因素、安全因素。宗教因素的重點在於沙國的特殊性。沙國國王身為兩聖地守護

者，代表正統伊斯蘭，因此在宗教層面上，沙國的地位是高於任何其他伊斯蘭國家，同時，沙國有義務確保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能順利進行朝覲，保護伊斯蘭信仰因而成為沙國很重要的外交政策(Brown, 2004 ; Yamani, 2008)。沙國也以伊斯蘭守護者的身份向外輸出伊斯蘭意識形態，如廣建清真寺、資助伊斯蘭教育與阿拉伯語傳播，以及援助較貧窮的伊斯蘭國家(Yamani, 2008)。第二，民族因素的含義是沙國將促進阿拉伯民族團結視為重要目標。沙國認為阿拉伯民族應團結，共同對抗非阿拉伯民族的威脅，如抵制以色列、對抗伊朗。第三則是石油因素。沙國石油蘊藏量佔世界百分之二十五，對世界能源影響極大，此外沙國國有石油公司—沙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³完全置於沙國王室的控制之下，能夠以此控制生產，進而控制油價。沙國同時也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 P E C)當中佔有領導地位，能夠聯合所有產油國一同控制石油產量而影響油價(Brown, 2004 ; Yamani, 2008)。最後，安全因素很大程度地影響沙國之外交政策。冷戰時期，中東的許多阿拉伯共和國，對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國家並不友善，同時他們都較傾向蘇聯，與親美的沙國敵對。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⁴後，沙國更逐漸面臨伊朗的威脅。同時，沙國東部什葉派省份的暴亂，導致沙國政權穩定受到威脅，種種因素促使沙國大幅改變外交政策。基此，上述四種影響沙國外交政策的因素，能夠賦予本文分析沙以關係的切入面向，特別是在沙國的對以政策上，能利用此四種要素分析沙國對以政策的原因。

2、地緣政治：

部分學者如 James Wynbrandt、F. Gregory Gause III 以地緣政治的觀點解釋沙國的外交政策。在中東地區的權力結構上，沙國不斷面臨區域強權的挑戰。隨著不同的歷史進程，沙國所面臨的區域強權導引沙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向。如

³ 沙烏地阿拉伯國有石油公司，為目前世界上探明儲量最豐富石油產量最多的公司。
<https://www.aramco.com/en/who-we-are/overview/our-history>

⁴ 1979年由何梅尼領導推翻伊朗國王巴勒維，創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Iranian-Revolution>

1950-1970 年代埃及與沙國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促使沙國的外交政策重點置於和埃及的權力平衡(GauseIII, 2011)。1970 年代後，沙國面臨的區域強權為伊拉克與伊朗，這樣的變化又使得沙國外交政策致力於處理沙國與兩伊的關係。利用區域層面的面向解釋沙國的外交政策會發現，沙國的目標是追求區域安全最大化，絕不允許中東地區有潛在的強權威脅沙國的國家安全。特別在冷戰以後，地緣政治成為沙國外交政策的主軸(Bronson, 2006 ; GauseIII, 2011)。在過去的冷戰時期，沙國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國，宏觀來看，可視為國際體系的附從關係。冷戰時期中東的許多阿拉伯共和國，對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國家並不友善，因而與沙國在各個層面進行對抗。美蘇之間的競爭角力貫穿中東權力平衡的發展過程。然而，自冷戰解體後，地緣政治成為主導沙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學者 Joseph mcmillan、Gwenn Okruhliku 以及 Trita Parsi 分別將研究焦點置於地緣政治的研究面向，較側重於沙國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如伊朗、伊拉克）。更有許多文獻探討伊朗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波斯灣戰爭與海珊政權被推翻等事件對沙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將區域事件置為分析主體，進而對沙國外交政策進行研究。

3、沙美關係

有許多學者以沙美關係為面向分析沙國外交政策，學者 Rachel Bronson、Yakub Halabi 以及 Michael Mandelbaum 將核心論述置於沙國與美國的互動關係，特別是 1945 年後，美國大舉參與中東事務，並與沙國建立同盟關係的發展。至此，美國中東政策對沙國外交政策逐漸構成強大影響。沙國身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國，在經濟與軍事層面上與美國有深厚的關聯，因此美國中東政策的一舉一動，均對沙國外交政策造成連帶的變化。在冷戰時期，沙國是美國在中東的緊密夥伴，除了保護石油資源外，也可藉由沙國的影響力遏止蘇聯的擴張(Bronson, 2006 ; Halabi, 2009)。隨著蘇聯的威脅消失，美國對於中東的處理方式由國際層次轉為區域層次，然而沙國對美國的重要性，並不隨著冷戰結束而消失，反而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動而產生不同變化。美國仍必須維護沙國的國家安全，因為大量的

石油資源對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發展佔有關鍵地位(Brown, 2004 ; Bronson, 2006; Mandelbaum, 2016)。沙美關係的穩固更能加強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的領導地位。此外，學者 F. Gregory Gause III 認為，隨著沙美關係的進展，美國對沙國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防止沙國遭受周邊國家的威脅，促使沙國逐漸依賴美國所提供的保護。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美國與沙國的關係由戰略關係往商業關係靠攏。冷戰的結束使美國不必再擔心中東地區的國家靠攏蘇聯，美國與沙國的關係不再將戰略關係擺在第一位，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商業關係。沙國每年均向美國購買大量武器，同時美國在沙國石油工業上扮演顧問、策略聯盟的角色。在後冷戰時期，石油的需求逐漸擴大至亞洲、非洲、中南美洲，使沙國與美國有更大的合作空間(Bronson, 2006 ; Halabi, 2009 ; GauseIII, 2011)。

儘管沙美關係在軍事、經濟、外交等領域展現出緊密的合作關係，但探究其內涵仍發現，沙美關係中暗藏許多不穩定因素。因此，有部分學者以沙美關係當中的矛盾因素作為研究面向。學者如 Rachel Bronson、Yakub Halabi 指出「沙國困境」之問題，將是造成沙美關係不穩的一大因素。有鑒於沙國在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地位，沙國必須維持其正統性，不得與西方國家過從甚密，以免遭致保守派反對。另一方面，沙國欲維持其中東強權之地位，勢必要依靠美國提供的保護，以及石油美元的機制確保統治基礎。在如此情勢下，沙國必須在親美與反美勢力之間拉扯，倘若過度傾向任何一邊，都不利於沙國王室的統治(Bronson, 2006 ; GauseIII, 2011)。此外，在沙國困境的脈絡下，沙國王室必須妥善處理與極端主義之間的關係。沙國藉由瓦哈比教派建國，以宗教意識形態培育出許多極端主義份子。長久以來這僅被視為沙國國內體制的一環，並未對其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然而，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當局對沙國的態度漸成為影響沙美關係的重要因素(Bronson, 2006 ; Halabi, 2009 ; GauseIII, 2011)。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開展，對抗恐怖主義不僅限於干涉沙國內政，反而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環。因此，沙國境內

許多被認為與恐怖主義發展有關的資金和團體，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暫緩或停止，足以顯示沙國內政也成為美國外交政策所看重的一環。

藉由過去的研究面向，能夠由內部、區域、國際的層次由微觀至宏觀的角度理解沙國外交政策之發展，然而，卻也發現部分可補強之處。沙國內部因素的研究面向，過於偏重沙國國內因素與外交政策間的關聯，但綜觀沙國歷史，筆者發現其內部因素的變動不大。自沙國建國至今，沙國王室在宗教、民族、石油、安全等要素上的立場幾乎都保持一致。但是沙國的外交政策卻非常具有彈性，更時常因應中東局勢變化而立刻做出改變。因此，內部因素與外交決策的變化不一致，使得此面向無法明確解釋沙國外交的改變過程。此外，沙國與美國的互動過程也在沙國的發展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倘若僅強調內部因素將容易忽略外部勢力對沙國的影響。

地緣政治面向的遺漏在於，其多側重於沙國在面對威脅後的反應，亦即將研究重點聚焦於衝突與制衡。然而，國家間的互動並非只有衝突與制衡。國家面臨機會時，有很大的可能選擇採取合作甚至是扈從。此外，多數的衝突也大都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若一味強調衝突，將會忽略和平解決的過程。另外，地緣政治的研究面向大多聚焦於三大面向，沙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沙國與海灣國家的關係、以及沙國與鄰國間的關係。然而，以色列是在某種程度上對中東極具影響力的國家，歷次的以阿衝突往往重塑中東的權力平衡，但以色列卻較少在此研究面向中被提及。

沙美關係研究面向僅將沙國簡化為一般的理性國家行為者，將國際關係理論中，對國家行為的論述套用至沙國。儘管此論述仍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沒注意到沙國內部因素也可能對沙國外交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實為國際關係面向的不足之處。此外，多數沙美關係研究面向之文獻，常將海灣國家視為一整體，並未

區別各海灣國家在對美關係上的不同，容易忽略不同的海灣國依然會導引出不同外交政策此一事實，因此將其分別探討實屬必要。

(二) 以色列外交政策之研究

以色列外交政策之研究可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國家安全、美以關係以及以阿衝突。多數學者以三大面向，探討以色列外交政策的不同發展，進而對其外交政策進行研究。

1、國家安全：

以色列外交政策最核心內容，就是維護以色列的生存地位以及確保海外猶太人的安全(Brown, 2004)。以色列自建國後，遭受阿拉伯國家多次攻擊與長年的孤立，使得以色列必須積極向外拓展盟友關係，才得以繼續保持生存地位。綜觀大部分中東國家，均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刻成為以色列最大的威脅，從外約旦、埃及、沙國、伊拉克、伊朗等，無一不對以色列造成安全威脅，因而有大量的研究聚焦於以色列如何平衡這些安全威脅。此外，以色列與國際強權的關係也是國家安全脈絡下的研究重點。Brown 指出以色列的地緣位置使其在建國初期，旋即被西方大國所承認。作為一個中東地區的新國家，大國若能與以色列維持良好外交關係，必能以此為跳板，將勢力延伸至中東。學者 Gorvin Yosef 認為建國初期最支持以色列的大國是蘇聯。蘇聯為排擠英國在中東的勢力，全力支持以色列，對其輸出武器(Yosef, 1998)。蘇聯希望能將以色列培養成為進入中東的入口，擴大蘇聯影響力，同時以色列也希望蘇聯能放寬境內猶太裔人民移民以色列的人數限制(Yosef, 1998)。然而，時任埃及總統納瑟(Nasir)於 1950 年代與蘇聯交好後，蘇聯開始援助以埃及為首的阿拉伯國家，此舉使以色列備感威脅，開始轉往與美國發展關係(Seliktar, 1994)。學者 Ofira Seliktar 認為以色列外交政策在 1960 年代

開始轉向，1967 年的六日戰爭使以色列取得全面優勢，並拒絕聯合國 242 號決議，不願返還 1967 年以前的土地，因此與蘇聯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關係降到低點。此時正值美蘇冷戰的高峰期，美國決定藉此契機，將以色列轉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夥伴，至此開啟以色列親美的外交路線(Mansor, 1994)。

2、以阿衝突：

有許多學者透過以阿衝突的面向分析以色列外交政策，如 David McDowall, Gregory Harms, Todd M Ferry, James L. Gelvin 以及 Cody Smith 認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主要受以巴問題所影響。自 1948 年建國以來，以色列視維護生存為最重要之外交政策，防範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進犯是以色列的首要目標。許多文獻將焦點擺在歷次的中東戰爭，研究以色列如何以小博大戰勝阿拉伯國家的進犯。以阿衝突歷經多次調停、衝突，終究無法達成最終解決方案，主要關鍵點在於以色列當局對於領土問題的態度非常強硬，絲毫不願意退讓。在冷戰結束後，美以關係不因冷戰結束而有所改變，冷戰的結束反而促使美國更加依靠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優勢，處理其他複雜的中東事務。在以巴和談的過程當中，以色列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持不肯退讓佔領區的土地。儘管過去的美國當局，或多或少的要求以色列重新思考佔領區的問題，以色列當局卻絲毫不受影響。以色列也憑藉著其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在華府的政治影響力，每年從美國獲得大量的經濟和武器援助，更加奠定在中東的優勢地位，更有利於以色列在以阿衝突上的主導地位。

3、美以關係：

部分學者如 Colin Shindler、Nadav Safran 以及 Jim Zanotti 特別強調美以關係在以色列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探究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主要可分為二種因素；道德因素及戰略因素。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給予猶太人成立猶太國家的基礎。此外，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喚起國際間的同情，因此在二戰結束後美國

主流民意支持猶太人建國，大量的猶太裔難民遷往以色列。以色列也是目前中東地區較為穩定的民主國家，多年來實施民主政治體制，與美國的民主政治和意識形態較相近。在宗教層面上，美國多數基督教保守派認為以色列是保護猶太—基督教信仰不受激進派伊斯蘭影響的重要力量(Shindler, 2014)。

部分學者如 John Mearsheimer 以及 Stephen Walt 則將美國的以色列遊說作為研究美以關係的面向之一，以此探討美以關係以及美國對以政策的發展。以色列遊說團體在美國具有強大實力，足以撼動美國的外交決策。導致美國當局過度被以色列遊說牽制，此力量能夠催生出許多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短期來看確實有利於以色列與美以關係，但長期來說，卻傷害到美國的利益以及美國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更不利於以色列在中東的安全。

更多的學者認為，戰略因素真正對美以關係發揮決定性影響。雙方在中東地區均面臨共同的敵人，例如伊朗、敘利亞、真主黨、哈瑪斯、以及海珊時期的伊拉克，因此促成全面性戰略合作關係。然而，美國不樂見以色列在中東地區與其他國家開戰，因此除了強烈武裝以色列，讓其具有足夠軍事實力震懾其他阿拉伯國家外，美國也利用大量的對以援助，形塑出對以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能控制以色列不輕易與其他中東國家開戰(Shindler, 2014)。同時，美以雙方共享情報機制，防範戰爭與恐怖攻擊。美國更在以色列部署武器作為實驗場，每當以色列遭受攻擊時，可以測試新防衛系統的效能。在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方面，美以開啟戰略合作關係，美國的對以政策在於維持以色列的軍事品質優勢，亦稱為 QME (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美國認為軍事品質是相對的，為維持以色列的優勢，因此不敢將更先進的武器賣給其他阿拉伯國家。QME 間接影響美國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這使其他阿拉伯國家不滿，認為以色列過度誇大阿拉伯國家的威脅跟能力。然而，近年來遜尼派國家跟以色列都面臨了伊朗的威脅，因此阿拉伯國家漸漸地增加與美國的軍售數量(Zanotti, 2018)。

透過根基於國家安全、以阿衝突與沙以關係的研究面向，可在以色列的歷史脈絡下，清楚理解其衍伸的外交政策制定模式。然而，卻仍有些許可補強之處。

其一，過往之研究面向多聚焦於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突面向。國家安全面向對以色列的外交研究勾勒出精確的圖像，以色列的特殊之處在於，鮮少有一個新成立的國家，會在建國之初立即遭遇如此強大的挑戰。但以色列不僅沒有滅亡，反而在一次次的威脅當中變得更強韌。然而此面向仍有些許不詳盡之處。在國家安全的架構下，多數文獻將重點側重於以色列平衡威脅的政策，對於研究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互動上，往往只偏重衝突。但筆者發現以色列並未一味的仇視阿拉伯國家，反而願意積極地拓展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進而產生合作。然而，在以阿合作的面向上，較少有文獻對其進行研究，探究合作的動機與影響因素。

其二，美以關係固然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有深厚的影響，但並非唯一的影響因素。筆者認為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也是形塑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因素。然而相較之下，卻較少有文獻針對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作為研究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面向。因此，本文選擇將以色列與沙國之外交關係作為研究焦點，以彌補此一不足。

其三，多數文獻並未將阿拉伯國家加以區分，反而將其視為一整體，這樣的思維可能忽略阿拉伯國家自身的特殊性。許多研究只將以阿衝突簡略的分為二大陣營，即以色列與阿拉伯陣營。然而，這樣的二分法明顯忽視各個阿拉伯國家的獨特之處。在以阿衝突的框架下，所有阿拉伯國家均打著反對以色列的大旗，然真正的動機與利益盤算卻大相徑庭。為能更詳盡地分析以阿衝突，筆者認為應該將以色列與個別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抽離出以阿衝突的框架之下，以進行個別研究，才能對以阿衝突有更真確的理解，不應僅僅將其分做以色列與阿拉伯二大陣營。

(三)、沙國與以色列雙邊關係之研究

沙國與以色列雙邊關係之研究可概分為二種研究面向。較早期的文獻通常聚焦於沙國與以色列之間的政治對抗，大多分析沙國如何與阿拉伯國家合作，共同打擊以色列並探討以色列為求生存的反制手段。然而，近年來的文獻，則多側重於沙以間的權力平衡變化，特別在伊朗崛起、阿拉伯之春等事件的餘波後，沙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漸漸發生轉換。

1、沙以間的對抗

部分學者針對此主題的研究面向，主要著重於沙國與以色列之對抗關係。自以色列建國以來，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一直保持敵對關係。許多文獻將研究重點置於沙國如何與阿拉伯國家一同打擊以色列，包含歷次的中東戰爭與沙國如何實施對以色列的經濟抵制(Feiler, 2011)。隨後，1973 年後獲得大量影響力的沙國，躍升至阿拉伯世界的領導角色，從此由沙國為首的阿拉伯國家，繼續抗衡以色列，形塑出不同的競合關係。總結來看，過往大量的文獻旨在研究，沙國與以色列之間非武力的對抗關係。海灣國家沒有如埃及與伊拉克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對以色列發動實體戰爭，然而，他們卻使用經濟抵制和意識形態做為對抗以色列的主要手段(Feiler, 2011)。

2、沙以權力平衡

部分學者則觀察到沙國與以色列之間的秘密關係，利用沙國與以色列的互動面向闡述雙方之外交關係。學者 Kristian Ulrichsen、Ian Black 認為自伊朗 1979 年革命後，沙國之安全受到強烈威脅。因此，由權力平衡的觀點來看，沙國為首的多個海灣國家，必須開始尋求與其他盟國合作以平衡伊朗。以色列逐漸成為最好的選擇，因為其不僅受到伊朗的威脅，也同為美國陣營。因此，學者多針對海灣國家與以色列如何從對抗走向同盟的角度，分析雙方之外交關係。

另外，有學者以國際政治的變化為面向，分析沙以權力平衡的變化。Elisheva Stollman、Arhama Siddiq、Muhammad Abbas、Hassan Asad Khan 以及 Doron Matza 和 Adam Hoffman 認為美國當局在中東地區的角色，以及逐漸崛起的伊朗成為影響海灣國家與以色列外交關係之重要因素。以色列和沙國的關係正經歷重大轉變，有學者認為國際關係不是零和遊戲，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國際關係由冷戰的極端形勢轉變為功能取向(Matza & Hoffman, 2019)。特別在美國的影響力逐漸削弱、阿拉伯之春的美好憧憬幻滅後，以色列跟沙國的關係越走越近，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反而被實用性給取代。相較於伊朗崛起、美國退出中東局勢等近幾年的重大議題，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已不再是海灣國家的優先政策，平衡外部威脅與權力，漸漸成為海灣國家的首要目標。

透過沙以政治對抗以及沙以權力平衡二大面向，可清楚理解沙國與以色列雙邊關係的發展與轉變，然此二面向仍有些許不足之處。首先，沙以之間固然有明顯的對抗態勢，但究其過去的歷史發現，沙以仍在私底下，針對特定的事件以非公開、非官方的方式進行合作，不應過度偏重對抗。因此，在對抗關係之外，筆者認為也應將沙以秘密合作的關係作為研究的目標，才能對沙以外交關係有進一步的理解。

此外，有關於沙以權力平衡的研究文獻，對於伊朗崛起⁵、阿拉伯之春、伊朗核協議等事件上，均有許多文獻以這些重大事件為基礎對沙以外交進行分析。然而，沙以外交上的互動卻不僅止於此。從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以來，沙以間雖未有正式外交關係，但卻時常因中東局勢之變化而有所互動，但探討此主體的文獻甚少，大多僅聚焦於 2003 年後伊朗局勢所帶來的改變。此外，近年來多數文獻對沙以關係的結論，多認為呈現「越來越緊密的外交關係」。然筆者認為，「越來越緊密的外交關係」尚無法精準描述沙以關係的現況。導致國與國關係變化緊

⁵ 2003 年伊拉克海珊政權的覆滅，被認為大幅增加伊朗在中東區域的影響力。
<https://www.cfr.org/timeline/iraq-war>

密的原因有非常多種，如制衡、接觸、豺狼型扈從⁶(jackal bandwagon)、錦上添花型扈從⁷(piling on)、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等。因此，筆者將藉由研究 1948-2017 年的變化，為沙以關係的影響因素做出明確的界定。

結論

回顧過往關於沙以外交關係的文獻後，筆者認為主要有三點需進行補強。首先，多數文獻將研究重點聚焦於衝突面向。儘管沙以兩國確實自建國以來即處於互相對抗的態勢，但回顧歷史便可了解，雙方的外交彈性很大，時常因特定事件而採取秘密合作，並未永遠處於敵對狀態。因此，本文除衝突面向外，將補足沙以利用非官方、非公開方式的合作原因與影響因素，改變沙以兩國永遠只有敵對關係的既定想法，如此便能破除沙以外交關係永遠只有衝突的迷思，更能凸顯出過往研究較少提及的沙以合作關係，且更貼近真實之現況。

第二，對於沙以外交關係之發展，大多數文獻較側重 2003 年之後的中東局勢。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時間序過短，應將其延伸至 1948 至 2017 年以來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之發展，並對每個時期的外交關係做出明確的界定，才能宏觀且清楚地描述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透過本文自 1948-2017 年的分析，能夠梳理沙以外交關係歷年來的關鍵因素，為台灣與沙國、以色列的互動關係上提出適當的應對方式。

最後，目前針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研究都將海灣國家視為一體，多數研究以海灣國家均採取一致的外交政策為框架，探討與以色列間的關係。然而筆者認為，每個不同的海灣國家均有其重視的國家利益與考量，這些考量會因自身的條件而有所不同，因此較難形成一致的外交政策(Guzansky, 2015 ; Jones & Guzansky, 2017)，卻少有研究將海灣國家分開，個別探討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⁶ 翻譯取自於 <譚偉恩(2006),權力平衡之研究: 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 22 期,p129-165>

⁷ 同上。

筆者認為若將海灣國家視為一體，會容易忽略個別海灣國家之間的差異性，進而導致對海灣國家以及其他中東國家的互動觀點過於單一化。因此，藉由本文之分析，沙以雙方如何在局勢複雜的中東區域內依然保持合作與生存，可作為同樣身處國際熱點的台灣值得參考之處，以維繫我國之生存發展。

最後，根據本文所回顧之研究文獻，主要可總結出三大面向，作為檢測沙以外交關係影響因素的有力工具，分別為內部因素、區域因素與外部勢力。首先，內部因素屬於易於檢測的客觀條件，同時，內部因素與國家實力、政權穩定等條件具有很強的連結。這些條件的變化通常也伴隨著他國或多或少的反應，進而影響外交關係。另外，如同前述文獻回顧所提到，內部因素對沙以兩國之影響甚大。故而，本文將內部因素之變化作為分析沙以兩國外交關係影響因素的面向之一。本文之內部因素將較著重於政權穩定與以巴問題的意識形態，沙以外交關係時常受到以巴問題的發展而產生變化，而政權穩定則攸關沙以兩國核心利益的發展，內政與外交政策的走向多與政權穩定的發展相關。故本文將這兩大原因作為內部因素的主要檢測事項。

第二個面向是區域因素。此處的區域因素將著重於沙國、以色列與其他區域強權的競逐關係，而這樣的競逐關係又會反過來驅動沙以之間的權力平衡。區域因素通常涉及到沙以兩國的安全關係，因而觸發不同程度的權力平衡，為沙以外交關係注入改變。

最後一個面向則是外部勢力。外部勢力之所以成為重要的面向，主要是因為中東區域之發展歷程，通常伴隨著大國角力。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與地緣戰略意義的中東地區，自然成為大國的必爭之地。這也是分析中東地區權力平衡的特點之一，大國對於中東事務的干涉，時常左右中東國家之間的勝敗。倘若忽視大國在此地的勢力發展，便無法清楚看透中東區域之變化。因此，本文也將外部勢力作為分析沙以外交關係影響因素的分析面向。藉由這三種面向分析沙以外交關係，

能夠毫無遺漏地由微觀至宏觀的角度研究沙以外交關係中的影響因素，不會過度側重單一視角，如此也較可能產生中立客觀的研究結果。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主要透過文獻的收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找到所需要的資料，並對文獻做客觀且有系統地描述，建立起對這一主題全面且廣泛深度的了解。本研究主要搜集國內外圖書館、檔案館、數位資料庫的參考資料，以及和本研究重要相關的中英文專書、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集、研究報告、網路資源等資料，針對此一主題進行廣泛的分析與研究。

五、分析框架

本研究將以利益平衡論(balance of interest)作為本文之分析框架，用以闡述沙國與以色列從 1948 至 2017 年間，權力平衡影響其外交關係的基礎。筆者在回顧沙以過往之歷史後發現，沙以外交關係的變動十分頻繁但也具有彈性。為保護國家的生存，沙以均能越過意識形態等障礙，盡力極大化自身的權力發展。不同時期的沙國與以色列，其外交關係常隨著情勢不同而擺盪，特別在中東國家間權力分配不均時，更容易驅使沙以外交關係出現轉變。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以理論為基礎對沙以的權力互動作出解釋。權力平衡理論的發展在過去數十年經歷重大轉變，其中如結構結構現實主義、威脅平衡論更被廣泛運用於解釋權力平衡的變化。但筆者認為在沙以一連串的互動過程中，倘若由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沙以兩國各自在中東區域內佔有一定的影響力，理應採取制衡，但卻無法解釋雙方為何在制衡與合作中不斷擺盪。同樣地，以威脅平衡論的角度觀之，沙國始終沒有放棄對以色列的威脅意圖，然沙以卻依然在不同情勢下進行制衡與合作。顯

然結構現實主義與威脅平衡論均無法解釋沙以的權力平衡發展。因而，回顧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後，筆者認為將利益平衡論作為本文之分析框架最為適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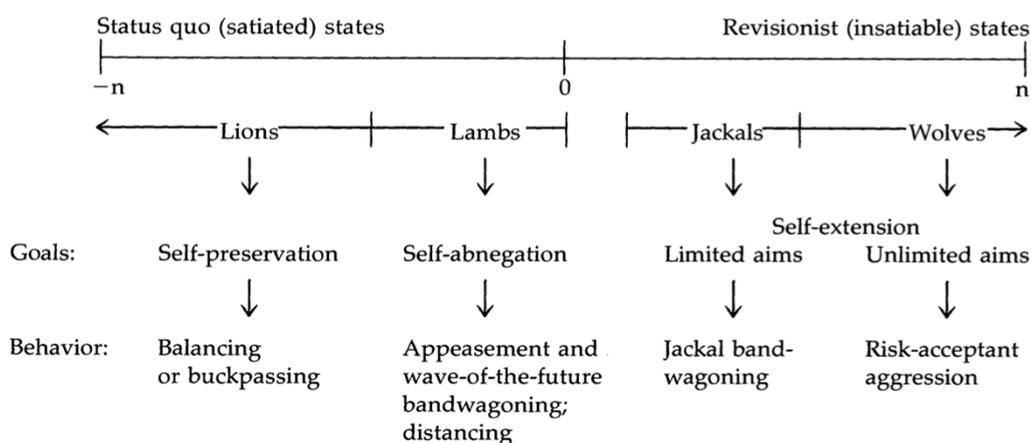
Randall Schweller 針對權力平衡理論進行修正，將利益的觀點導入此理論成為利益平衡論。首先，利益平衡論修正過去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當中對扈從與國家動機的描述。在威脅平衡論中，扈從被視為制衡的相反概念，當國家遭受他國威脅時，無法擁有足夠實力制衡威脅來源就只能採取扈從，因而扈從被視為一種不得不的妥協方式，以此與威脅來源國形成一臣屬關係。基此，威脅平衡論認為，國家若要繼續維持其生存安全，大多會選擇制衡而非扈從，因為扈從僅意味著臣服於威脅來源而終將走向滅亡。然而，Randall Schweller 重新對扈從作出界定，他認為扈從並非僅是國家不得不為之的最後手段。相反地，扈從可以被視為一種出於理性思考後的自由選擇。國家有可能在未遭受任何威脅的前提下，依然採取扈從的外交戰略，只為獲取更多的國家利益。

此外，利益平衡論修正威脅平衡論對國家動機的解釋。威脅平衡論認為，無論國家採取制衡或是扈從，最主要的驅使動機是威脅而非權力不均(imbalance)，但是利益平衡論認為這樣的論述忽略國家主動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反而僅將制衡、扈從等戰略視作被動的行為。例如在 1940 年代，義大利與日本相繼加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並非出於對德國威脅的恐懼，而是看準能因此獲得更多的國家利益。又如 1945 年蘇聯願意向日本宣戰，也不是出於對美國等同盟國的恐懼，而是著眼於日後的潛在利益(Schweller, 1994)。最後，利益平衡論針對國家的行為傾向提出不同看法，過去的國際關係理論多假設，國家較願意為維護自身的現狀而不顧一切付出代價，但對於尚未擁有的事物則傾向於採取低代價、低風險等較保守的行為。因此，這樣的傾象會造就整個國際體系大多維持現狀，較難出現大規模的變動。然而，利益平衡論提出不同的假設，國家並非總是傾向於維持現狀，相反地，國家將會根據自身的不同條件而主動採取高代價、高風險的行為，以此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從而獲得更多利益(Schweller, 1994)。

綜上所述，利益平衡論將國家主觀的利益概念帶入外交決策的分析，在此概念下，可再將理論分為二種層次，其一是單元層次，其二是體系層次。首先，在單元層次中，利益平衡論將國家分為四種典型。第一種是獅子型(Lion)國家，這些國家願意花費大量成本維持現狀，較不願見到現狀改變。主要因為這些國家早已是國際現狀的既得利益者，維持現狀對其國家利益的發展最為有利。第二種是羔羊型(Lamb)國家，這些國家的特點在於缺乏足夠的實力對國際體系產生改變，大多為一般中型國家或失敗國家，對國際體系的改變無足輕重。第三種是狐狼型(Jackal)國家，這類的國家願意付出高成本維持現狀，但也願意付出高成本改變現狀，因此大多被視為機會主義者，有時則會成為左右勝敗的關鍵少數。第四種則是灰狼型(wolf)國家，這類國家對於現狀極為不滿，願意付出極高的代價改變國際現狀，他們多不顧一切顛覆現狀，因為無論結果如何，都會比維持現狀要來的好。

利益平衡論之國家類型光譜

Figure 1. State Interest (n) = (value of revision) – (value of status quo).



NOTE: The top line represents the state's calculation of its relative interests in the values of revision and of the status quo. Where the status quo outweighs revision (where n is negative), states are satiated; where revision outweighs the status quo (n is positive), states are revisionist.

圖 1，資料來源：Randall Schweller(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4, Vol. 19, No. 1, pp. 72-107

最後，在體系層次方面，Randall Schweller 著重於分析對現狀滿意與不滿的國家競合關係，如何進一步導致體系的變化。首先，對現狀滿意的國家將現狀改變視為威脅，維護現狀將持續確保其利益發展，因此較少會使用武力等方式獲取利益，反倒是利用現有的國際體制來加強自身的發展，國際體系也因而趨於穩定(Schweller, 1994)。此外，當維護現狀的國家比欲顛覆現狀的國家來得強大時，國際現狀的改變也較不易發生，因此也同樣趨於穩定(Schweller, 1994)。另一種情況則是國家將現狀改變視為機會，此種情形多發生於修正主義或是崛起中的強權，顛覆現狀將有利於其利益的重新安排(Schweller, 1994)。在此脈絡下，對現狀不滿之國家多採取軍事行動，以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而達到獲取自身利益的目標。此外，當對現狀不滿的國家相等或是強於維護現狀的國家，則多傾向採取行動推翻既有的國際體系，因此這樣的行為也較容易導致國際體系趨向不穩定的狀態。基此，利益平衡論重新修正過去對權力平衡的看法，扈從不再僅限於小國走投無路而不得不採行的政策，反之，有可能是小國根基於利益而主動採取之政策。筆者認為利益平衡論強調國家對現狀改變的認知與所能獲得的利益大小，較能精確描述沙以外交關係如何應對快速變化的中東局勢，而非僅根基於國家實力與威脅意圖。

綜上所述，筆者將針對本文的用詞做出精確之定義。制衡(balancing)意指實力相當的兩國或多國之間，為保持權力均勢，進而衍伸出多種不同型式的互動策略，用意在於不讓他國之實力強於自身。另外，抗衡(resistance)則是指大國與小國的交往中，小國雖實力遠遠不及大國，但還是能在不平等的實力間找尋對抗大國之機會與方法，而非完全屈從於大國。最後，本文之扈從(bandwagoning)定義採用利益平衡論之論述，意指小國在與大國互動時，根據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決定單方面地限制自身的行為，以獲取大國帶來的利益或是避免和大國的衝突，而非傳統理論所認為，扈從僅是一被動行為，用意在於屈從大國以滿足其意願。基此，由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脈絡可知，在 1948-1952 年、1967-1979 年這兩個時期，

沙以對現狀的認知產生分歧，因而導致雙方採取相互制衡的戰略。然而在其他時期，沙以兩國多為對現狀滿意之國家，因此在區域因素上，時常採取合作的方式，共同制衡其他意圖顛覆中東現狀之國家。在國際層面上，當美國勢力急遽涉入中東地區後，美國的保護有助於沙以更加確立自身的國家安全，因此促使沙以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以維護現狀，而美國也能藉此契機加大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力，然而，在 2001 年 911 事件後，美國大幅改變其中東政策，撼動沙國王室之統治，因而短暫促使沙國採取抗衡之戰略應對美國。

六、章節安排

本文將由時間序作為各章節的安排。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各有其時間上的分水嶺，因此本文會再將各節分為若干部分作討論。首先，1967 年爆發六日戰爭，導致以色列權力大幅提升進而轉變沙以間的外交關係，因而將其視為此時的分水嶺，故將第二章分為 1948-1967 年與 1967-1979 年兩部份做探討。此時期最大的特點在於外部勢力的影響並不顯著，區域因素是此時的主要影響因素，驅動沙以外交關係的變化。

第三章是 1979-2001 年，本章之分水嶺為 1991 年，當年的波斯灣戰爭與蘇聯解體確立美國的霸權地位，開啟長達十年的以巴和平，沙以關係因此受惠於和平的外溢效應。此時期的主要特點在於，雖區域因素依然對沙以關係有一定的牽制作用，但外部勢力—美國的影響力已然顯著提升，並成為影響最深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章將分為 1979-1991 年與 1991-2001 年做討論。

第四章是 2001-2017 年。有鑒於美國對沙以關係的影響力已然成形，本章將深入分析美國影響下的沙以競合關係。911 事件促使美國進行長達八年的反恐政策，但到 2009 年後，美國中東政策卻大幅由積極干預轉為消極觀望。因此，本

章將分水嶺設為 2009 年美國中東政策的轉變，將探討 2001-2009 與 2009-2017 的沙以關係。最後，第五章則是本文之結論。

七、研究限制：

本研究針對沙國與以色列之外交關係進行研究。然而根據美國國家檔案法規，外交與軍事機密文件必須要滿三十年才能予以解密，因此對於近三十年來美國中東外交政策的第一手資料取得，具有一定的困難程度。此外，研究者因為自身語言的限制，並不了解阿拉伯文以及希伯來文，因此只能針對中文和英文的資料文獻進行研究，無法將文獻的廣度拓展至沙國與以色列的官方檔案。最後，本文之研究文獻大多來自期刊、論文、專書等間接資訊來源，必然包含撰寫者的主觀立場與意見，因而在研究文獻上難免受到過去學者、專家們的影響。



第貳章、1948-1979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

本章將探討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以下簡稱沙國)與以色列在 1948-1979 年間外交關係影響因素。藉由檢視沙國與以色列在此時期的外交關係，再以此為脈絡，探討沙國與以色列之間的外交關係是如何互動，什麼樣的因素驅使沙以外交關係的變化與發展。

自 1948-1979 年，可謂中東地區風起雲湧的時期，此時共爆發四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儘管發生原因都不盡相同，但主要都牽扯到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以色列建國後，為中東地區帶來全新的變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蠶食鯨吞，激起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憤怒。對以色列的不滿逐漸演變為阿拉伯國家的合作橋樑，喚起阿拉伯民族主義共同對抗以色列。然而，沙國在此種情形中卻扮演多種角色，一方面與阿拉伯國家共同對抗以色列，另一方面又必須平衡阿拉伯國家對沙國的威脅。對剛建國的以色列來說，最重要的目標是如何在中東地區生存。儘管四周強敵環伺，以色列仍盡可能地與阿拉伯國家進行權力平衡，小心翼翼地維持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沙以兩國因而在這樣的情勢下，漸漸發展出競合關係。

本章將分為二部分做分析，分別為 1948-1967 年與 1967-1979 年。本章將 1967 年作為沙以權力平衡的分水嶺。1948-1967 年，以色列相對於沙國尚未具有強大優勢，雙方實力較為均等。但 1967 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大勝後，以色列對於阿拉伯國家的優勢逐漸明朗，沙國對以色列開始由合作轉為制衡。1967-1979 年後，以色列相對阿拉伯國家擁有較大的競爭優勢，進而造成沙以改變其外交政策。本章以內部因素、區域因素與外部勢力三大面向分析沙國與以色列在 1948-1979 年間，如何在不同因素驅使之下，採取最有利的外交政策，進而影響雙方外交關係之發展。

一、1948-1967 年沙國與以色列之外交關係：權力平衡的序曲—從戰爭到改革

1948-1967 年，沙以首先遭致外約旦的威脅，然第一次中東戰爭後，戰敗的外約旦已無力威脅沙以。然而，隨後卻由於埃及的崛起，同時被沙國與以色列視為改變現狀的威脅，雙方對於現狀改變的認知一致。埃及的崛起對沙國與以色列均構成威脅，因而促使沙以採取合作以制衡日漸強大的埃及。此時沙以兩國漸漸形塑出秘密的合作關係，為沙以合作之路揭開序幕。

(一) 內部因素

從 1948 年至 1979 年止，埃及憑藉其雄厚的實力領導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沙國身為阿拉伯國家的一員自然與埃及站在一起，出於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不滿，沙以均反對以色列建國。儘管身為對抗以色列的一員，沙國此時並沒有太多積極的行為，主要受限於沙國自身軍事力量的限制。沙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並沒有所謂的現代化軍隊，沙國國內的軍力來源主要依賴境內各部落，沙國國王伊本紹德(Ibn Saud)⁸會定期向各部落徵兵，以補充軍事人力。然而，由各部落徵召來的軍人，對沙國的國家認同卻遠遠小於對原生部落的認同(Kenneth, 2002)

因此，沙國雖然投入大量的資源用於推動軍事改革，但效果卻有限。沙國軍人仍較依賴自己的原生部落。對於沙國國王來說，軍事現代化絕對有利於沙國的發展。但軍事現代化也同時意味著，沙國必須將軍權集中到國家手中，杜絕其他非官方武力。然而，國內各部落對沙國國王的效忠，更加攸關於伊本沙烏地的統治基礎，若強勢削弱部落的實力，根本無益於部落與沙國的團結(Kenneth, 2002)。沙國國王更擔心，給予部落現代化的武器，會增加部落反抗的機會，而且沙國在

⁸ 沙烏地阿拉伯開國國王，統治時期為 1932-1953，於 1932 年建立現代沙烏地阿拉伯王國(CIA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a.html>

此時並未面臨立即的外部威脅，因而在軍事現代化的進程上顯得非常緩慢 (Kenneth, 2002)。

沙國的國家實力不足，無法提供其他阿拉伯國家實質的軍事幫助 (Karsh, 2002; Vassiliev, 2000)。沙國僅在意識形態上對阿拉伯國家表達支持，並共同譴責以色列的建國。事實上，沙國對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的貢獻不大，沙國所派出的軍人完全沒有受過現代戰爭的訓練，作戰主力主要由埃及與伊拉克負責。對於沙國來說，向以色列宣戰的目的，僅僅只是為與阿拉伯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以此穩固自身的統治。藉由參與阿拉伯國家的對以宣戰，沙國能捍衛伊斯蘭正統性，並安撫國內的宗教保守派人士。

在戰爭初期，以色列處於劣勢，不敵阿拉伯聯軍的進攻，然而隨著戰況加劇，阿以之間的戰況逐漸反轉，在內部因素方面主要可分為二大原因。

第一，以色列有效統一國內軍事力量。以色列於建國後，面臨統一國內軍事力量的問題。建國前，許多不同的以色列武裝組織各自出力，為以色列建國貢獻心力。但建國後的以色列必須要具備統一的軍事力量，才能由中央指揮調度。因此當時的總理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⁹ 嚴禁任何的獨立武裝組織，並開始鼓勵施行徵兵制，此舉引起當時的國內武裝組織伊爾貢 (Irgun)¹⁰ 不滿，他們認為總理本-古里安旨在清除異己，擴張軍事權力 (陳立樵, 2019)。因此，伊爾貢不願服從其領導，開始私下從國外輸入武器，繼續運作自己的武裝勢力。這使得本-古里安下令大規模逮捕伊爾貢成員，以強勢作風完成國家的軍事統一 (陳立樵, 2019)。

第二，阿拉伯國家雖然共同對以色列展開進攻，但各個阿拉伯國家本身均有各自的利益打算，很難形成一致的外交政策。他們因為不滿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的行為而團結，並不代表阿拉伯國家會因而成為一個團結的聯軍。因此在戰爭中，各國無法有效地整合，加上武器設備不精良，最終輸掉第一次中東戰爭。另一方

⁹ 以色列建國後第一位總理，在為期間為 1948-1953 年,1955-1963 年。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s.html>

¹⁰ 以色列的地下武裝組織，成立於 1931 年，多次使用恐怖攻擊對抗英國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background-and-overview-of-the-irgun-etzel>

面，雖然以色列贏得第一次中東戰爭，卻也付出很大的代價，約有六萬三千名軍人與平民死於戰爭當中，約佔當時總人口的一成(Zeev, 2009)。大部分的以色列國民，在戰爭期間都被動員從事與戰爭有關的事務，因而造成經濟生產嚴重停滯民生凋敝(Zeev, 2009)。

第一次中東戰爭傷亡人數對照表

Israeli War of Independence (1948-1949)				
State	Entry	Exit	Total Forces	Losses
Egypt	1948	1949	300,000	2,000
Israel	1948	1949	140,000	6,373
Jordan	1948	1949	60,000	1,000
Syria	1948	1949	300,000	1,000

圖 2，資料來源：<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military-casualties-in-arab-israeli-wars>

經歷第一次中東戰爭的打擊後，沙以兩國隨即施行一系列的改革，雙方自 1950 年代起，分別開啟國家內部發展的高速階段。特別在經濟發展與內政改革方面，兩國均呈現穩定成長的態勢，因而能蓄積足夠的能量為日後的外交發展奠定基礎，以下將分述沙以的內部改革與意義。

沙國在 1950 年代開始，首先進行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沙國從遊牧社會轉變為定居型社會。沙國當局更提供貸款、牲畜與土地作為定居的誘因(Wynbrandt, 2010)。此外，沙國當局大力整建交通基礎建設，加速各地區的聯繫。沙國引進汽車、電視等現代化物品，用以推動沙國人民的現代化改革。另一方面，石油資源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視，沙國開始出口原油賺取外匯。石油工業的發展徹底改變沙國經濟發展的結構，越來越多人選擇定居生活，逐漸形成規模巨大的城市，沙國產業結構由傳統的農牧業轉型為石油工業(Wynbrandt, 2010)。儘管當時的石油工業主要仍被西方企業所掌握，相比之下，沙國從石油獲得的收益非常微薄。然而，這樣的轉變仍為沙國奠定堅實的工業基礎。

政治方面，由於人口不斷的增加並聚集在城市地區，沙國政府面臨更巨大的治理問題，因此開始創建許多政府部門，利如 1951 年創立內政部、衛生部，甚至中央銀行(Wynbrandt, 2010)。沙國當局的權力隨著社會變遷變得越來越具有中央集權的特徵，國家職能隨著經濟發展變得逐漸龐大。沙國政府在 1960 年代進行多項改革，更加推進沙國的現代化進程。沙國政府建立起強大的社會福利制度，涵括健康以及教育的推展，甚至更將教育拓展至女性。另外，沙國成立司法部門，由沙國國王指派有權詮釋法律的烏拉瑪(ulama)¹¹ (Wynbrandt, 2010)。這意味著沙國政府將司法權收歸中央，政權高於宗教權，不再給予宗教干預政治的機會，沙國王權將獲得進一步的鞏固。

以色列進入 1950 年代後，也開啟了一段穩定且高速增長的時期。首先，以色列從 1948 年獨立戰爭中獲勝，確立國家生存的前提條件。儘管仍與阿拉伯國家維持緊張關係，但此時的以色列已正式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以色列的獨立吸引大量的猶太人遷移至此，來自東歐、非洲、以及中東地區的猶太人紛紛移民至以色列，導至以色列人口激增，為國家經濟發展打下根基(Reich, 2008)。此外，獨立初期的以色列相對貧窮，因而主要從三個管道獲取國家發展的資金，分別為美國政府的貸款、海外離散猶太社群的大量捐款以及戰後德國政府的賠款(Reich, 2008)。以色列將這些資金用於基礎建設、農業發展、工業發展以及電力系統的整建等，為以色列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至 1960 年代初期，以色列的工業產值已經達到 1950 年代的二倍(Reich, 2008)。以色列政府更大力推廣教育，實施五歲至十四歲孩童的義務教育。政治方面，以色列的議會民主制度運行的很順利，儘管政府的組成過程頻繁的發生黨派的裂解與重組，以致必須常常重新組成大聯合政府，但整體來說，以色列的政治體系與發展仍然呈現十分穩定的情形。

¹¹ 在伊斯蘭社會當中，對於神學或伊斯蘭法學具有一定學識涵養的人，均被稱為烏拉瑪。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ulama>

綜合上述分析後可發現，儘管雙方在 1948 年初期都處於軍事上的弱勢，但內部因素的差異成為決定勝敗的關鍵。「是否有效統合國家軍事」發揮關鍵的作用。沙國由許多部族所組成，若要實施軍隊國家化，必定得削弱各部族在軍事上的權力。沙國國王顧忌此舉會引起強烈的反彈，反而更不利沙國的統合。因此，沙國並未進一步地採取激烈的措施統一國家的軍權。相反地，以色列面臨阿拉伯國家的威脅，總理本-古里安深知統一國家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強力掃蕩非官方的軍事力量。儘管因此樹立敵人，卻迅速整合以色列的軍事實力，對以色列的國防發展奠定基礎。

經歷戰爭摧殘後，沙以兩國無暇在以巴問題的意識形態上做對抗，反而明確致力於國內經濟與內政的改革，試圖重振國力擺脫戰爭的負面效應。因此，儘管意識形態上仍維持對立，但雙方並未爆發更進一步的衝突。沙國自 1950 年代後，國家的內部發展的主要特點是農牧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經濟發展也隨著快速的現代化而大幅成長。與此同時，沙國王室在政治上的權力更加穩固，國家職能擴張更進一步將政府的影響力散播至各領域，政治權力的分布漸漸從部落型社會轉變至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這樣的轉變也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掌控與動員能力漸增，明確顯示沙國已徹底轉型為現代國家。

以色列在獨立戰爭獲勝後，拜人口發展與良好的基礎建設所賜，以色列的經濟發展迅速成長，國家內部發展由戰後的百廢待舉轉變為工業發達的社會。這段時期的繁榮也替以色列的生存發展打下深厚的根基。基此，在 1948-1967 年這段期間，沙國與以色列分別進行一系列的經濟建設與內政改革，國內政局也相對處於安定。雖然沙以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仍然存在，兩國卻多致力於厚實國家經濟實力與內政改革。沙以深知經歷戰爭摧殘後，已無力掀起另一波戰爭，如何復甦國內的發展才是當務之急。

(二) 區域因素

儘管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建國採取一致的對抗態勢，沙國在此時期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卻不來自以色列(Tal, 2004)。看似強大的阿拉伯聯軍其內部充滿矛盾，當時阿拉伯世界分為二大陣營，分別是由哈希姆(Hashimite)家族¹²所統治的外約旦、伊拉克，對上與哈希姆家族保有敵意的沙國、埃及、敘利亞(Walt, 1990)。整個阿拉伯聯盟呈現鬆散的狀態，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大陣營的相互對抗，特別是沙國與哈希姆家族之間的猜忌與不信任(Tal, 2004)。沙國王室與哈希姆家族，在過去二十世紀漢志(Hijaz)地區¹³和內志(Najd)地區¹⁴的領土爭奪上保持高度競爭關係，而種下雙方的歷史恩怨。因此，哈希姆家族在此時可視為沙國最主要的外部威脅(Rogan & Shlaim, 2007)。如何阻止外約旦哈希姆家族的影響力擴大，才是沙國最關注的外交議題(Rogan & Shlaim, 2007)。

以色列建國初期，最大的安全威脅來自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但究其內涵發現，在眾多阿拉伯國家當中，威脅最大的卻是外約旦。儘管埃及、伊拉克等國不遺餘力對抗以色列，卻因為地緣上的阻隔並未造成立即的危害，這些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敵意也僅來自於意識形態(Rogan & Shlaim, 2007)。然而，外約旦緊鄰著以色列，在地緣關係上非常緊密，以致於以色列當局格外注意外約旦的動向。此外，外約旦仍保有擴大領土的野心，一直很想併吞約旦河西岸的土地藉此擴張影響力(Rogan & Shlaim, 2008)。在以色列宣布建國後，外約旦並不樂見一個猶太國家緊鄰著自己的國土，因而參與阿拉伯聯軍以此壓制以色列的壯大。

1952年中東局勢再度發生變化，為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帶來新的改變。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在埃及的革命成功後，沙國隨即給予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在納瑟執政初期，埃及不斷強調反殖民主義的精神，以及凸顯阿拉伯民族的

¹² 穆罕默德後裔繁衍而成的家族名，在近代 20 世紀曾統治過漢志地區(1916-1924)、伊拉克。現今仍統治約旦王國。<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ashimite>

¹³ 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側，鄰近紅海的區域。<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Hejaz>

¹⁴ 位於阿拉伯半島中間，主要是荒漠和山脈組成的區域。<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Najd>

重要性，此舉並未與沙國的國家利益相違背。沙國更可藉由埃及的壯大，共同對西方殖民勢力施加壓力。因此沙國與埃及在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¹⁵一事上保持合作關係，除了能壓制伊拉克的壯大外，也成功說服多數阿拉伯國家拒絕加入此公約(Walt, 1987 ; Podeh, 1999)。

埃及初期的外交政策並不違背沙國的國家利益，沙國與埃及採取結盟共同制衡伊拉克(Walt, 1987)。而且納瑟剛奪取政權後尚未站穩腳步，還不至於對沙國造成威脅。另外，由哈希姆家族所統治的伊拉克，一旦與美國勢力結盟後，國力勢必會高於沙國，倘若所有阿拉伯國家均加入巴格達公約，沙國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也將被削弱(Walt, 1987)。因而沙國選擇採用埃及的主張，拒絕加入巴格達公約共同制衡伊拉克。

1952年埃及的納瑟革命成功，打著反西方帝國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大旗，迅速在阿拉伯國家中獲得很高的聲望。尤其納瑟把以色列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東的魁儡。這樣的做法使得納瑟政權更具有合法性，並以消滅以色列作為國家的目標之一。因此，納瑟崛起使得以色列的安全威脅加劇，以色列淪為納瑟推展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工具(Walt, 1990)。相較於過去，阿拉伯國家僅基於對以色列竊佔土地的不滿，如今，納瑟卻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以及個人魅力，更加激化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敵意。

沙國與以色列在納瑟崛起的初期，分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而影響兩國的外交關係。沙國對納瑟執政初期抱持樂觀的態度，反殖民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理念均對沙國有利，雙方更在巴格達公約一事上保持一致，成功使得西方主導的巴格達公約影響力不如預期。相反地，納瑟至始至終對以色列完全沒有善意，以色列反而遭遇一個更強大的對手，能以意識形態和個人魅力，將阿拉伯世界團結在一起。納瑟反西方殖民主義和敵視以色列的理念大致與沙國一致，加上納瑟

¹⁵ 1955年的巴格達公約是美國為遏止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勢力擴張，以及保持西方國家在中東影響力所誕生的條約。西方國家找上伊拉克等國成立巴格達條約，伊拉克也認為能藉由此機會，靠向西方國家加強自身的實力。<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entral-Treaty-Organization>

漸增的聲望以及埃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導致沙國選擇主動扈從埃及的外交政策。以色列則必須對埃及崛起展開制衡，以免危及自身的國家安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使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變得更疏遠，在此時期並無任何良好的互動。

儘管如此，埃及持續的壯大為沙國帶來壓力，愈加強大的埃及愈是將沙國推向制衡而非合作，此舉導致沙國更急切地在中東地區尋找能共同制衡埃及的盟友——以色列，逐漸開啟沙以日後的合作關係。

納瑟全力發展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憑藉自身的魅力和訴求，迅速在阿拉伯世界獲得大量的支持，使埃及在中東地區的勢力越發強大 (Varble, 2003)。國力不斷增強的埃及開始對沙國的安全造成威脅，納瑟的理念傳入沙國後與“反君主制，支持共和制”有很深的連結，沙國開始感到越來越大的威脅 (Varble, 2003)。沙國更發現埃及有意要推翻沙國的君主制度，雙方關係開始惡化。此時的埃及國力正緩步上升，使得沙國不得不對埃及產生防備。

埃及真正轉變為沙國最大威脅的時間點發生於蘇伊士運河危機 (Suez Canal crisis)¹⁶後，納瑟被推向無可比擬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納瑟成為對抗西方殖民勢力與以色列的英雄。如此強大的埃及對沙國的安全造成嚴重影響，加上埃及對君主制度的不友善，沙國最大的安全威脅完全移轉至埃及 (Podeh, 1999)。

沙國與埃及的分歧隨著時間越來越大，納瑟提倡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漸漸對君主制度的沙國王室造成威脅，此舉導致沙國轉而採取制衡埃及的政策。轉變的原因主要是埃及的勢力已經對沙國王室的統治造成威脅，其中更多次發現埃及意圖顛覆沙國的行動 (Petersen, 1993 ; Orkaby, 2017)。在此脈絡下，沙國與以色列的安全威脅趨於一致，如何限制埃及不斷擴大威脅，漸成為沙以的最重要考量。沙國與以色列的具體合作行為發生於 1962 年的葉門內戰，為支持有利自己的葉門政權，沙國與埃及隨即在葉門展開了代理人戰爭 (Petersen, 1993 ; Orkaby, 2017)。以

¹⁶ 1956 年納瑟決定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此舉嚴重侵害英國與法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英法因而聯合以色列進攻埃及。<https://www.history.com/topics/cold-war/suez-crisis>

以色列正好可藉由幫助沙國在葉門的所支持的王權削弱埃及的影響力，沙以因而展開多起軍事合作，打擊納瑟所支持的共和軍隊(Petersen, 1993 ; Orkaby, 2017)。

綜合上述之分析，探究 1948 年至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沙國為主動尋求國家之利益，採取的外交策略偏向「扈從」阿拉伯國家。首先，當以色列建國後，所有阿拉伯國家基於阿拉伯民族情感，一致反對以色列，沙國想當然耳也必須表態堅決反對以色列建國的立場。然而，阿拉伯國家在反對以色列一事上，僅僅在意識型態層面保持相當大的團結。阿拉伯國家的國力與國家利益各不相同，一旦超脫意識型態層面，合作的效度與廣度往往不盡人意。

因此，沙國在意識形態上無任何考量餘地，必須與阿拉伯世界一致反對以色列。倘若沙國不這樣做，付出的代價將是被整個阿拉伯世界孤立，甚至動搖沙國王室的統治合法性(Walt, 1987)。然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實力大不相同，沙國受限於自身條件，雖加入阿拉伯陣營卻無法對聯軍提供實質上的幫助，但仍可被視為阿拉伯聯軍之一員。亦即沙國付出的成本極小，但卻能獲至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相同的地位(Walt, 1987)。同時，沙國也因此順勢進行推卸責任(buck passing)，亦即將對抗以色列的所有責任推卸至其他阿拉伯國家身上，當其中之一的國家外約旦因對抗以色列而大幅消耗國力後，便使得沙國不必擔心外約旦對沙國領土的威脅。

總結來看，沙國只需表態反對以色列，而不用作出實質上的貢獻，即能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沙國的外交政策因此選擇扈從阿拉伯國家。然而，沙國僅在意識形態與阿拉伯世界保持一致，而非實質上要消滅剛建國的以色列。以色列在戰後站穩腳步，外約旦則在對以色列的戰爭中消耗大量國力，因而無形之中也削弱外約旦對沙以的安全威脅。至此，沙以兩國也無合作制衡外約旦的必要。

然而，埃及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成為沙以兩國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直接促成沙以合作。納瑟推行的共和制嚴重侵蝕沙國王室的統治基礎，同時，納瑟個人的魅力與強大的埃及，使其對沙以的威脅倍增。沙以對制衡埃及的渴望觸發雙方的合作關係，沙國與以色列在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的考量下開始進行合作。

綜上所述，沙國於 1956 年後捨棄扈從埃及之外交政策，轉而選擇制衡埃及。外交立場漸漸與以色列形成一致—即「平衡埃及的威脅」。共同的安全威脅將沙以兩國推向合作，具體的作為更體現於葉門內戰，雙方完全屏棄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明確顯示出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遠大過於意識形態的阻礙。沙以均將埃及崛起此一現狀的改變視為威脅，因此導致雙方進行合作以制衡埃及，試圖回復至原本的現狀。區域因素在此時成為主導沙以外交關係的關鍵，為確保國家安全，沙以輕易越過意識形態的障礙採取合作，形塑出隱形的同盟關係。

(三) 外部勢力

自 1948 年初期，英國仍然是中東地區最具有影響力的外部勢力。承襲過去長期在此地的殖民，英國仍實質影響許多中東地區。然而，二戰後的英國國力衰退，無力維持在中東龐大的花費與駐軍，逐漸撤出對中東的干預。有鑒於英國勢力的衰退，蘇聯想藉此機會將影響力拓展至中東地區。在二戰後，蘇聯便想方設法地排擠英國的中東勢力，因而選擇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認為其有助於蘇聯削弱英國的影響力(Mankoff, 2011)。

英國勢力撤出對沙國與以色列來說是極為關鍵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外約旦獨立以及巴勒斯坦問題。在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沙國國王就多次致函英國當局(Rogan & Shlaim, 2007)。沙國對於英國結束託管後，巴勒斯坦能否有能力成立政府並展開自治保持懷疑，同時也對外約旦的獨立有所顧忌(Rogan & Shlaim, 2007)。然而，英國最終仍在 1946 年讓外約旦獨立，並在 1947 年分治方案於聯合國大會通過後，英國決定全面撤離巴勒斯坦。至此，英國在此地的影響力將大幅消退。

與此同時，猶太復國主義則快速地在以色列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為將影響力涉入中東，盡其所能地排擠英國的中東勢力，開始大量資助猶太復國主義(Golan, 2009)。由於二戰後，英國對許多中東地區仍掌有實質控制，並與多個阿拉伯國家保持友好關係。蘇聯因此將英國視為進入中東的最大阻礙(Mankoff,

2011)。有鑒於英國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模糊態度，蘇聯將支持以色列建國作為支點，以明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作為進入中東的手段(Golan, 2009)。蘇聯隨即在 1948 年宣告承認以色列，並對以色列提供實質的援助。蘇聯希望能將以色列作為進入中東的入口，藉此擴大蘇聯的影響力(Gorvin, 1998)。蘇聯逐漸成為以色列建國初期最重要的盟國，更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經由捷克對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確保以色列的生存安全(Gorvin, 1998)。然而，蘇聯與以色列的友好關係也同時惹怒周邊阿拉伯國家，並為日後的以阿衝突埋下導火線。

總結來看，此時中東地區由兩股外部勢力主導，分別為英國與蘇聯。探究英國與蘇聯之勢力即可發現，英國與蘇聯正在經歷勢力消長的轉變。英國剛結束二次大戰的摧殘，國力大幅度衰弱，對於維持海外殖民地的能力與企圖早已大不如前。反觀蘇聯，儘管也剛結束二次大戰，但經歷二戰的時間長度與廣度遠小於英國，因而仍保有一定的國力。因此，進入 1950 年代後，蘇聯盡全力地與英國競爭在中東的影響力，想盡辦法將英國趕出中東成為蘇聯的外交政策之一(Mankoff, 2011)。

此時的阿拉伯國家大多仍被看作英國勢力可及的地區，因此支持以色列就意味著與英國敵對。蘇聯藉由操作這樣的外交政策來達成排擠英國的目標(Golan, 2009; Mankoff, 2011)。此時的英國已無力保護沙國，進一步導致沙國傾向阿拉伯國家。英國的撤離也開啟以阿衝突的序幕，剛建國的以色列面對阿拉伯聯軍毫無優勢，卻在蘇聯的幫助下免於滅國的命運，更因此獲得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勝利(Golan, 2009; Mankoff, 2011)。總而言之，「英國勢力衰退」形塑沙國扈從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而「蘇聯對以色列的支持」則鞏固以色列在中東的國家地位。

至 1952 年時，蘇聯在中東的外交佈局出現截然不同的轉向。儘管納瑟對國內共產黨的態度並不友善，但他所提出的反西方殖民勢力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

(Arab socialism)¹⁷等論述卻深受蘇聯當局的喜愛。蘇聯當局認為可藉由支持反西方殖民的意識形態，將英國、法國等勢力趕出中東，穩固自身在中東的經營(Golan, 2009; Mankoff, 2011)。蘇聯反殖民的立場，也可將其形塑成維護阿拉伯民族主體性的外部強權。另外，阿拉伯社會主義的論述也與蘇聯的共產主義有些許共同之處。因此，蘇聯自 1955 年開始轉而支持以埃及為首的阿拉伯國家，更在 1955 年與埃及簽訂軍售協定，由捷克向埃及輸入大量先進的軍事武器，至此，雙方的關係逐漸穩固(Golan, 2009)。

蘇聯對埃及的外交與武力支持直接影響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埃及與蘇聯簽訂軍售協定，軍事實力大幅提高，更加威脅以色列在中東的生存安全(Walt, 1990)。反觀以色列在此時並未有任任何西方強權的支持。同樣地，埃及在蘇聯的幫助下更有利於推動共和制度，並威脅沙國王室的統治地位。特別在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後，納瑟的聲勢如日中天加上蘇聯的援助，導致沙國放棄扈從埃及的外交政策，並與以色列採取合作以制衡埃及。這樣的情形明確顯示出蘇聯外交政策的轉向，間接地促成沙國與以色列的合作。

筆者認為，蘇聯對埃及的支持使其權力大增，可看作是沙以合作的因素之一。埃及權力增加意味著對沙以威脅的增強，因而主動導致沙以尋求合作以制衡埃及。然而，光憑沙國與以色列的國家實力並不足以與蘇聯相抗衡，仔細探究後發現，這其中還包含了美國勢力開始涉入中東並對沙以提供支持，漸漸加速沙國與以色列的合作關係。

當英、法的勢力逐漸淡出中東後，此地將沒有任何外部勢力能夠對抗蘇聯。有鑒於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思維，美國必須盡其所能地與蘇聯競爭國際影響力。艾森豪總統因而提出「艾森豪主義(Eisenhower Doctrine)」，意指美國將使用

¹⁷ 阿拉伯社會主義是一種起源於 1940 年代的思想，有鑒於中東地區遭受西方國家長期殖民，間接造成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社會階級分化等嚴重問題。當時以納瑟為首的人士便主張對抗西方殖民勢力，以更平等、公正的方式統合阿拉伯社會。<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9, No. 1, The Arab World: Paths to Modernization (1965), pp. 47-62 >

一切方法防止共產主義在中東的擴張。至此，可看作是美國勢力進入中東的起點，也間接開啟美蘇在中東的競爭關係。蘇聯與美國紛紛開始在中東競逐盟友，蘇聯拉攏埃及、敘利亞等意識形態較相近的國家。美國的中東政策則是在維持原有的盟友外，更進一步拉攏親蘇聯的國家以削弱蘇聯的影響力。美國因此開始援助埃及，想以此加強美埃關係。但是美國對埃及援助的同時，卻也增強沙國、以色列的安全威脅，促使美國當局也必須加大對沙國、以色列的軍售與援助(Zeev, 2009)。美國所採行的中東政策固然能吸引原本親蘇的國家，但也會造成中東國家間的威脅擴大，美國因而必須回過頭來加強對盟國的援助。這樣的循環導致 1960 年代後美國在中東所投入的資源急速增加，被視為美國積極涉入中東事務的開始，更加深化美國作為外部勢力之角色(Zeev, 2009)。

綜上所述，美國對沙國與以色列的支持漸增，成為沙以兩國合作制衡埃及的另一原因。有美國的外交、軍事實力做保證，沙以兩國便具有對等的實力對抗蘇聯所支持的埃及。美國勢力的涉入不但改變中東外部勢力的競爭行為者；由英國與蘇聯的對抗轉變為美蘇間的較量，也間接促成沙國與以色列選擇合作以制衡埃及的外交政策。埃及受到蘇聯的大量援助後，其軍事實力在中東地區開始有顯著的優勢，這可視為威脅大增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國為反制蘇聯擴張，便提出艾森豪主義，將沙以納入美國的戰略盟國。外部勢力的干涉導致沙以對現狀的認知不再只基於區域威脅，反而會進一步受到大國的影響。然而，1948-1967 年初期，外部勢力對中東地區的涉入仍處於萌芽階段，特別在沙以關係當中，雖然已有美國的資助，但尚未形塑出全面性的關鍵角色。相反地，美國當局也仍在觀望當前中東局勢變化與應對政策，外部勢力的發展反而是隨著沙以關係而產生改變。

(四) 結論

總結 1948-1967 年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因素，筆者認為區域因素扮演最重要的關鍵角色。首先，內部因素可分為政權穩定與意識形態兩大主軸。在政權穩定上，沙以兩國均透過改革穩步成長。意識形態方面，沙以始終保持相異的意識形態，但兩國卻仍開展出合作關係，因此，內部發展難以解釋沙以此時的競合關係。外部勢力雖然在 1948 年後就已進入中東，由英國、蘇聯的競爭過渡至美國、蘇聯的競逐。然而，此時外部勢力仍處於萌芽階段，美國對沙以的援助充其量只能視為增強其國家實力的方式之一，並未真正對沙以外交關係產生全面的影響。

相較之下，區域因素在此時成為主導沙以關係的主要因素。當沙以面對區域變動的認知一致時，便傾向立即採取合作的方式制衡威脅。反之，若在區域變動的認知相異，則大致上維持互相敵對的態勢。首先，外約旦雖對沙以產生威脅，但其戰後的衰弱自然不再構成沙以的威脅。當埃及革命成功後，沙以對現狀的改變認知不一致，沙國將其視為機會，以色列則將其視為威脅，立刻造成沙以外交關係的停滯。然而，當埃及國力漸增後，沙以對現狀的認知又轉為一致，直接造成雙方選擇合作以制衡埃及的外交政策。由此可知，在 1948-1967 年，沙以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區域強權埃及，因此沙以欲制衡埃及，確保國家安全的意圖，成為驅使沙以合作的關鍵因素。

二、1967-1979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沙以外交關係再平衡—六日戰爭至十月戰爭

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大勝，成為沙以權力消長的分水嶺。戰後埃及國力漸衰，導致中東權力分佈重組，進而使沙以兩國由合作轉為對抗。沙國將六日戰爭後的現狀改變視為威脅，以色列則將其視為機會。雙方對現狀改變的認知不同，導致沙以外交關係在此時轉變，由合作再次轉為相互制衡。

(一) 內部因素

沙國的內部改革使政權越來越穩定。此時世界對石油的需求日漸提升，沙國能透過石油獲得越來越多的收益，進一步用來投資國內的經濟建設，導致沙國靠著石油的蓬勃發展，帶動國內經濟不斷向前。由於經濟發展壯大，沙國在阿拉伯國家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也靠著石油所獲得的財富而與日俱增。

六日戰爭的戰敗導致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立場越來越激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¹⁸在1967年後由巴勒斯坦人獲得實質控制，屈辱的戰敗結果更喚醒PLO對建國和軍事力量的渴望(Wynbrandt, 2010)。沙國抓住此一機會開始大力資助PLO，藉由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仇恨高漲之時，沙國將影響力深入巴勒斯坦，逐漸成為PLO最大的贊助者，競逐領導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角色(Wynbrandt, 2010)。在中東區域內，沙國為平衡埃及所控制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創立伊斯蘭會議組織(Islamic conference organization)作為另一個中東國家間的互動平台，試圖以此擴張沙國影響力。

在石油經濟方面，沙國倚靠石油帶來的巨大財富將自身的影響力推向巔峰。OPEC的創立反轉中東產油國家的地位，早期多受制於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中東產油國在石油的定價上沒有太大的影響力。然而1960年代創立的OPEC開始

¹⁸ 成立於1964年，被眾多阿拉伯國家承認為巴勒斯坦的唯一合法代表，目標為建立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alestine-Liberation-Organization>

統合大多數產油國家，彼此互相協調生產進而控制油價的發展(Gross, 2017)。OPEC 在 1970 年代後影響力大增，主要因為多數產油國家漸漸拿回石油的控制權。以沙國為例，在不斷地與阿美石油公司修訂合約後，沙國出口石油的收益增加百分之五十(Wynbrandt, 2010)。

國際油價圖(195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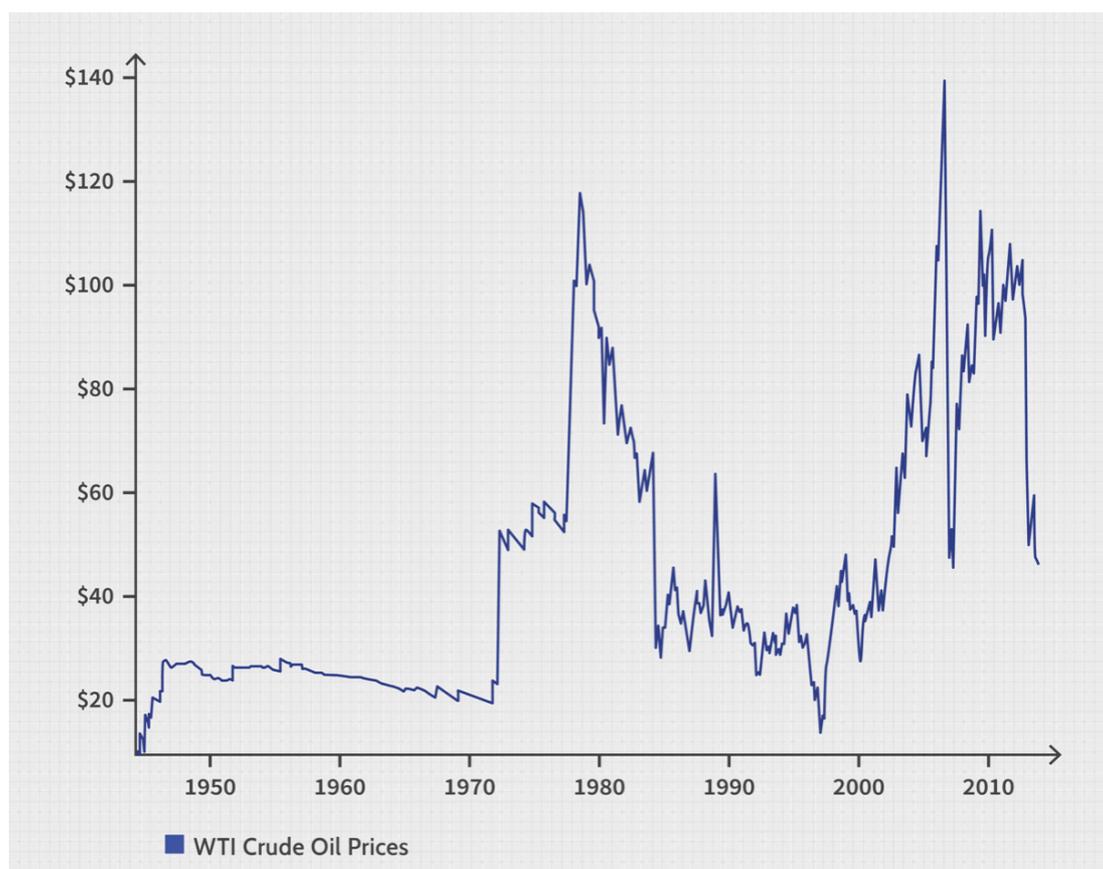


圖 3，資料來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100515/learn-how-trade-crude-oil-5-steps.asp>

1973 年十月戰爭後，沙國與 OPEC 共同實施石油禁運，作為對西方國家的報復，一舉將油價推升三倍(Gross, Riedel& Pita, 2017)。石油價格大漲意味著沙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石油帶來的財富賦予沙國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沙國首先利用財富加速國內現代化改革，提高社會福利，甚至大量購買現代化武器提升自身軍事力量(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此外，沙國將影響力施加於海

外地區，大力資助海外清真寺、經學院的興建，更成立許多基金專門用於幫助貧窮的伊斯蘭國家(Vassiliev, 2000 ; Uzi Rabi & Chelsi Mueller, 2017)。

沙國從六日戰爭至十月戰爭後，國家發展呈現很重要的趨勢—由被動轉變為主動地發揮其影響力(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究其成因，主要可歸因於石油經濟的發展替沙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沙國順利取回對石油定價的控制權，並配合 OPEC 的影響力，成功提高石油價格而獲得大量財富。這些財富又更進一步被沙國投入到經濟發展，導致沙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埃及對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在 1967 年後，不再如同過去一樣強大。這給予沙國機會，憑藉豐富的經濟資源分食過去埃及所壟斷的領導地位。沙國順勢藉由創立區域組織、金援巴勒斯坦等手段強化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總結來說，沙國在此時的內部發展呈現爆炸性的成長，主要歸因於取得石油定價權而帶動經濟發展，一步步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沙國人均 GDP (1970-2015)



圖 4，資料來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SAU/saudi-arabia/gdp-per-capita>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雖經歷短暫的經濟衰退，但在獲得大量領土的情況下，便吸引廣大的移民移入並屯墾以色列擴張的土地(Reich, 2008)。更多的土地與更多的人口將有很大的可能性推升經濟發展，因此以色列自戰後開始經歷一段長繁榮時期，不論在農業、工業等領域均有明顯的進展(Reich, 2008)。以色列也透過海外猶太人的捐款以及來自美國政府的貸款，作為發展科技、工業等領域的資金。然而，十月戰爭的爆發卻大幅修正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權力關係。首先，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不同於六日戰爭的大勝，十月戰爭只視為以色列的慘勝。獲勝的以色列雖仍確保其生存地位，卻在戰後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Reich, 2008)。迥異於六日戰爭的繁榮，十月戰爭促使以色列當局驚覺以色列的巨大優勢已消逝，通過和平手段與阿拉伯世界談判可能才是維護以色列利益的最好方式(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

以色列人均 GDP(196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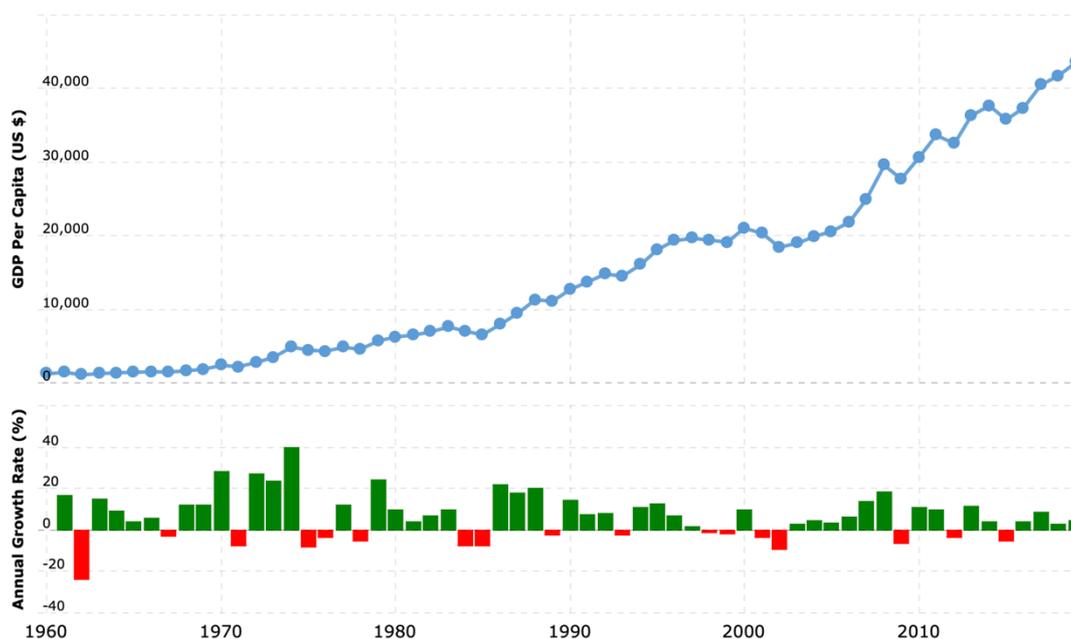


圖 5，資料來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ISR/israel/gdp-per-capita>

簡言之，以色列的經濟發展在六日戰爭後呈現爆炸性的成長。戰後的以色列反轉以阿之間的權力關係，大幅擴張領土的以色列更在以阿衝突的議題上獲得更多談判籌碼，以色列在以阿問題中開始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Reich, 2008)。六日戰

爭也奠定以色列的國際地位，以色列不再只能被動地應對阿拉伯國家的攻擊，反而擁有主導以阿問題的地位。這樣的激烈轉變導致其他阿拉伯國家基於國際現實，逐漸修正對以色列的立場，由消滅以色列的態度轉為協商談判。然而，十月戰爭促使以色列重新思索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戰爭的結果顯示以色列並非永遠無堅不摧，產油國家的石油禁運更大大敲響以色列國家安全的警鐘。十月戰爭的勝利也連帶造成以色列國力衰弱，因而修正自建國以來的強硬立場，以色列逐漸願意用和談方式處理以阿問題，也為日後的以阿和談進程奠定基礎。

綜上所述，沙國與以色列的內部發展，從六日戰爭至十月戰爭分別呈現高度發展的情況。原先最主要的威脅—埃及，歷經兩次戰爭後國力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沙國在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影響力。以色列則在戰後獲得更大的權力可做為以阿衝突的談判籌碼。沙以雙方均於此階段獲得相對增長的權力，致使雙方在外交關係的互動籌碼越來越多。過去的沙以關係當中，沙國僅作為阿拉伯國家的一員，跟隨其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互動。然而，自六日戰爭後，沙國權力大幅增長，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肩負起與以色列互動的責任。由於國力的大幅提升，沙以關係的影響力開始深化，不再只是單一的國與國關係，反而連帶影響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

(二) 區域因素

六日戰爭的結果使以色列的國力急速壯大，導致中東地區發生新一波的權力變化(Kamrava, 2005)。六日戰爭挫敗埃及的權力，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層次由意識形態轉為實體對抗。轉變的關鍵是以色的領土擴張。以往所關注的意識形態已不再是第一順位，取而代之的是領土間的權力關係(Kamrava, 2005)。為平衡六日戰爭後國力增強的以色列，阿拉伯世界開啟新一波的聯盟。

六日戰爭後，沙國最大的敵人從納瑟所領導的埃及轉移至以色列(Kamrava, 2005)。此時沙國的外交政策逐漸發生變化，開始傾向於制衡以色列。六日戰爭的

慘敗帶給阿拉伯國家慘痛的教訓，特別是以色列從戰爭中奪取大片土地，更加使得阿拉伯國家的安全受到威脅，但這樣的挫敗卻也為阿拉伯國家帶來史無前例的團結動力。既有的對立意識形態、失去的領土以及失衡的權力關係，成為促進阿拉伯世界團結動力的三大主因。

1970年納瑟去世更加速沙國與埃及之間的合作關係。過去納瑟太過鮮明的個人特色與野心，使沙國當局必須對其保持警覺，由扈從轉為制衡的政策。然沙達特(Muhammad Anwar el-Sadat)繼任後，沙國與埃及的關係逐漸好轉。沙國認為沙達特不像納瑟極具野心，對沙國的安全威脅並不大，願意與埃及進行更多的合作。沙國在此時逐步和埃及形成對抗以色列的聯盟，沙國聯合埃及制衡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漸明確(Walt, 1987)。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所佔領土倍增，權力因而變得更為強大。六日戰爭成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權力消長的分界點(Walt, 1987)。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以往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亦即同情巴勒斯坦與維護阿拉伯民族尊嚴。然而，以色列的大勝改變此一情形，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敵意由意識型態轉為實質威脅的層次。由於以色列的領土急遽擴張，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防、邊界安全甚至水源等因素均形成威脅。因此，以色列權力增強的同時也深化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敵意。此外，六日戰爭對阿拉伯世界形成屈辱的打擊，更加激化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的對立關係。由於在官方層次上，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角色被弱化，因而導致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的對抗行為轉趨地下化、非官方化，逐漸導致恐怖主義的興起(Zeev, 2009)。以色列對恐怖主義的強硬路線又再次激化恐怖主義的發生，以此形成惡行循環，一步步侵蝕以色列的國家安全(Zeev, 2009)。

綜上所述，沙國與以色列在此時均呈現權力增加的趨勢。沙國更因此由被動消極的角色轉變為主動積極地施展影響力，逐漸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以色列則由於領土擴張，更加激化自身與阿拉伯世界的緊張關係，衝突的重點由意識形態之爭轉變為實際導向。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沙以的外交關係呈現完全不同的發展。首先，原本雙方採取合作以平衡強大的埃及，但六日戰爭後的埃及

衰弱，沙以共同的目標已不復存在。此外，沙國內部發展的高速增長也使其不再採取推卸責任的策略，以往所依賴的阿拉伯國家也不再具有被推卸責任的能力。相反地，沙國與以色列成為主要的競爭者，沙國取代埃及成為對抗以色列的領導國。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領土倍增，國家經濟更加繁榮，更多的土地意味著更多的生產，大量猶太裔於此時移入以色列屯墾，戰後以色列確實經歷一段長繁榮時期(Zeev, 2009)。然而，以色列自身的權力增強，不但無法平息以阿間的衝突，反而更加激化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敵意，六日戰爭的屈辱也為十月戰爭埋下遠因，以阿衝突由意識型態層面徹底轉為實體資源的衝突。同時，巴勒斯坦的激進派轉為恐怖主義，更不利於以色列之安全。以色列在日趨強盛的過程中連帶拉高與沙國的緊張關係，導致雙方之外交關係轉變為相互制衡。

沙以關係在六日戰爭後立刻發生轉變，最主要的原因為區域因素改變，區域的威脅由埃及再次轉移至以色列。過往一同合作平衡埃及的以色列，由於戰後的壯大，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開始往以色列傾斜。基於國家安全，沙國絕對不容許過於強大的以色列，因此立刻選擇聯合阿拉伯國家制衡以色列，試圖平衡中東地區的權力發展。基此，區域因素改變觸發的國家安全問題，明顯導引沙以關係在此時的走向。一旦以色列過於強大，沙國會選擇制衡，但當面臨共同威脅時，沙國又會立即選擇合作。

(三) 外部勢力

1967-1979 年這段期間，中東的外部勢力消長經歷重大轉變，主要可分為三大因素。首先，昔日主宰中東地區的英國正式退出中東地區。第二，美國勢力正式主導中東地區的發展，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外部強權。最後，由於蘇聯支持的阿拉伯國家連年戰敗，連帶削弱蘇聯勢力，甚至引發些許阿拉伯國家由親蘇轉為親美，蘇聯的角色漸漸由競爭場域的中心被邊緣化。此三大因素直接改變中東地區的權力變化，影響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英國當局自 1970 年代起，自認已無力負擔海灣地區的管理而選擇撤離 (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因此，原為英國掌控範圍的海灣國家，紛紛在英國撤離之後獨立。此舉意味著英國完全退出中東地區的競爭場域，其影響力正式告終。英國願意主動退出海灣地區並不利於英國國家利益，特別在蘇聯勢力仍盤據於中東時，英國的退出實際上有益於蘇聯的勢力擴張。然而，美國崛起顯然化解英國的擔憂。至 1970 年代起，美國正式取代英國成為中東外部勢力的主導者並與蘇聯進行對抗(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

此後，美國與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冷戰白熱化，蘇聯與美國紛紛競逐中東地區的盟國(Walt, 1987)。美國對以色列與海灣國家進行一系列的援助，平衡蘇聯在中東支持的埃及、敘利亞與伊拉克等國(Walt, 1987)。然而，真正轉捩點發生於六日戰爭與十月戰爭，美國所支持的以色列均大獲全勝，蘇聯所支持的阿拉伯國家被嚴重削弱。戰爭的勝利更加速美以關係的深化，美國視實力強大的以色列為中東地區的重要盟邦，將其納入美國的重要戰略佈局(Onea, 2013)。六日戰爭的結束使得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以色列巨大的勝利令美國當局確信其戰略價值，因而加速提高對以軍售(Onea, 2013)。

另一方面，沙國實施減產與石油禁運後，大幅推升油價而獲得大量財富。沙國在中東乃至世界的影響力開始不容小覷。石油禁運這段期間，儘管沙美關係經歷小幅的低盪，但沙國將大量財富用於國內現代化改革以及加強軍事實力，仍需依賴美國當局的幫助，因而最終仍回復親美的外交政策(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當時沙國國王費瑟(Faisal)身為務實主義者，偏向將沙國帶往現代化的道路，並且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沙美關係在此時重回全面深化的關係。

綜合上述之分析，蘇聯與美國自 1960 年代開始，互相競逐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雙方的競爭明顯體現於拉攏盟邦的外交政策上。蘇聯支持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等國，而美國則鞏固以色列、海灣國家與伊朗之間的關係。然而，1967 與 1973 年的兩場戰爭，嚴重削弱蘇聯中東盟國的實力，也連帶影響蘇聯在

此地區的影響力。這兩場戰爭的意義在於，阿拉伯國家對於蘇聯的信心開始動搖。原先，阿拉伯國家秉持消滅以色列的意識形態，並配合蘇聯給予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在以阿衝突的拉鋸中處於優勢地位。但六日戰爭大幅改變此一平衡，1973年的十月戰爭也未能扭轉戰局，擁有蘇聯援助的阿拉伯國家仍不敵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導致阿拉伯國家必須正視以色列存在的事實，任何以武力消滅以色列的計畫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

在這樣的脈絡下，一味地接受蘇聯援助對抗以色列似乎已不再是理性的做法。因此，許多阿拉伯國家開始考慮轉變其親蘇遠美的外交政策。同時，美國的勢力開始大肆以利誘的方式拉攏原為蘇聯的盟邦，如埃及就於1976年開始，捨棄過往的路線轉變為親美國家。埃及作為中東的軍事強國，其外交政策的轉向大大削弱蘇聯的中東勢力，這意味著蘇聯不再具有強而有力的代理人。此外，敘利亞也在1974年與美國恢復中斷七年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由於1973年後，中東地區產油國家在石油的定價權上影響力大增，進而導致伊拉克也獲得大量財富，並增強與西方國家的接觸與交涉。影響力與財富增加的伊拉克也不再甘於一味地採取親蘇立場，反而希望能多樣化自身的外交關係。很顯然地，蘇聯對阿拉伯盟邦的控制已大不如前，在埃及等盟邦紛紛弱化與蘇聯的外交關係時，蘇聯逐漸從競爭場域的中心往邊緣偏移，僅能零星地干擾美國中東政策的佈局，而無法制定一套主導中東的外交政策。同時，以色列與沙國在美國的保護下國家安全得以確保，逐漸形塑出沙以扈從美國的外交路線，自1970年代開始，沙以逐漸被美國視作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國。

三、結論

本章以三個分析面向，內部因素、區域因素以及外部勢力，分析在1948-1979年沙以外交關係，並以利益平衡論對沙以外交關係的變化提出解釋。筆者認為內

部發展、區域因素與外部勢力這三個因素彼此交互影響，但區域因素在 1948-1979 年所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在此時沙以外交關係中發揮最為關鍵的影響力。

沙以兩國的內部因素此時差異並不顯著，雙方之國內經濟發展穩定成長，政權也十分穩定。惟仍在以巴問題上保持敵對關係，然而，這卻不足以解釋為何沙以關係依然在 1950 年代產生合作。外部勢力方面，此時尚未有一明顯的強權能直接影響沙以之外交發展，雖然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與蘇聯在中東地區競逐的強權，但此時強權對中東國家的援助仍處於萌芽階段，美蘇也在 1960-1970 年代關係進入緩和時期，因此對中東的影響較為有限，充其量只加強對沙以兩國的軍售與援助，尚未到達全面主宰外交關係的能力。

然而，在區域關係的變化下，引發沙以的國家安全問題。沙以外交關係之變化與區域發展產生直接關聯。從第一次中東戰爭、埃及崛起至六日戰爭，每一次的區域變化均直接影響沙以兩國的權力平衡，為確保國家安全，沙以均必須制衡威脅。利益平衡論可以解釋沙以兩國在進行外交政策的機制。確保國家安全是沙以進行外交戰略的指導原則，當兩國對現狀改變的認知一致時，會傾向採取合作的外交政策。反之，當沙以對現狀改變的認知不一致時，則傾向於相互制衡。沙以面對埃及威脅時，雙方均將其視為改變現狀的威脅，因此選擇相互合作。但當以色列壯大後，沙國將其視為改變現狀的威脅，因而選擇與阿拉伯國家制衡以色列。而以色列將自身的壯大視為改變現狀的機會，因而導致沙以關係回復至對抗。區域因素變化所代表的意涵是對國家安全的衝擊，為確保自身安全，沙以會立即產生因應方式。由沙以關係變化能清楚得知，現實取向的重要性完全大於意識形態取向，儘管沙以依然存有嚴重對立的意識形態衝突，但決定沙以關係的因素卻是區域因素引發的安全危機，對自身安全的關注會輕易跨過意識形態的障礙，進一步促成沙以的制衡與合作。

1948-1979 年沙以關係影響因素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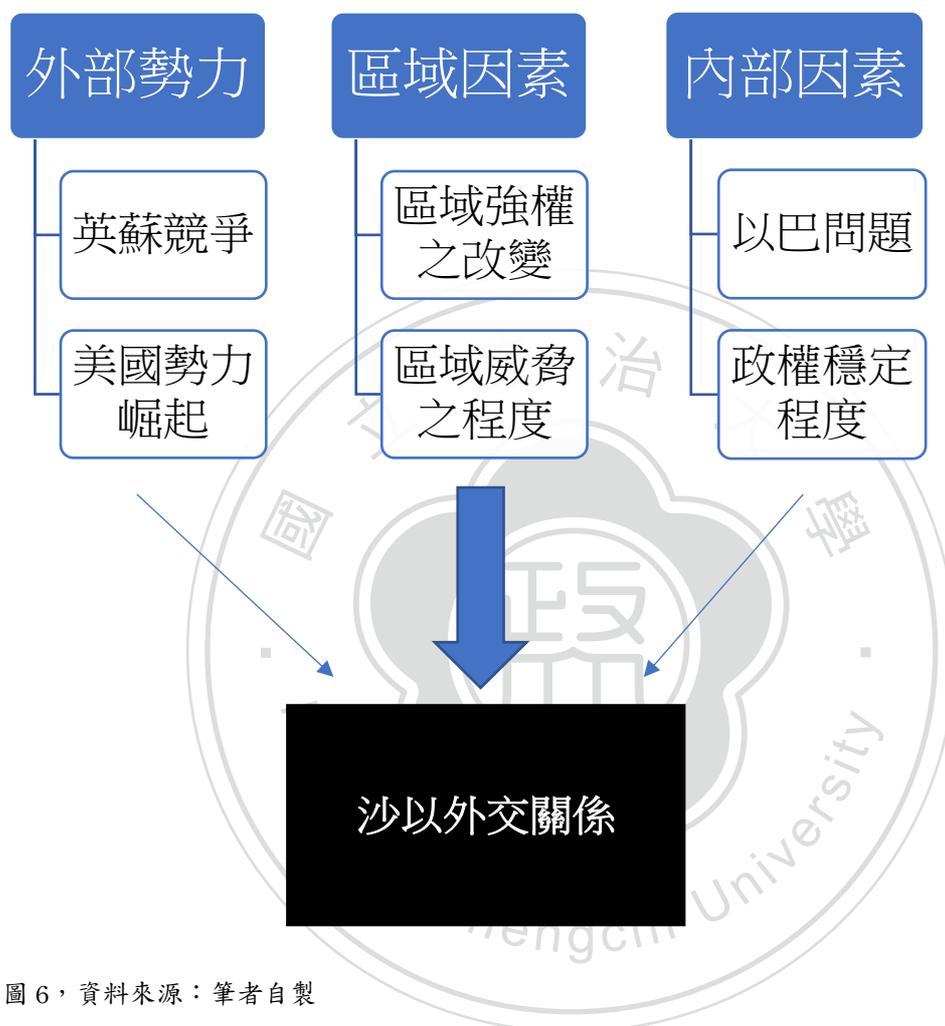


圖 6，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第參章、1979-2001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

本章共分為二部分，首先是 1979-1991 年，此時的中東局勢詭局多變，沙以面臨伊朗革命、蘇連入侵阿富汗、兩伊戰爭與波斯灣戰爭等事件的安全威脅。因此，為確保自身穩定，沙以對美國的軍事、外交依賴逐年遞增，美國也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力量確保沙以的安全，以此確立美、沙、以的三邊關係。也因如此，沙以對美國越來越依賴的同時，美國所能施加的影響力也相應提高，除對戰略事務的干預能力外，在以阿衝突中，美國也能牽制沙以雙方採取較為緩和的策略，以免衝突進一步擴大。沙以關係在美國角色的深化下越來越緊密，彼此形塑出更多的互動與合作。此外，美國介入沙以外交關係的角色越來越明顯，能藉由控制雙邊關係，達到局勢發展有利於美國之結果，更加奠定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強權地位。

第二，本章將聚焦於 1991-2001 年時期。美國自冷戰結束後成為世界霸權，此時的影響力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此強大的影響力也延伸至美國中東政策。沒有蘇聯的牽制，美國能輕易地對伊朗、伊拉克等國施行雙向圍堵政策，並且以自身的霸權地位推進沙以關係的最大障礙——巴勒斯坦問題。從而開創長達十年的以巴和平時期，這樣的效果也外溢至沙以的外交關係當中，隨著以巴和平進程的開展，沙以雙方也在外交關係中產生多項突破。

一、1979-1991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舊秩序的復辟—伊朗伊斯蘭革命至兩伊戰爭

沙國與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在此時備受威脅，因而促使雙方對美國的安全依賴逐年增加。這同時也提高美國在沙以關係中的外交影響力；美國透過大量的軍售與援助，漸漸形成美、沙、以三方的緊密關係。1979-1991 年，由於區域威脅逐漸擴大，沙以採取扞從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明顯，美國的重要性因而提升，沙以外交關係最重要的關鍵因素，逐漸由先前的區域因素轉變至外部勢力。

(一) 內部因素

1979 年爆發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快速地改變沙國內部發展。伊朗革命成功鼓動沙國境內的兩大族群—宗教保守派與什葉派，使其更加主動地表達對沙國王室的不滿(Walt, 1987 ; Wynbrandt, 2010)。首先，沙國國內的宗教保守派對於沙國親美與現代化的方向抱持很大的異議，他們認為沙國的統治路線早已偏離最初建國的精神(Safran, 1988)。真正的引爆點發生於 1979 年麥加禁寺狹持事件¹⁹，此事件強烈震驚沙國王室。沙國王室遭受宗教保守派的強烈反撲，花費很大努力才解決禁寺狹持事件(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與此同時，伊朗伊斯蘭革命鼓舞東部省份的什葉派族群，起身對抗長年不公平的統治方式。東部什葉派的動亂具有高度危險性，他們響應伊朗革命的行為，強烈威脅沙國王室統治的合法性(Trofimov, 2008)。此外，東部省份也是沙國蘊藏石油的重要區域，什葉派的動亂會導致沙國石油供應出現問題，進而威脅到沙國最重要的經濟收入(Vassiliev,

¹⁹ 1979 年一群極端份子闖入麥加禁寺，主謀宣稱自己是救世主，狹持禁寺內的朝覲人民，要求推翻沙國王室的統治。<https://www.bbc.com/news/stories-50852379>

2000 ; Wynbrandt, 2010)。對於宗教保守派與東部什葉派的動盪，沙國的回應方式是強力鎮壓，但同時又大幅修正國內政策以回應他們的需求。

沙國利用棒子與蘿蔔的方式處理伊朗革命所帶來的波及。沙國處決所有參與麥加禁寺狹持事件的成員，並派出軍隊強力鎮壓東部什葉派的示威(Trofimov, 2008)。在暴動結束後，沙國也承諾提升沙國什葉派在職業、教育、基礎設施的所有條件，試圖緩和他們的不滿。然而，真正對沙國內部帶來深遠改變的是社會變得更形保守。有鑒於宗教保守派的勢力仍處於多數，為防止激進的事件再次重演，沙國重新走向保守的社會路線以回應他們的訴求(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沙國加強伊斯蘭法的執行，召回所有在西方國家讀書與工作的沙國公民，並且禁止有關西方節慶的任何活動，對於女子的服裝與過從甚密的男女關係，更交由宗教警察強力取締(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沙國走向保守的路線有利於提升宗教在社會中的控制力道，也能夠進一步用多數遜尼派壓制什葉派。最重要的是，沙國當局藉由重回保守路線，能加強政府在各方面的控制，杜絕伊朗革命的浪潮。此外，沙國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勢必要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生存權利，以鞏固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在1981年向以色列提出法赫德計畫(Fahd Plan)²⁰。然而，法赫德計畫本身無法代表沙國欲解決以阿衝突的意圖。法赫德計畫的出台被認為是沙國作為阿拉伯世界領導國家的宣示，以此穩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Podeh, 2018)。由於法赫德計畫的條件太過嚴苛，想當然耳以色列會堅決反對法赫德計畫。

接續而來的兩伊戰爭又再次形塑沙國的內部發展。主要體現於兩個部分，首先是國際油價開始驟降²¹。一旦沒有豐沛的石油收入支撐沙國的國家發展，沙國

²⁰ 法赫德計畫的內容包括：沙國要求以色列退出1967年的佔領地，讓所有巴勒斯坦難民回到以色列建立國家，並與以色列共同將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等。其中最具有突破性的是第七條：「它宣稱此計畫的通過將會約束所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平相處。」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saudi-crown-prince-fahd-s-eight-point-peace-plan>

²¹ 由於沙國在兩伊戰爭中大量金援伊拉克，必須加大其石油產量。而世界經濟自1973年石油危機後陷入大衰退，情況仍尚未復甦，超額的石油供給與減弱的需求，進而導致國際油價自1980年代起開始一路崩跌，受害最深的即是沙國與海灣國家。

<https://www.nytimes.com/2008/03/03/business/worldbusiness/03cnd-oil.html>

權力將大幅衰退，因為石油收入是沙國唯一最具影響力的工具(Trofimov, 2008)。石油收入作為其最大的影響力來源，一旦缺少豐沛的石油收入，沙國經濟發展立刻陷入衰退，必須縮減其大量的公共支出。

國際油價圖(1950-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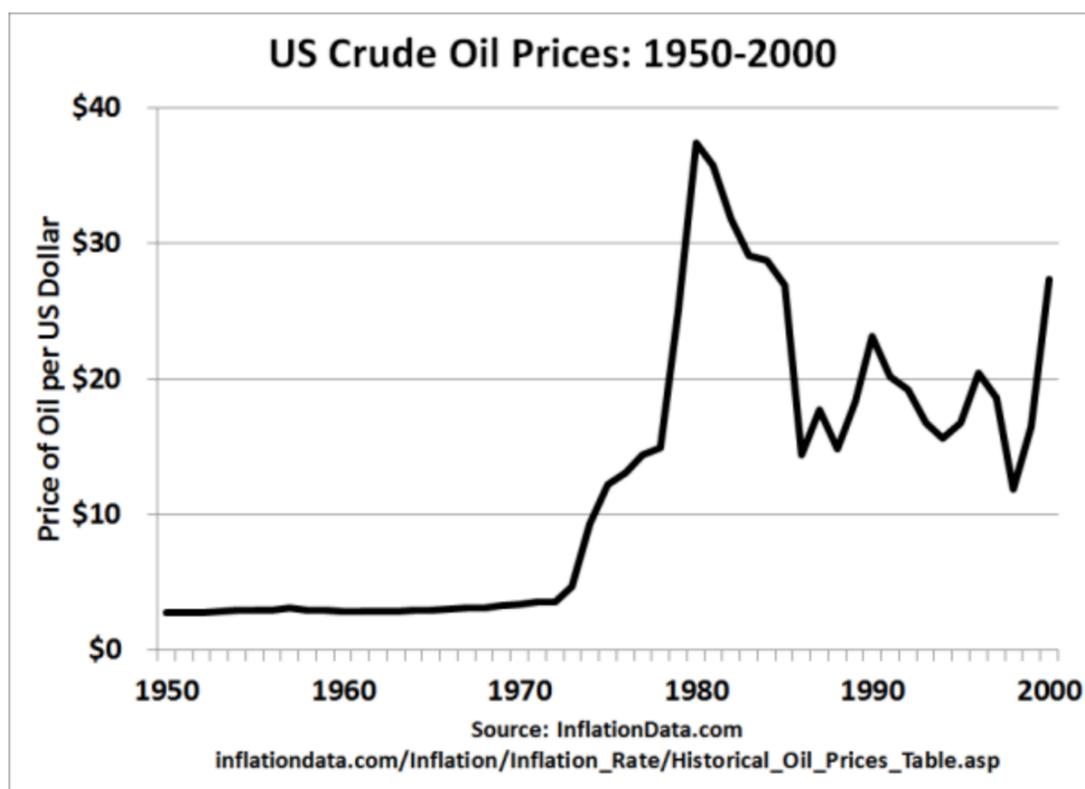


圖 7，資料來源：<https://www.euromoney.com/article/b12kzj06p6fd3h/oil-price-lessons-from-1983>

兩伊戰爭也導致沙國不安全感提升，為防止戰爭的風險擴散至海灣國家，沙國不得不採取行動統合海灣國家，因而創立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保持海灣地區在兩伊戰爭中的區域安全與穩定。海合會的創立進一步鞏固沙國在海灣國家的領導地位。透過海合會的平台，沙國能夠帶領海灣國家採取一致的外交、軍事、經濟等政策。海灣國家間的政策也由於海合會的建立而逐漸趨於一致，更加深化沙國在海灣國家中的強權地位。

以色列在 1979 年後的內部發展更加艱辛，致使其對外政策轉為強硬。伊朗原為以色列在中東的重要盟國，雙方都不是阿拉伯國家的特點，促使兩國展開良好的結盟政策以平衡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威脅(Parsi, 2007; Kaye, Nader & Roshan,

2012)。但伊朗革命後，以色列變得更加孤立，此一情形導致以色列在以巴問題上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捍衛以色列的生存(Parsi, 2007; Kaye, Nader & Roshan, 2012)。自 1967 年後，以色列佔領的土地成為以阿之間最主要的衝突點，以阿衝突也由單純意識形態之爭轉變為資源上的衝突。以色列不但堅決不撤離，更加大所佔領土的開墾行為，試圖將其永久劃為以色列領土的一部份，導致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關係更為緊張。此外，以色列的強勢也展現於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上。以色列將 PLO 視為恐怖組織，極力根除 PLO 在黎巴嫩的據點²²。短期來看，以色列成功削弱 PLO 的勢力。然而，長期而論，以色列的強勢態度卻更加激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對立。利用武力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以巴問題，反而導致巴勒斯坦人的不滿更加擴大。

總結上述分析可知，由於內部的壓力激增，沙以兩國在此時雙雙重新走向保守路線，更加著重於宗教與民族主義的發展。沙國為穩固政權加大宗教對社會的控制。同時，由於國際油價的崩跌，沙國影響力因而弱化，導致沙國試圖利用統合海灣國家增加其區域影響力，彌補國際影響力的下滑。以色列雖成功以外交方式處理最主要的戰爭對手—埃及，以土地換取和平。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在領土問題以及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越發強硬。不但拒絕撤出領土，更發動清除 PLO 的以黎戰爭，導致以巴之間的立場越來越激化，以色列試圖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加大對巴勒斯坦的控制與開墾。

就沙以外交關係的脈絡分析，保有一定區域實力的沙國，其國內發展越傾向保守路線，作為阿拉伯世界抗衡以色列的角色就越發明顯。同時，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作為越來越強硬，更加激發以巴間的緊張關係。沙以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日漸嚴重，可歸因於自身的內部發展趨於保守。由內部因素的面向關之，由

²²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展開加利利和平行動(peace of Galilee)。以色列派出正規軍對 PLO 展開猛烈的攻擊，目的為掃盪黎巴嫩境內的 PLO 組織，試圖全面根除 PLO 在黎巴嫩境內的所有活動據點。此次事件中明確顯示出以色列打擊 PLO 的決心，也很成功地將 PLO 的勢力趕出黎巴嫩，迫使其將總部搬移至突尼西亞。

<https://mfa.gov.il/mfa/aboutisrael/history/pages/operation%20peace%20for%20galilee%20-%201982.aspx>

於區域環境的變動(伊朗革命、兩伊戰爭)，沙國與以色列必須確保國家內部的穩定，因此雙方政權均逐漸擁抱國內的保守派，致使意識形態的差異又必須再次被彰顯，導致沙以關係陷入低點。

(二) 區域因素

伊朗革命成功使得伊朗國家路線偏移至「保守」與「激進」，同時也鼓舞中東地區的宗教保守派，使其相信宗教的力量有可能推翻世俗的統治者，建立全然的伊斯蘭政權(Matthiesen, 2015)。基此，伊朗的伊斯蘭神權體制開始大肆抨擊伊斯蘭國家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伊朗認為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早已背棄伊斯蘭的精神，與邪惡的西方帝國主義合流(Rabi & Mueller, 2017)。

沙國自 1960 年代起與美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至 1970 年代沙美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頻繁，此舉正好成為伊朗抨擊沙國的主要論點。然而，僅僅遭受伊朗的批評確實不可能引起沙國統治階層如此劇烈的擔憂。真正的問題在於，沙國的統治合法性將會因此受到質疑(Rabi & Mueller, 2017)。沙國身為麥加與麥地納兩聖地的守護者，象徵伊斯蘭世界的神聖與團結，應當維持自身的崇高性，然而，沙國卻與美國開展緊密的合作關係，往往在立場上表達親美的政策。這樣的態度使得沙國國內的保守派對王室的行為感到厭惡，更不利於沙國國內的政治穩定(Safran, 1988)。

此外，伊朗所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由什葉派所組成。然而綜觀其他周邊阿拉伯國家，什葉派趨於少數地位，時常遭受遜尼派多數的壓迫(Matthiesen, 2015)。伊朗革命成功鼓舞少數什葉派團體能藉此契機，翻轉多年來被壓迫的處境。他們公開表達對遜尼派政府的不滿，也因如此，沙國面臨巨大的挑戰(Matthiesen, 2015)。這些抗爭使得沙國王室的統治基礎受到巨大的威脅，同時沙國也深怕革命後的伊朗，利用沙國境內什葉派勢力推翻王室或是對外輸出革命，將伊朗的影響力投射至沙國境內，因此沙國必須極力防堵伊朗伊斯蘭革命勢力的擴張(Parsi, 2007)。

簡言之，沙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是由外而內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引爆點實屬伊朗革命成功。伊朗革命對沙國的威脅並不在於伊朗的軍事、經濟等外部力量，而是伊朗觸發了沙國原本就並不穩固的內部問題(Trofimov, 2008)。看似穩定的沙國，內部組成大相逕庭，從親西方到極端宗教主義，或是由多數遜尼派至備受壓迫的什葉派。沙國平時能利用國家力量與豐富的經濟資源壓制內部的動盪。然而，伊朗革命將壓力宣洩開來，由意識形態作為主要的武器，鼓動沙國境內的不穩定力量挑戰皇室統治，這使得沙國陷入極大不利的狀態，從而必須耗費更大的精力才能將此一浪潮平息。

自伊朗革命成功後，以色列與伊朗的關係逐漸惡化，伊朗重新擁抱巴勒斯坦議題，開始強烈抨擊以色列竊佔巴勒斯坦領土，否認以色列的存在正當性(Parsi, 2007; Kaye, Nader & Roshan, 2011)。伊朗試圖將以阿問題當作新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以色列不得不開始提防伊朗所造成的威脅(Parsi, 2007)。此時，以色列在中東的處境變得更加險峻，伊朗的改變使得以色列頓失盟國，為能繼續平衡外部威脅，以色列向外尋求盟友的意圖越來越強烈(Brown, 2004 ; Parsi, 2007)。

因此，原逐漸惡化的沙以關係在 1979 年之後出現轉機，蓋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帶來更巨大的威脅因素，迫使沙以面對伊朗必須採取實際行動。沙以面臨共同威脅—伊朗，成為兩國開始進行實質合作的主要因素。此外，仍有兩大因素間接促成沙以結盟的外交關係。首先，有鑒於沙國沒有強大的軍事能力，一直以來沙國當局在以阿衝突當中皆尋求協商的解決方式，因為一但發生實體戰爭，沙國並未具有軍事優勢。另外，不同於其他阿拉伯國家，沙國從未宣稱要消滅以色列，儘管以巴問題仍被沙國視為維護正統性的來源之一，但沙國始終尋求溫和的解決方式。與此同時，沙國自 1970 年代後掌握對石油的定價權與成功統合海灣國家，區域影響力因而大增。藉由沙國在海灣地區的領導地位，以色列與沙國的結盟將有可能導致其他海灣國家進行扈從(bandwagon)，一起和以色列發展結盟關係，沙以的結盟將有可能獲得額外的外溢效應。

以利益平衡論的角度觀之，沙國與以色列在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後，共同面對現狀的改變—伊朗革命。雙方對於現狀改變的認知趨於一致，亦即沙以均認為伊朗革命的現狀改變不利於各自的國家安全，因此，雙方會採取維護現狀的手段做為回應。顯然地，沙以理當選擇共同合作以制衡(balancing)伊朗作為回應手段。然而，緊接而來的兩伊戰爭卻嚴重改變此一關係，最大的改變在於原先的行為者只有伊朗、以色列與沙國三者。然而，當伊拉克被納入戰局後，沙以之間的外交關係隨即產生改變。

1979 年的伊朗革命不僅影響沙國與以色列，更波及到伊朗的鄰國伊拉克。伊拉克自海珊上台後，逐漸展現出稱霸中東地區的企圖心，尤其在《埃以和平條約》簽訂後，伊拉克想藉此填補埃及留下的權力真空(Brands, 2011)。此外，伊朗革命危急到海珊政權的統治基礎，海珊深怕伊朗會向伊拉克輸出革命，推翻統治當局，因此決定在伊朗尚未站穩腳步之際，向伊朗發動戰爭防止威脅擴大(Kamrava, 2005)。兩伊戰爭看似均對沙以有利，蓋伊拉克所開戰的對象是威脅沙以安全的伊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沙以兩國的立場卻在兩伊戰爭中產生嚴重的分歧。

雖然不論是伊朗或伊拉克獲勝，均對沙國產生不利之影響，但是伊朗的獲勝將對沙國造成較大的傷害(Brands, 2011)。倘若伊拉克獲勝將坐實其中東區域強權地位，這使得沙國想要填補權力真空的希望破滅。此外，與伊拉克有領土接壤的沙國，也不願見到鄰國伊拉克變得強大。但假使伊朗獲勝，將嚴重削弱沙國與伊朗的權力關係，伊朗藉由輸出革命推翻沙國政權的企圖將得以實現。

相較之下，伊拉克對沙國的威脅較伊朗來的小，沙國與伊拉克同為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縱使伊拉克因為兩伊戰爭的獲勝而實力急遽提升，伊拉克也不會立即威脅沙國王室的統治，充其量只是安全威脅增加而已(Parsi, 2007)。然而，伊朗的壯大就意味著沙國必須立即承擔起政權被推翻的風險，因此沙國在兩伊戰爭中選擇支持伊拉克，開始向伊拉克提供許多金援貸款(Podeh, 2018)。同時，沙國利用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作為團結海灣國家的工具，藉由控制該會試圖不讓任何海灣國家個別涉入戰爭，一同防範伊朗(Podeh, 2018)。

以色列對於兩伊戰爭的回應截然不同於沙國。以色列選擇與伊朗站在同一陣線。對以色列來說，擁有強烈擴張企圖的伊拉克更加危險(Brands, 2011)。海珊自上台以來，將“消滅以色列”作為凝聚阿拉伯國家間的合作基礎，更多次公開發表主張消滅以色列之言論(Parsi, 2007; Kaye, Nader & Roshan, 2011)。海珊藉由激化對以色列的立場，凸顯對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忠誠，積極證明海珊領導的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領導者(Parsi, 2007)。基此，「威脅強弱」是以色列選擇幫助伊朗的主因。伊拉克對以色列的敵意不僅止於言語，海珊為平衡以色列的權力，在1980年代後開始暗中發展核子武器，挑動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經(Brands, 2011)。與此同時，伊拉克在1980年代擁有美蘇的軍事支援。反觀伊朗在革命後隨即被美國切斷所有援助，故以軍事實力的角度來衡量，伊朗的威脅遠低於伊拉克(Parsi, 2007)。自兩伊戰爭爆發以來，以色列與伊朗暗中進行多項合作²³，以色列唯一的目的是幫助伊朗，遏止伊拉克在中東擴張的企圖。

綜上所述，兩伊戰爭再次改變中東現狀。伊拉克主動向伊朗宣戰，導致沙國與以色列必須對現狀改變再次作出回應。對沙國來說，伊拉克對伊朗的戰爭將有利於沙國的國家安全，沙國可藉助伊拉克的力量順勢壓制伊朗向外顛覆政權的危機。因此，沙國視改變現狀為有利的情況，選擇採取豺狼型扈從(jackal bandwagon)資助伊拉克，期望能藉助伊拉克的力量進一步限縮伊朗。然而，以色列對現狀改變的看法迥異於沙國。以色列將伊拉克改變現狀的行為視為對現狀的威脅，若伊拉克擊敗伊朗將更加提升對以色列的威脅。因此，以色列選擇維護現狀，採取聯合伊朗的政策制衡伊拉克。

²³ 以色列多次派遣戰鬥機飛往伊朗運送武器，武器援助成為以色列幫助伊朗的主要方式。伊朗也同意境內的猶太裔伊朗人移民至以色列與美國，藉此展現對以色列的善意。< Trita Parsi(2007). *Treacheries Alliance: the secret dealings of Israel,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沙國與以色列對伊朗革命的看法一致，本應採取合作加深雙方的外交關係。但兩伊戰爭的爆發改變此一情形，沙國與以色列對兩伊戰爭的認知不同，因而形塑出相異的戰略。沙國將其視為獲得利益的機會，而以色列則視其為利益損害的威脅，因此雙方採取截然不同的戰略維護自身國家安全，因此，此時沙以外交關係仍處於對立的狀態。

(三) 外部勢力

伊朗革命與兩伊戰爭全面深化美國對沙以的重要性。伊朗革命完全改變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佈局。長期以來，美國中東政策奉行兩大準則—確保原油供應、圍堵蘇聯擴張。然伊朗革命使得美國所確立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 policy)不復存在，波斯灣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受到強烈影響(Brown, 2004)。此時美國中東政策必須思考，如何在沒有伊朗的情況下繼續維護波斯灣地區的穩定(Parsi, 2007)。同時，美國也必須防止伊朗革命繼續向外擴張，以免危及到親美的中東政權(Parsi, 2007; Douglas, 2008)。

同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深怕伊朗會成為蘇聯下一個入侵目標，將嚴重威脅美國在波斯灣的利益。首先，美國為防止蘇聯勢力深入海灣地區，因此希望武裝海灣國家，使其有對抗蘇聯進犯的能力。另一方面，蘇聯作為共和制無神論的共產政權，無論在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上，均與沙國相互抵觸，自然帶給沙國莫大的恐懼(Wynbrandt, 2010)。因此，沙國入侵阿富汗的行為也升高沙國的威脅。再加上隨後爆發的兩伊戰爭，美國為確保沙國的政權穩定，沙美間的軍售大量開展(Wynbrandt, 2010)。

Figure A-I. U.S.Arms Sales to the Middle East
1950-2017, All figures in billions of doll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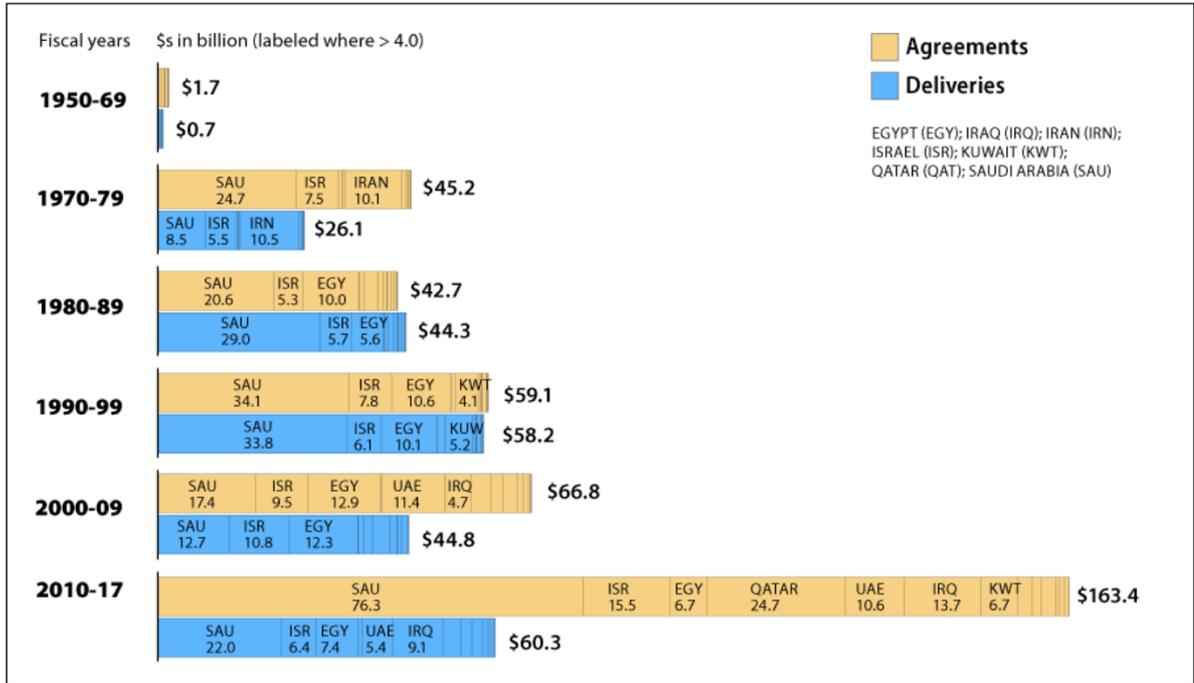


圖 8，資料來源：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rms sales in the middle east: trend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S policy.

綜觀整個 1980 年代，沙美間的軍售數量與金額來到史無前例的高峰 (Wynbrandt, 2010)。對美國來說，加大軍售是必要且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決定，一方面震攝伊朗及蘇聯，另一方面確保波斯灣地區石油供應穩定 (Brown, 2004)。沙國此時的外交政策，選擇扈從美國，換取美國的安全保障。沙國將美國的支持做為確立自身實力的一部分，雙方以武力保護換取石油供應的關係也在此時逐漸確立 (Parsi, 2007)。

相較於 1970 年代，進入 1980 年代後美國對沙以的角色更為深化。主要原因是沙以均需要美國的保護與軍售達到防止外部威脅的目的。自 1979 年後，美國、沙國及以色列三國的關係更加緊密，連帶影響沙以關係的開展，朝向非正式的合作關係邁進。當沙以越來越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美國就越有籌碼能影響沙以的執政當局，更能將影響力擴及雙方的外交發展。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沙以長久以來的最大障礙——以巴問題。美國認為以阿問題並不利於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

(Brown, 2004)。然而單以美國的力量並不足以全面解決以巴問題，反而必須透過阿拉伯國家內部整合，才有可能與以色列達成真正的和解。沙國作為阿拉伯領導大國，與以色列之外交關係的好壞，很大一部份取決於以巴問題(Rabi & Mueller, 2017)。因此，美國的解決方法是透過軍事、經濟的手段作為槓桿，加深沙以對美國的依賴，但又同時施壓沙以兩國努力謀求改善以阿衝突。只要以阿間的關係越緩和，美國對於中東地區的掌控就越順暢。

美國利用強大的綜合實力，在沙以關係當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首先，1979年後的中東政局對沙國與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更為不利。區域內爆發兩伊戰爭，外部則有蘇聯的入侵。因此，平衡外部威脅這一需求，深化美國對沙以關係的重要性，美國利用軍售與軍事保護支持沙以兩國的安全。然而，這也給予美國有效的切入點，利用對美的依賴，施壓沙以兩國導引出符合美國利益的外交走向(Mandelbaum, 2016)。

雖然以色列仍對沙國軍事實力成長抱持反對態度。以色列自 1970 年代後作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國，自然不需要擔心美國對其所給予的軍售、經濟與外交等援助。然而，以巴問題終究尚未解決，沙以之間也沒有達成關係正常化。以色列擔心一但沙國軍事實力激增，有可能將此轉化為對抗以色列的力量(Henriksen, 2017)。與此同時，隨著兩伊戰爭開打，沙以分別支持不同陣營，這也使得以色列持續對美沙軍售深表不安。擁有美國大量的援助固然重要，但以色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實力落差也是其考量重點之一。以色列因而動員強大的美國猶太裔遊說集團向美國國會施壓，否決多項沙美軍售案件，仍可看出以色列仍對沙國的壯大多所顧忌(Henriksen, 2017)。然而，美國作為強大的中介者，採取剛柔並濟的方式平息以色列不滿。美國政府依然以強硬方式通過沙美軍售，但另一方面，美國則向以色列提供相等的新式武器以及大量貸款，以確保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優勢，化解以色列的擔憂(Henriksen, 2017)。

美國援助以色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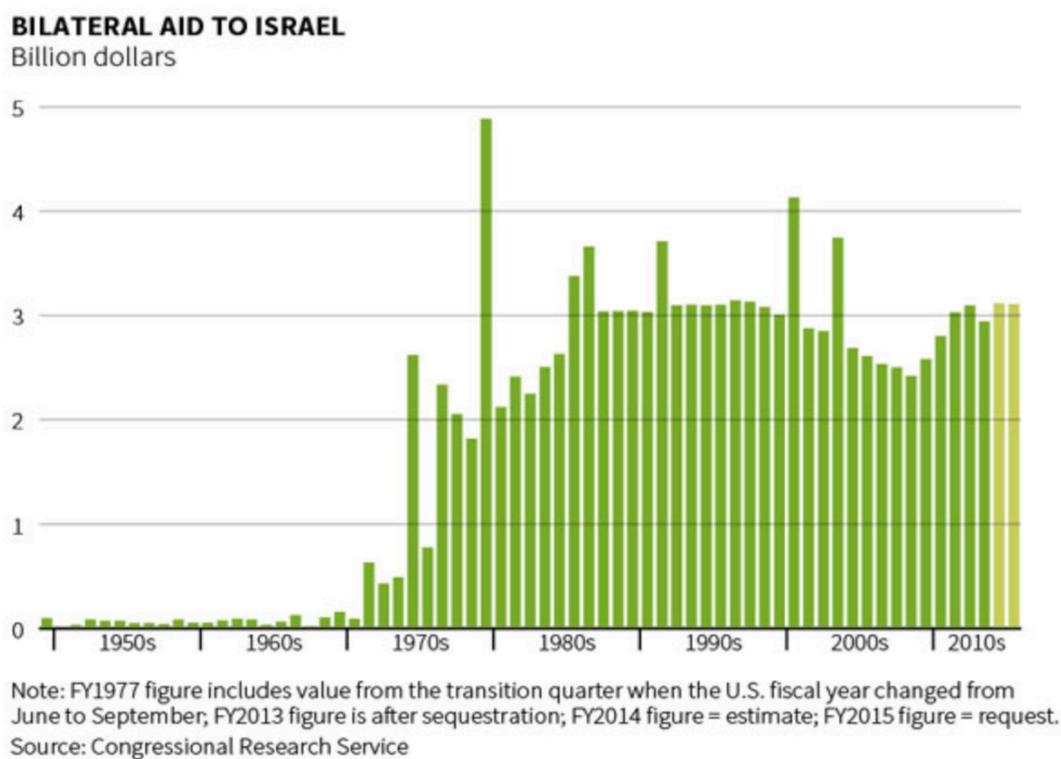


圖 9，資料來源：<http://blogs.reuters.com/data-dive/2015/03/02/a-relationship-beyond-obama-and-netanyahu/>

總結來說，1979-1991 年，由於入侵阿富汗的行為惡化蘇聯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蘇聯喪失在中東地區的優勢，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逐漸形成(Safran, 1988)。原本就依靠美國的沙以更在此時全面深化對美國的依賴，形成扈從的外交路線。透過美國的安全保證，沙以能夠確立自身的國家安全。另一方面，美國利用強大的影響力介入沙以外交關係，因而成為沙以關係的中介者，此舉能減少沙以間的誤判與衝突，將沙以之發展帶往有利美國的走向。沙以在這樣的架構下逐漸形成緊密的美、沙、以三邊關係，雙方顯然並未有威脅之意圖，取而代之的是共同成為美國的盟國以抵擋外部威脅。以利益平衡的角度分析，沙以均視美國崛起為改變現狀的機會，因而選擇扈從美國，如此能更加確保自身的安全與穩定。

(四) 結論

1979 年後，美國的角色成為沙以外交關係的重要因素。美國在 1979 年後確立為中東主要外部勢力，沙以為確保自身安全，因此更加仰賴美國的軍售與援助，形成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然而，此一關係也產生出雙向的效果，美國給予沙以大量武器與援助時，也能以此為槓桿影響沙以兩國的決策圈，將沙以兩國的外交關係形塑出符合美國利益的走向。亦即美國能作為沙以外交關係的中介者，適時地調停、牽制沙以外交關係的走向。因此，儘管沙以在內部發展與安全威脅中處於對立關係，透過美國的約束並不至於爆發大規模的衝突。由美國主導所形成的美、沙、以三邊關係在 1979 年後正式確立，儘管雙方外交關係主要受安全威脅所影響，但美國的力量能防止沙以外交關係出現誤判與衝突，持續保持在和平的範圍之內。

區域因素依然是沙以外交關係的重要因素，因為在區域因素的變動下，往往直接造成沙以國家安全的變動，雙方會視安全利益的變動而調整戰略。然而，在 1979 年後，沙以所重視的國家安全，不再只單純受到區域變化所影響。由於對美國採取扈從的外交路線，沙以的安全發展與美國的安全保證產生連結。美國作為外部強權，以自身雄厚的軍事實力，恫嚇沙以的潛在敵人，給予雙方安全保證。另一方面，由於沙以對美國的依賴增加，外部勢力開始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而且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形塑出沙以外交關係的真正發展。美國利用其優勢力量將沙以連結在一起，不允許沙以的衝突升高，為沙以外交關係打開合作溝通的管道。在美國勢力的壯大之下，沙以均將其視為改變現狀的機會，因此選擇扈從美國，藉此穩固自身國家安全，但同時沙以的外交走向，也逐漸受制於美國的態度。區域變動依然會觸發沙以關係的變動，但美國勢力將會決定最終的發展態勢。

基此，沙以外交關係在 1979 年後出現轉折，美國力量成為影響沙以關係的最重要因素。儘管區域因素仍然驅使沙以採取有利自身的外交政策，但整體上仍受制於美國的掌控。首先，由內部的角度可發現，沙以的關係呈現越來越對立的

情況。沙國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且重新走向保守路線，必然在意識形態上更加敵視以色列。相對地，以色列也未對巴勒斯坦問題作出任何妥協，持續佔領土地、高壓統治巴勒斯坦。再者，由區域因素分析，沙以雙方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不同陣營，並且採取實際行動幫助所支持的國家，導致兩國呈現對立狀態。由內部因素與區域因素觀之，沙以關係均呈現惡化趨勢，然而卻未演變為實際衝突，反而維持一定程度的和平。筆者認為可歸因於美國勢力介入，牽制沙以關係的分歧以符合美國利益，沙以也能透過美國的角色維持互信關係，在在顯示出美國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已逐漸成為關鍵因素。

二、1991-2001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合作之路的曙光—從波斯灣戰爭到奧斯陸協議

美國在冷戰後對沙以關係的影響力進一步深化，導致沙以關係進入高速發展時期，間接開創出長達十年的中東和平進程。此時美國對沙以關係的影響來到高峰。內部方面，美國利用其優勢地位引導沙以雙方擱置意識形態之爭，外部方面，透過扈從美國的外交政策，沙以均不需過度擔心區域安全的威脅，進而願意開展正向的外交發展。

(一) 內部因素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再次牽動沙國與以色列的內部發展，進而加速兩國外交關係的進展。沙國自波斯灣戰爭後開始意識到自身危機—沙國的脆弱性問題。儘管沙國購買許多新式武器看似安全無虞，但當波斯灣戰爭一爆發，沙國並未有相對的人力、物力、戰術等資源保護自己，仍必須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另一方面，波斯灣戰爭爆發後大量美軍進駐沙國也引發另一問題，即國內宗教保守派的強烈反彈(Wynbrandt, 2010)。基於意識形態，他們對美國的敵意格外嚴重，堅決反對美軍進入沙國，以免玷污神聖的伊斯蘭聖地。宗教保守派人士在沙國具有非常高的

影響力與社會聲望，沙國當局更依賴其作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因此不得不正視宗教保守派的反對意見。

與此同時，波斯灣戰爭的危機釋放沙國內部積累已久的壓力，有鑒於沙國自身的脆弱性—國家無法在危難時刻保護自己，必須仰賴美軍的保護。許多人開始起身提倡改革，認為保守勢力阻礙其發展道路(Wynbrandt, 2010)。改革沙國的想法逐漸在沙國內部發酵，越來越多人響應改革。改革的內容包含自由權利、政府組織、法律制度等等，其中更爆發實際行動向政府表達訴求的案例，例如沙國婦女汽車事件²⁴。但是沙國的改革呼籲卻也加深宗教保守派的反對，他們不滿日漸傾向世俗化的沙國社會，開始策劃多起針對沙國境內美軍的恐怖攻擊。此時，沙國社會中保守與世俗的關係越來越對立(Wynbrandt, 2010)。沙國在波斯灣戰爭後，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王室改革，儘管仍有為數眾多的保守派反對，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沙國對改革派的態度不同於以往，並未大肆鎮壓改革要求，反而接受其中部分訴求，向改革派作出妥協(Wynbrandt, 2010)。當沙國社會不再只被宗教保守派力量所壟斷，逐漸傾向於世俗化時，更有利於沙以關係的進展。

以色列在波斯灣戰爭後，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產生全面性的進展。首先，以色列在海灣戰爭期間，雖遭受伊拉克的攻擊卻仍不為所動，奠定與阿拉伯國家的互信，雙方的非正式合作關係為以阿和平進程拉開序幕。以色列當局開始將緩和周邊阿拉伯國家關係作為重要的政策方向(Parsi, 2007; Wynbrandt, 2010)。波斯灣戰爭重塑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除雙方在戰爭中的合作外，以色列公眾輿論對阿拉伯世界的好感度也大幅提升(Peretz, 1991)。

相較於波斯灣戰爭前，以色列經歷巴勒斯坦大起義，以巴問題的矛盾更加被凸顯出來。以沙國為首的阿拉伯國家紛紛替巴勒斯坦發聲，此時沙以關係陷入低

²⁴ 1990年11月六日，45位沙國婦女公然開車進入首都利雅德，以行動抗議沙國仍不准婦女在沙國境內開車的規定。事後他們全部失去原有工作，護照也被扣留。但時任國王法德卻接見其中四位婦女，公開表達支持其訴求。六個月後，這些婦女全部回復原本的工作，也拿回被扣留的護照。<James Wynbrandt(2010). *A brief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點。然而，海珊對科威特的入侵，打破沙以之間的僵局。以色列在戰爭中的克制，防止戰爭升級為以阿衝突，成為沙以合作的契機。以色列與沙國均在戰爭中保持同樣立場，遏止海珊的侵略行為。然而，PLO 卻在海灣戰爭中採取相異的立場，PLO 選擇支持海珊政權，此舉嚴重牴觸以色列和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利益。果不其然，當海珊輸掉戰爭後，以色列國內輿論出現非常大的轉變。首先，以色列對在戰爭中維持同一陣線的阿拉伯國家，好感度急速提升。這樣的轉變浪潮也促使以色列當局的對外政策由之前的強硬轉為趨緩，雙方均希望將戰爭中的合作關係，延伸至其他領域，藉此緩解以阿間的緊張關係(Peretz, 1991)。另一方面，以色列公眾對巴勒斯坦的好感度則更加下降，巴勒斯坦被視為支持海珊的敵人，刻意在波灣戰爭中顛覆以色列安全(Peretz, 1991)。基此，波灣戰爭對沙國的影響迥異於巴勒斯坦，以色列外交政策對沙國為首的阿拉伯國家開始趨向於和解、交流。相反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態度則持續保持強硬。因此，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的態度產生脫鉤，以色列不再僅將以巴以及以阿關係視為一體，反之將其分開處理。因而造成沙以在戰後對巴勒斯坦問題產生共識，由沙國開始施壓 PLO 進行以巴和談。一方面延續沙以關係的良好發展。另一方面，沙國能藉此機會向 PLO 報復在戰爭中支持海珊的行為。PLO 為求重新獲得沙國的金援與支持，不得不妥協與以色列和談(Parsi, 2007 ; Wynbrandt, 2010)。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波斯灣戰爭是沙以關係加溫的重要開始，沙國與以色列在戰爭期間培養互信基礎，戰後沙國逐漸解除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經濟抵制(Parsi, 2007 ; Wynbrandt, 2010)。此外，戰後以色列當局將重點置於緩和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上，而非過去將以巴問題和以阿關係掛鉤，因此逐漸願意繞過以巴問題，採行談判、協商的方式處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Peretz, 1991)。波灣戰爭後，以色列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已不再將其視為以巴問題的一部分，反而將其抽離出以阿衝突的脈絡。亦即以色列不必先處理以巴問題才能與阿拉伯國家交好。反之，以色列開始率先和沙國與阿拉伯國家發展關係，才進而影響以巴問題的發展。

(二) 區域因素

1991年波斯灣戰爭促成沙以外交關係的重大進展。首先，沙國與伊拉克領土接壤，雙方在地緣關係上非常敏感，伊拉克一旦獲得科威特，便擁有充足的波斯灣出海口，在經濟與戰略上的影響力將因此大增(Kaye、Nader&Roshan, 2011)。此外，波斯灣地區一直以來被沙國視為勢力範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舉動，無疑是打擊沙國在此地的威信(Kamrava, 2005)。最後，石油是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倘若伊拉克成功併吞科威特，將會獲得超過沙國的石油產量，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會由沙國轉向伊拉克 (Henriksen, 2017)。故沙國在波斯灣戰爭爆發之際，立即選擇制衡伊拉克的外交政策。然而，沙國自身並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奪回科威特，因而必須依靠美國。

以色列長期將遏止伊拉克擴張作為外交政策之一，海珊所展現的敵意遠大於其他阿拉伯國家，海珊將以色列視為阿拉伯世界的首要敵人，並試圖將其消滅。此外，在海珊政權下，伊拉克暗中發展核武也挑動以色列最敏感的核心—國家安全的威脅(Brands, 2011)。因此，如何壓制伊拉克的擴張成為以色列最重視的政策。同樣地，以色列在波斯灣戰爭爆發之際，仍維持其一貫之外交政策—制衡伊拉克。然而，在戰爭期間，海珊攻擊以色列，誘使以色列反擊，將戰爭擴大為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戰爭，但卻在以色列的自我控制下，不對伊拉克反擊，不升高衝突，順利將戰爭限制於區域層面，並未升高為以阿衝突(Parsi, 2007)。由於波斯灣戰爭的合作關係，以色列不再被中東國家孤立，反而逐漸與阿拉伯國家發展非正式關係，開始步入全新的發展模式，基此，沙以合作的態勢將越來越明顯，除共同制衡伊拉克之外，雙方也開始在以巴問題上展開合作。

綜上所述，以利益平衡論的角度分析，沙國與以色列對伊拉克顛覆現狀的反應一致。沙以將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視為改變現狀的威脅，為保持現狀而採取制衡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同時，在1989年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過世後，伊朗當局改採取務實主義，不主動挑起區域間的衝突。因此在1990年代，伊朗對於沙國與

以色列的威脅漸減，取而代之的是伊拉克的擴張行為，這導致沙國與以色列致力於共同制衡伊拉克(Kaye, Nader & Roshan, 2011)。

沙國與以色列在 1991-2001 年這段期間，「目標一致」成為雙方外交關係發展的契機。在海灣戰爭期間，沙以共同對抗伊拉克的行為，為日後的外交關係奠定互信基礎。因此，戰爭結束後沙以外交關係隨即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戰後伊拉克實力被大幅削弱，在安全層面上並未對沙以造成威脅。另一方面，伊朗進入後何梅尼時代，不再將意識形態作為指導方針，反而漸漸偏向實用主義，且不主動挑起區域爭端。因此大大降低沙國王室對激進主義的擔憂，不必時時提防伊朗的威脅，導致沙國願意積極推動以巴和談，掃除沙以關係之間的障礙。區域因素所引發的安全威脅降低，為沙以關係鋪平道路，沙以關係朝合作的方向邁進。

(三) 外部勢力

蘇聯於 1991 年 12 月倒台，標示著長達 44 年的冷戰正式結束，美國成為世界的唯一強權，間接影響中東政策的制定方式。美國在冷戰時期的中東政策主要有二點；第一、維持石油供應穩定，第二、全力封鎖蘇聯在中東地區的擴張(Brown, 2004)。冷戰結束後，美國中東政策能完全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再也不必擔心蘇聯的掣肘(Douglas, 2008; Halab, 2009)。此時美國中東政策最大的變異在於國家利益程度的轉向。冷戰時期的利益程度聚焦於美蘇在國際社會的競逐，冷戰後則將注意力投射於美國利益之上(Halab, 2009)。冷戰結束後的美國中東政策逐漸轉變為兩大目標，第一是維護海灣產油國家的安全，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第二是在美國主導的框架下，促進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Douglas, 2008)。此外，中東的區域強權分佈有两大类，美國各有其應對之道。首先，美國持續維護與盟國的良好關係，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科威特、以色列、埃及等。再者，美國致力封鎖敵對關係之國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這些國家均不具備與美國相抗衡的能力，因此，單靠美國自身的國力就足以遏止。

由於美國在冷戰後成為霸權，尚無任何國家能與之匹敵，在在證明沙國與以色列長期實施的外交政策一扈從美國，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然而，享受美國安全保障的同時，沙國與以色列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沙以外交政策的發展將部分受到美國當局的左右，形成一從屬關係。特別在波斯灣戰爭後，給予美國良好的立基點處理沙以關係。長期以來，沙以雖身為美國的盟國，但在以巴問題上往往產生嚴重分歧。然而，在美國勢力的主導下，解決以巴問題將更加穩固美國的中東利益，因此將以巴和談視為美國中東政策的目標。美國的強大實力為沙以消除安全威脅的疑慮。同時，美國也對沙以當局施加壓力，為求解決以巴問題，美國盡力克制沙國與以色列任一邊的激進行為，試圖尋找平衡，使沙以願意擱置意識形態的分歧，展開一系列的和平談判。

因此，在美國的推波助瀾下，沙國與以色列的關係透過以巴和談，一步步地向和解的方向邁進。沙國長期以來對 PLO 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能利用金援等手段干預 PLO 的決策。基此，有鑒於以色列當局態度放緩，以及沙國開始向 PLO 施壓，在 1991-2000 這十年間，以巴和平進程快速推進。從馬德里和會(Madrid Conference)²⁵到《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後更外溢出額外的效應，亦即以巴和談的氛圍帶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展開談判，包括 1994 年約旦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以及 1995 年以色列與敘利亞展開協商，甚至以色列在 2000 年正式撤離黎巴嫩。由此可知，以巴和平進程可視為沙以外交關係加溫後的產物，在以巴和平進程背後，時時能看見沙以在背後操作的影子。雖然沙國始終未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透過美國的幫助，沙以均樂於見到以巴和平進程的發展，如此將有利於自身國家利益。

綜上所述，1991-2001 年時期，外部勢力出現很大轉變。冷戰的終結強化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權力與角色。美國能夠利用強大的實力維護中東區域穩定，同時

²⁵ 於 1991 年在西班牙的馬德里舉辦，由美國與蘇聯共同參與，國際社會試圖拉進多方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敘利亞，一同恢復以巴和談的進程。<James Wynbrandt(2010). *A brief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也能主導中東局勢朝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Douglas, 2008)。簡言之，美國不必再擔心蘇聯對美國的掣軸，美國更專注地推行兩大主要政策—雙向圍堵與以巴和平進程。當美國致力實踐其中東政策的同時，也順帶推進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沙國與以色列自 1970 年代起對美國的依賴逐漸加深，三方更在 1979 年後形成緊密的三角關係。而自冷戰結束後，中東局勢更加強化美、沙、以三方的互動關係。沙、以由於美國對中東的主導能力上升，更加依賴美國提供的保護，採取親美政策無疑是沙以最重要、有效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沙國與以色列對美國依賴越深，就越容易受美國當局的影響。波灣戰爭的勝利為沙以奠定和解基礎，也打開合作的道路。美國作為中東的唯一霸權，可壓制其他可能反對沙以和解的威脅，為沙以關係進展鋪平道路。事實上，美國非常樂意見到中東最重要的兩大盟國彼此發展正向的外交關係。此外，美國致力於以阿和平的路線也連帶為沙以關係掃除障礙。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均能看見美國在其中穿梭的身影。美國作為中介者的角色，一方面敦促沙國向 PLO 施壓使其進入談判桌，一方面約束以色列在爭議領土開墾的行為，藉此創造出最有利以巴和平的環境，此時由美國作為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促成沙以雙方邁向非正式的合作關係。

三、結論

綜上所述，1979-2001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發生巨大改變。最主要的關鍵點在於外部勢力的影響力大增，亦即美國勢力對沙國與以色列的控制力急劇增加。沙以對美國的依賴來自於安全威脅的變化，在 1979 年之前，國家安全主要由沙國與以色列各自承擔，美國的幫助較少。但當 1979 年伊朗革命成功後，沙以均須提防伊朗所帶來的威脅，同時，蘇聯入侵阿富汗也帶來嚴重的不穩定。導致沙以須透過美國大規模的軍售與安全保證，承擔兩國的安全保障，因而以美國為首形成美、沙、以的三邊關係，國家安全的責任開始從沙以自身逐漸轉移至美國，由單純的區域因素過度至外部勢力。雖然安全威脅依然觸發沙以的外交變化，但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沙以的影響力直接導致沙以外交關係的結構性變化，沙以視美國崛起這一事實為改變現狀的機會，進而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美國對於兩國的溝通與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同時能調節沙以外交關係的走向，朝傾向合作的方向發展。因此能解釋兩伊戰爭時，何以兩國在採取相互抵觸的外交戰略時，未爆發任何衝突。此外，在冷戰的終結與波灣戰爭的勝利後，美國作為中東霸權的地位穩固，更進一步推升美國在沙以關係的影響力。整體中東局勢朝美國主導的方向邁進，美國創造出沙以合作的良好環境，不必擔心伊朗或伊拉克的威脅。更由於美國致力推動的以巴和平進程，連帶影響沙國向 PLO 施壓進入談判桌、以色列當局的態度放緩，形成沙以在美國主導下的非正式合作關係。

反觀區域因素與內部發展，在此時沙以外交關係發展中並非最關鍵的因素。沙以對國家安全情勢的變化非常敏感。以利益平衡的視角分析，一但權力平衡的現狀被改變，沙以雙方會隨即修正自身的外交政策以符合改變後的現狀，謀求國家安全最大化。然而，綜觀 1979-2001 年的發展脈絡，沙以外交關係卻並未全然僅跟隨權力平衡而變動。特別是兩伊戰爭時期，沙國與以色列分別支持不同陣營，何以並未爆發衝突或是外交關係惡化，沙國甚至在 1981 年提出法赫德計畫，向以色列提出善意。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力量自 1979 年後影響力逐年

大增，成為決定沙以外交關係的最終決定因素。如前所述，1979年後美國完全主導與沙國、以色列的三邊關係。美國能利用中介、調解、施壓等手段排解沙以外交關係的阻礙，盡可能維持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1991年後，美國的優勢力量更為沙以外交關係帶來十年的紅利時期。基此，筆者認為1979-2001年時期，區域因素僅為沙以外交關係的觸發點，能利用區域變化分析沙以在外交關係的權力改變，然而這並未能推導出最終解果，而必須再將美國的影響套至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如此才能看出沙以外交關係的真實方向。

最後，筆者認為內部發展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相對較小。內部發展體現於沙以政權穩定與以巴問題的態度。沙國政府對國內政治的控制力道很強，因此其外交決策並未被國內發展所宰制，王室擁有足夠的資源對內部發展進行壓制、利誘。因此，沙國對以巴問題的處理方式多取決於王室的態度，而不受制於內部的影響。另一方面，與沙國相比，民主政體的以色列，其國內發展對統治當局具有較高的影響力。但仔細探究後發現，不論由誰執政，以色列在以巴問題的處理模式上差異不大，最主要的要求僅是確保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基此，當沙國能有效控制內部，而以色列對以巴問題的態度保持一致時，內部發展的變化將不會太大，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就顯得相當有限。以巴問題反而成為沙以外交關係當中的談判籌碼，給予沙以雙方操縱以巴問題達成特定目的機會。以巴問題非但不是影響因素，反而是外交關係變化的結果。換句話說，沙以外交關係未受以巴問題的影響，反而是沙以外交關係主動影響以巴問題的發展。

第肆章、2001-2017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

中東的區域發展在 2001-2017 年間發生重大變化，導致沙國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再度發生轉變。本章將分為二節做分析，首先是 2001-2009 年時期。911 事件後美國全力投入反恐，沙以關係多受到美國全球反恐戰爭之影響。同時，海珊垮台後的中東局勢，連帶造成伊朗日漸崛起，影響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模式。2009-2017 年時期，美國開始逐漸弱化對中東事務的關注，大多採取溫和的外交政策。尤其當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各國時，美國並未出手干預。此後，美國甚至打破長年與伊朗的敵對關係，此舉促使沙以之外交關係再次發生重大轉變。

透過分析 2001-2009 年以及 2009-2017 年兩個時期，可發現沙以關係發生一明顯的轉變。由利益平衡論觀之，在 2001-2009 年，美國採取反恐為主的外交政策，此一政策部分與沙國利益相違背，因此沙國將其視為現狀改變的威脅。反之，以色列則受益於美國的反恐外交政策，將其視為現狀改變的機會。因此，沙以採取相異的方式回應改變，沙國不再一昧的親美，反而向外多樣化其外交關係，以色列則持續維持扈從美國的外交政策，形成沙以關係又一次的低點。

然而，在 2009-2017 年時期，美國中東政策又發生變化，由原先的反恐轉為減少干預。美國更在此時與伊朗接觸，試圖解除西方世界對伊朗的制裁，換取伊朗放棄發展核武。在這樣的現狀改變下，沙以均將其視為威脅，因而促成沙以開啟大規模合作以彌補美國勢力的消退，沙以關係又從低點快速攀升至史無前例的高峰。基此，本章將繼續透過內部發展、區域因素、外部勢力三大分析面向，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一、2001-2009 年之沙以外交關係：沙以外交關係的裂解與重組

911 事件後，美國的中東政策大幅轉變，開始以反恐之名，大舉介入中東國家的內政，以防止極端主義的形成，甚至主動打破兩伊相互制衡的現狀，因而導致沙美關係倒退。為確保國家權力，沙國開始拓展其外交路線的其他可能，雖仍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但已不再一味扈從美國。基此，持續跟隨美國陣營的以色列逐漸與沙國漸行漸遠，導致沙以關係在此時陷入停滯。

(一) 內部因素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²⁶使沙國受到世界強烈關注，沙國長期實施的瓦哈比主義(Wahhabism)被認為與極端主義興起有極大的關聯(Bergen, 2002 ; Gordon, 2003)。18 位兇手有 15 位擁有沙國國籍，此外，主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是來自沙國的建築富商(Bergen, 2002)。賓拉登家族過去更與沙國王室有多起商業往來，承攬許多王室的建築工程(Bergen, 2002)。西方國家多認為沙國的教育體制、財政體制與培育、資助恐怖主義的興起有關，美國更首次施壓沙國進行內政改革，導致沙國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Wynbrandt, 2010)。宗教正統性對沙國來說極為重要，這是王室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一但進行內政改革將可能再次刺激沙國國內的保守勢力。儘管意願不高，但為緩和沙美關係，沙國不得不對極端主義採行更加嚴厲的態度，利用國家力量打擊極端主義(Wynbrandt, 2010)。沙國的作法有二層意涵;第一，沙國為緩和沙美關係，必須讓美國相信改革內政的決心。第二，極端主義的發展危及沙國王室。長久以來，保守與進步的矛盾困擾沙國王室，極端主義更時常以恐怖手段表達對沙國王室的的不滿，沙國正好能藉此機會打壓境內極端主義。

²⁶ 2001 年 9 月 11 日，由蓋達組織劫持的兩架民航機，分別衝撞美國世貿中心的雙塔，導致二千多人喪生。<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September-11-attacks>

與此同時，以色列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²⁷以來，以巴關係處於緊張對立的狀態。中斷的以巴和平進程為雙方關係帶來嚴重的不確定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哈瑪斯(Hamas)²⁸不放棄暴力、不承認以色列生存權等立場逐獲得許多巴勒斯坦民眾的支持，更不利於以巴之間的區域穩定。另一方面，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在伊朗的支持下逐漸壯大。他們的興起對以色列無疑構成另一重大威脅。因此，以色列的對外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甚至入侵黎巴嫩，試圖消滅真主黨在黎巴嫩的勢力，確保以色列安全。

與美國和以色列相異的是，沙國承認哈瑪斯並給予援助，並未將其視為恐怖組織。此外，沙國仍積極推動 PLO 與哈瑪斯之間的和解，有鑒於維持區域穩定，沙國希望能繼續保持過去 PLO 與以色列所奠定的基礎，因此主動介入調停 PLO、哈瑪斯與以色列的紛爭。但事實上，調停的結果並未達成沙國所想要的目的，PLO 與哈瑪斯的分裂仍然持續中。沙國在以巴問題的角色顯示，其並未與美國、以色列一樣拒絕與哈瑪斯協商。沙國試圖藉由自身的溫和路線，化解 PLO 與哈瑪斯的分歧以及以巴間的緊張關係。隨後於 2002 年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議(Arab Peace Initiative)²⁹」。該倡議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釋放訊息，沙國主動處理以阿問題，並且有條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沙國想藉此倡議徹底解決長期存在的以阿衝突(Guzansky, 2011 ; Rabi & Mueller, 2017 ; Podeh, 2018 ; Abadi, 2019)。這是沙國史上第一次願意與以色列進行關係正常化。在阿拉伯世界內部方面，沙國為能使協議獲得所有阿拉伯國家的支持，經多次協商後，決定納入敘利亞的意見，要求以

²⁷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利庫德集團黨魁夏隆(Ariel Sharon)，拜訪阿薩克清真寺，觸發巴勒斯坦人的不滿，間接引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長年高壓統治的怒火，隨即引發一系列的暴動。
<https://www.aljazeera.com/archive/2003/12/20084101554875168.html>

²⁸ 成立於 1987 年，堅決不承認以色列的存在正當性，不放棄以武力消滅以色列。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amas>

²⁹ 阿拉伯和平倡議指出，假如以色列願意撤出 1967 年以後所佔的領土以及戈蘭高地和黎巴嫩南部，同時根據聯合國 194 號決議，讓巴勒斯坦難民重回家園，並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國家，沙國將聯合其他阿拉伯國家共同和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發展全面關係正常化。<Elie Podeh(2014).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8, No. 4, pp. 584-603.>

色列撤出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與黎巴嫩南部(Guzansky, 2011 ; Rabi&Mueller, 2017 ; Podeh, 2018 ; Abadi, 2019)。

以色列方面卻對阿拉伯和平倡議反應冷淡(Guzansky, 2011 ; Rabi & Mueller, 2017 ; Podeh, 2018 ; Abadi, 2019)。首先，國家安全一直是以色列最關注的議題，從所佔領的領土退讓，意味著以色列自動減弱對巴勒斯坦的控制，而戈蘭高地控制水源與戰略價制，黎巴嫩南部則能防止真主黨的突襲，以色列自然不願放棄這些領土(Guzansky, 2011)。此外，即使阿拉伯國家都願意與以色列發展外交關係，也並不代表巴勒斯坦問題就會因此而解決，阿拉伯和平倡議就遭受哈瑪斯的強烈反對，此舉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恐怖行動，因此以色列當局並未接受此協議(Abadi, 2019)。

綜上所述，在內部發展的脈絡下，沙國與以色列位於同一立場，亦即打擊極端主義，穩定區域安全。但不同於以色列的強硬態度，沙國始終承認哈瑪斯並嘗試調解巴勒斯坦內部分裂與以巴問題(Kostiner, 2009)。此舉明確顯示出沙國試圖走出自身的外交路線，而非一昧的跟隨美國與以色列。沙國更於此時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議，以承認以色列的安全換取以巴問題的徹底解決。然而，儘管以色列與沙國所追求的目標一致，但要求以色列從既有的領土退讓，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這攸關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展。此外，阿拉伯和平倡議並未如預期般對所有阿拉伯國家產生拘束力，以色列仍必須擔憂國家安全的問題，自然不願接受沙國的倡議。但事實上，沙國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議，首次願意公開發展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已為沙以關係帶入新的里程碑。

(二) 區域因素

2003 年海珊政權被推翻，無疑破壞中東的權力平衡(Ulrichsen, 2016)。在此之前，海珊政權雖為區域的不穩定因素，其他國家多少會擔憂伊拉克的擴張行為。然而，海珊的存在卻也牽制另一個區域強權—伊朗(Kamrava, 2005)。海珊身為少數遜尼派卻統治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非常害怕伊朗利用什葉派的影響力顛覆政權。故自 1979 年以來，伊拉克與伊朗處於相互制衡的動態中，伊拉克的角色無形之中壓制伊朗，有利於沙國的安全(Kamrava, 2005)。雖然伊拉克也被沙國視為威脅之一，但雙方卻都面臨相似的威脅來源，例如國內什葉派的騷亂，並擔憂伊朗的權力持續壯大、利用宗教意識形態作為擴張工具(Kamrava, 2005)。沙國藉由伊拉克的制衡與美國的安全保證下，至少能抵禦伊朗的勢力進入海灣地區。然而，美國於 2003 年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後，完全破壞此一平衡，使沙國陷入不安全的處境(Rabi & Mueller, 2009)。海珊的垮台幫助伊朗不費一兵一卒就清除最主要的敵人。此外，伊拉克多數為什葉派人口，剛好給予伊朗利用什葉派影響力干涉戰後伊拉克內政的機會(Rabi & Mueller, 2009)。伊朗缺少伊拉克的制衡，因而能長驅直入海灣地區，加深沙國對伊朗的恐懼(Rabi & Mueller, 2009)。少了武力強大的海珊政權來平衡伊朗，伊朗追求區域霸權的目標逐漸開始變得可行(Rynhold & Yaari, 2019)。

基此，美國以反恐為名推翻海珊政權，導致 911 事件以來的沙美關係更形惡化。不同於 1991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獲得全世界的支持，2003 年美國推翻海珊的行為，不僅威脅沙國安全，正當性更是不足，反而激起中東世界對美國的反感。海珊政權垮台帶給沙國另一棘手的問題，反美情緒在沙國擴大，長期與美國緊密同盟的沙以關係，剛好成為極端主義所抨擊的目標(Abadi, 2019)。同時，美國試圖在中東建立民主制度也與沙國的體制相違背，種種因素導致沙美關係的惡化。

因此，迫使 2005 年上任的沙國國王阿布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³⁰轉換過於親美的外交政策。全面平衡(omni-balancing)成為此時沙國較為傾向的立場(Henriksen, 2017)。沙國固然理解美國對沙國的支持是沙國王室的重要力量，然而，一味過度傾向美國將使得內部矛盾更加被凸顯(Henriksen, 2017)。

與此同時，伊朗遭到美國強烈圍堵，並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制裁伊朗。為反制西方的制裁，伊朗開始轉而致力修復與海灣國家的關係，向沙國釋出善意，促成由談判、會談等方式緩和伊朗對沙國的敵意(Haji-Yousefi, 2018)。在 2006 至 2007 年之間，伊朗主動向沙國釋出善意，雙方舉行多場雙邊會談，沙國更與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士公開會面，以穩定伊拉克的什葉派(Kostiner, 2009 ; Teitelbaum, 2013)。隨後沙國更公開宣稱，美軍佔領伊拉克是一非法行為³¹，以此表達自己並非一味親美的立場。儘管如此，沙國仍必須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維持以能源供給換取美國軍事支持的政策。但由沙國對伊朗的態度可發現，此時沙國外交政策是在既有的框架下，逐漸偏向伊朗以達成全面平衡，既保持沙美關係，又拓展沙伊關係(Kostiner, 2009)。

從以色列的角度分析，伊拉克或伊朗本身擁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且敵視以色列。儘管如此，以色列也受惠於伊拉克與伊朗兩國彼此牽制的情形(Kostiner, 2009)。首先，兩伊彼此處於複雜的對立關係，諸如邊界、教派衝突、庫德人等等，排除歧見互相合作的機會非常微小(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此外，在地緣政治的角度上，伊拉克與伊朗的領土緊鄰彼此，權力間的競爭將沒有任何緩衝地帶，造成兩伊將重點置於雙方的權力平衡，而非處理地處遙遠的以色列(Kostiner, 2009)。基此，以色列非常樂見伊拉克與伊朗的制衡關係。2003 年後，以色列長久以來的心頭大患海珊政權終於瓦解，卻引發伊朗進一步的崛起(Kostiner, 2009)。

³⁰ 2005 年成為沙國第六任國王，任期為 2005-2015 年。

<https://edition.cnn.com/2012/12/28/world/meast/king-abdullah-bin-abdulaziz-al-saud---fast-facts/index.html>

³¹ 2007 年 3 月 28 日，沙國國王在阿拉伯國家聯盟會議上，公開譴責美國佔領伊拉克是非法的行為。<https://www.nytimes.com/2007/03/28/world/middleeast/29saudicnd.html>

少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開始在中東地區扶植親伊朗的非國家行為者，他們隨著伊朗的崛起而更加活躍，可將其視為伊朗推行的代理人戰爭(Rynhold & Yaari, 2019)。例如真主黨與哈瑪斯在意識形態上皆主張以武力消滅以色列。真主黨遍及黎巴嫩南部，緊鄰以色列，哈瑪斯則控制加薩走廊，雙方對以色列的攻擊將非常立即，使以色列倍感壓力。

綜上所述，海珊政權倒台後的中東新局勢，使得沙國與以色列必須思索，如何平衡一個逐漸強大的伊朗。由利益平衡論的角度分析，海珊政權被美國推翻是最關鍵的時間點，因為中東地區的現狀又再一次被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沙國與以色列在現狀改變的認知出現差異，因而展現出兩國不同的外交戰略。首先，沙國將美軍推翻伊拉克視為現狀改變的威脅，美軍的行為不僅破壞長期制衡伊朗的力量—伊拉克，更激發中東地區普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不滿，這樣的反美氛圍驅動極端主義活動，不利沙國境內的國家安全(Teitelbaum, 2013)。有鑑於此，沙國選擇與美國保持距離，試圖走出自己的外交路線，不再過度依賴美國(Teitelbaum, 2013)。

相反地，以色列對現狀的改變截然不同於沙國。以色列將海珊的垮台視為有利的機會。儘管以色列也受惠於伊朗和伊拉克彼此制衡的情形，但無論如何，不論伊朗或伊拉克均始終對以色列充滿敵意。因此，美國的作為至少消滅以色列長年的威脅。以色列將現狀改變視為機會，支持美國推翻伊拉克的行為。基此，沙國與以色列在區域因素的認知上並不一致，沙以兩國採取完全不同的戰略面對此一現狀的改變，連帶使雙方外交關係陷入停滯。

然而，在伊朗遭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後，迫使其轉而選擇和阿拉伯國家釋出善意，伊朗與沙國的關係開始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Haji-Yousefi, 2018)。對伊朗的態度導致沙以兩國對現狀認知產生分歧。對於伊朗崛起這個現狀改變，以色列將其視為極大的威脅，特別是2005年後伊朗對以色列的敵視更甚以往。但對沙國來說，儘管伊朗採取更為擴張的外交政策，卻因為遭受西方世界強大壓力而願意修復與沙國的關係，確實為沙國所樂見，沙國也能藉此抗

衡自身與美國的關係，不過度依賴美國。因此，沙國將此次現狀改變視為機會，願意與伊朗展開和解，導致沙以關係並未因為伊朗的崛起而變得更靠近，反而依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戰略走向。

(三) 外部勢力

美國進入千禧年後的中東政策最初定調於維持中東現狀，確保中東盟國與原油供應穩定。然而在 911 事件後，美國全力向恐怖主義宣戰，此時最優先的政策轉變為打擊恐怖主義，重要性甚至高過於其他傳統中東政策（例如：維持產油穩定）(Halabi, 2009)。由此可知，2001 年的恐怖攻擊造成美國中東政策極大的轉變。

在 2001 年以前，美國無意重塑中東秩序，維持中東現狀與遵行雙向圍堵政策(dual containment)就已足夠，但 911 事件使得美國由消極轉為積極，主動打破中東現狀，甚至開啟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Brown, 2004)。美國不再單純利用政治手段，反而傾向於直接干預(Gordon, 2003)。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國內對於伊斯蘭世界的仇恨增加，美國政府內的新保守主義崛起，他們主張利用單邊主義³²打擊流氓國家(Rogue State)³³，採取積極的態度面對所有潛在的威脅。顯然地，從 911 事件後，美國將打擊恐怖主義這一主要政策貫徹於美國的中東政策。

美國的反恐政策不僅打擊既存的恐怖組織，同時也採取預防性武力(preemptive war)³⁴杜絕極端主義。美國此一反恐政策直接牽涉到沙國與以色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911 事件後，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急速惡化，特別對伊斯蘭世界領導國的沙國影響甚深。美國開始積極干預沙國的內政，主動要求王室改

³² 國際社會當中實力較強的一方，為了落實本國利益，忽略多數國家的人民意願，違反國際潮流。<https://oxfordre.com/poli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49>

³³ 2002 年小布希總統在國情咨文當中提出此一概念，特指伊朗、伊拉克、北韓。<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1/29/bush-axis-of-evil-2002-1127725>

³⁴ 允許國家為阻止即將發生之攻擊，在一定範圍內使用武力。<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reemptive-force>

革，包括宗教教育、透明化財政機制，以阻斷對極端組織的金援(Halabi, 2009)。以權力的角度分析其內涵，沙國在此時的權力處於消退狀態，面對美國的壓力，沙國不得不對其妥協(Gordon, 2003)。美國對沙國的支持與否，可視為沙國自身權力的重要一環。倘若沙美關係惡化，極有可能導致美國暫停對沙軍售及各項合作，勢必對沙國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然而，沙國政教體制卻是沙國王室的合法性來源，一旦進行改革，勢必牽動沙國王室的統治基礎(Podeh, 2018)。儘管沙國對自身內政改革不太感興趣，但仍受迫於美國的壓力而必須做出改變 (Gordon, 2003)。

另一方面，911 事件為以色列創造出有利條件。911 事件後，美國再次將焦點轉移至中東。美國勢必需要以色列在中東的重要性，有利於實行美國的反恐戰爭(Brown, 2004)。再者，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宣戰與以色列的國家利益一致，多數被美國視為恐怖主義的團體大都將消滅以色列作為其眾多目標之一。有美國力量的挹注，無形中增加以色列的權力，以色列將能更輕鬆地平衡外部威脅。因此，911 事件後，以色列積極地支持美國的反恐政策。

在外部勢力的干涉下，沙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漸行漸遠，主要的原因是美國中東政策轉為積極干預。過去沙以均奉行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因此在國際的層次上，沙以屬於同一陣營。但當美國推翻海珊後，沙以對此一現狀改變的認知出現差異。沙國長年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政策確保安全，但如今造成沙國安全威脅的卻是美國所實施的反恐政策。沙國視為改變現狀的威脅，但以色列則視為機會。反恐思維下的美國中東政策對伊斯蘭國家保持高度敵意，作為美國盟國的沙國在此時處於兩難的局面，沙美之間仍共享許多利益，但另一方面，美國的反恐政策卻不斷侵蝕沙國王室的統治合法性與穩定性(Gordon, 2003)。基此，911 事件後，沙以關係產生一明顯分化。沙國為顧及自身政權穩定與利益，逐漸偏離依賴美國的外交政策，試圖多樣化自身的外交路線，採取抗衡美國之戰略。以色列則受惠於美國的反恐政策，積極追隨美國的中東政策。這樣的外交分歧在美國推翻海珊政權後更加明顯，沙國極度不願看到海珊垮台後伊朗崛起的局面，而以色列則樂於此情形，進而更加激化沙國與以色列不一致的外交戰略。

面對伊朗崛起，美國的回應手段是組成圍堵伊朗的聯盟(Kostiner, 2009)。以色列在這樣的局勢底下當然跟隨美國的脚步，共同圍堵伊朗擴張(Kostiner, 2009; Podeh, 2018)。然而，沙國卻在此時與伊朗進行和解的外交政策，明顯違背美國和以色列陣營的立場。儘管沙國對伊朗的擴張意圖多所疑慮，但仍願意接受伊朗對阿拉伯世界釋出的善意。此外，美國推翻伊拉克的舉動遭致多數阿拉伯國家的反彈，甚至出現大規模的反美浪潮，迫使沙國不得不抗衡美國，因此，沙國並未跟隨美國的脚步，反而將重心放在整合阿拉伯世界(Podeh, 2018 ; Black, 2019)。

基此，美國勢力對沙以關係產生絕對的影響。911 事件後，美國反恐政策將沙以兩國推向截然不同的外交戰略，沙以更在面對伊朗崛起後採取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最大的原因在於沙以對美國中東政策的反應，以色列跟隨美國堅決圍堵伊朗擴張，反觀沙國則顧及自身利益，選擇不過度親美的外交戰略，在美國與伊斯蘭世界中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自美國施行反恐政策後，以色列緊跟隨美國脚步阻擋恐怖主義與伊朗崛起，但沙國卻因為自身的脆弱性，在反美浪潮中小心翼翼地處理沙美關係。儘管如此，沙美之間仍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雖然沙國對美以此時最大的威脅—伊朗轉為和解，但仍不斷提高沙國的軍售，鞏固沙美的安全同盟關係。沙國深知美國對其政權的重要性，雖然反美浪潮崛起、沙伊關係日漸和緩，沙國卻仍維持一定程度的對美的關係。由此可知，美國勢力仍然是沙國不得不依靠的最後防線。相反地，美國也深知沙國對美國利益的重大影響，因此仍就盡力維繫沙美關係。在沙國與以色列採取截然不同的對美政策時，雙方關係確實處於不同的立場。然沙以並不會延伸為更大的衝突，因為整體來說，沙以仍然維持扈從美國的路線，差別僅在於沙國向外發展，與伊朗展開和解，試圖抗衡美國。因此，雖然沙以關係在此時採取相異路線，美國仍發揮影響力，穩定整體的沙以局勢，不致使情況失控，仍將沙以維繫在和平對抗的框架之下。以色列雖仍對沙國進行反制措施，但僅體現於外交場域，例如自 2001 至 2009 年期間，以色列在華府的

遊說團體每年盡力阻擋美國對沙國的軍事援助項目 (Black, 2019)。美國仍然在沙以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成為防止雙方對立激化的重要因素。

(四) 結論

2001 至 2009 年期間，美國的反恐政策弱化沙以雙方的合作關係。自 1979 年後，沙以的安全很大部份由美國所承擔，因而強化沙以扈從美國的外交路線。也因如此，美國對沙以的外交走向也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然而，自 2001 年後，美國採取反恐為主的中東政策，其一系列的行為如施壓沙國改革、推翻海珊，均主動對沙國安全造成威脅，迫使沙國不能一味採取扈從的政策，轉而向外找尋其他方式，沙以的對美政策因而走上不同的道路；以色列積極跟隨美國，沙國則選擇遠離美國多樣化自身外交戰略。因此，在美國反恐政策下，間接影響沙以對伊朗崛起後的改變認知不一致。有鑒於伊朗對沙國釋出善意，更在 2005 年後主動修復與海灣國家的關係，使得沙國並未將伊朗崛起視為威脅，反而是一個可以合作的機會。相反地，以色列自始自終都將伊朗視為重大威脅，因而積極跟隨美國採取制衡伊朗的政策。基此，由外部勢力導致沙國與以色列，在區域因素上採取截然不同的對伊朗政策，進而導致雙方外交關係弱化。

儘管如此，沙國卻仍深知美國的重要性，並未放棄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也並未放棄對伊朗的警戒，因此仍保持與美國的關係，所以美國依然對沙國與以色列保有高度影響力。當沙國與以色列陷入對立情況時，美國能確保情況不再惡化，作為雙方外交關係的重要牽制力量，沙以關係雖弱化，但卻並未惡化。

二、2009-2017 年沙以之外交關係：沙以聯盟關係的成形—美國勢力的衰退

本節將分析 2009 年至 2017 年中東地區的權力變化，如何牽動沙國與以色列之間的外交關係。沙以此時的外交關係主要受到美國勢力弱化的影響，沒有美國作為安全保證，沙以雙方為平衡伊朗的威脅，逐漸加強兩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形成沙以外交關係中史無前例的合作高峰，更加推進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

(一) 內部因素

在 2009-2017 年時期，以巴問題陷入僵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以色列對於以巴問題的態度越來越堅定，堅決不願退讓任何一寸土地。以巴問題最核心的議題—兩國方案以及約旦河西岸，以色列採取右派的路線，不願接受兩國方案，並且擴大以色列人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區。此外，對於 1967 年後所佔領的領土，以色列也絲毫沒有退讓的跡象。總理納坦雅胡基於自身右派的立場，對於巴勒斯坦當局的態度轉為激進，不願與其進行協商，並對巴勒斯坦的多起偶發性攻擊採取強烈的報復手段，在在激化以巴問題的緊張關係。然而，隨後的阿拉伯之春卻大幅改變沙以原本僵化的外交關係。2010 年阿拉伯之春為中東地區投下震撼，這股浪潮席捲至海灣地區君主制國家。儘管沙國政權仍看似穩定，但阿拉伯之春帶動沙國境內許多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沙國政府為平息群眾的示威，以強大的經濟能力作為後盾，不但大幅提高社會福利的津貼，更擴大婦女的參政權。沙國政府最關注的重點其實只有一個，即「穩住沙國王室的統治」。另一方面，過去親西方的獨裁政權埃及倒台，美國並未出手援助長久以來的重要盟國，反而坐視其民主化。這導致沙國王室警覺到美國的勢力似乎不願在這場浪潮中堅定支持中東的盟國。

基此，以色列在以巴問題的態度轉為強硬後，連帶牽動沙以之間的外交關係。首先，以巴問題是沙以外交關係中最大的障礙，但同時也是最能改變雙方外交關係的互動場域。綜觀過去的歷史脈絡，一旦沙以關係產生好轉，多連帶導致以巴問題的趨緩。然而，納坦亞胡執政後的以色列對以巴問題展現出強硬態度，無疑對沙以關係的發展關閉互動場域。沙國為顧及自身的合法性問題，絕不會允許以色列如此激進的立場，因而不利於雙方外交關係的發展，但原本越來越激化的沙以關係卻在阿拉伯之春出現轉機。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造成許多獨裁者紛紛倒台，看似民主化的勝利卻也衍伸出另一問題—區域不穩定增加。埃及的垮台造成穆斯林兄弟會的更加壯大，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均陷入內戰狀態，而巴林、伊拉克內部的教派動亂興起。這樣的動盪環境均不利於沙國與以色列的政權穩定，特別是當極端主義趁亂而起，對以色列的敵意與沙國長年親西方的不滿，漸漸訴諸恐怖攻擊，使得沙以兩國遭受強大的內部壓力(Ulrichsen, 2016)。因此，沙國與以色列面對區域不穩定的動亂，無暇再顧及以巴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如何穩固自身內部的政權穩定，防止阿拉伯之春帶來的浪潮。基此，區域動亂對沙以政權穩定的威脅與美國消極的態度，促使兩國逐漸由對立轉向合作(Black, 2019)。沙國與以色列均面臨來自動盪環境的威脅，沙國必須穩固自身的統治，杜絕極端主義，以色列則必須關注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政權更迭，防止敵視以色列的團體執政。此外，阿拉伯之春的不穩定性，鼓動加薩走廊、黎巴嫩、敘利亞等地的騷動，在在威脅以色列的安全。因此，阿拉伯之春將沙以兩國再次推向相同的立場—確保區域穩定並穩固自身政權，無疑為沙以關係開啟另一互動管道(Black,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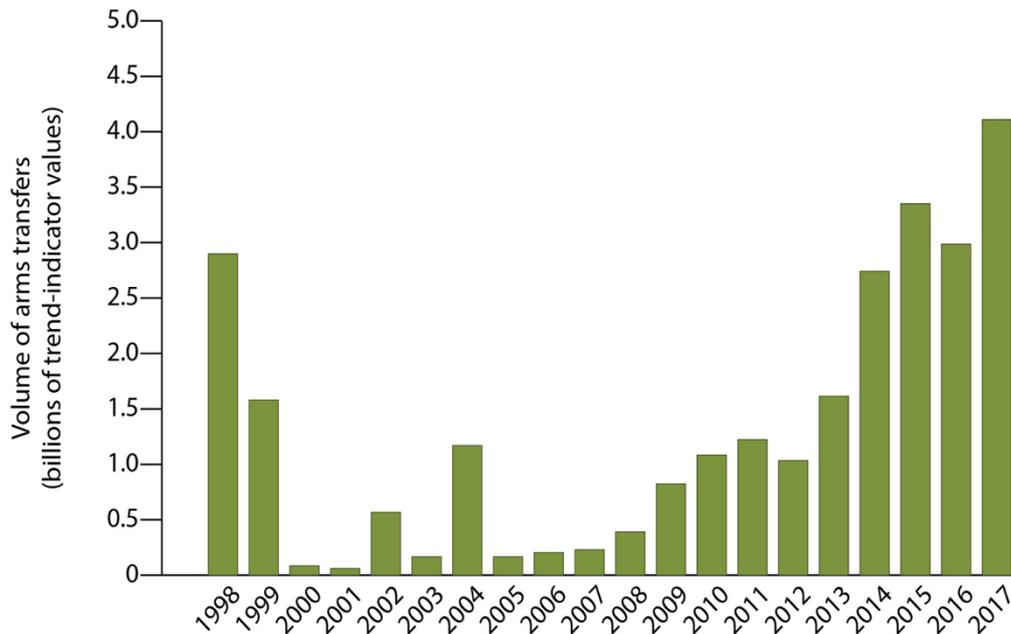
(二) 區域因素

儘管阿拉伯之春為中東地區帶來內部動亂，促使沙以兩國必須更加警覺極端主義的威脅，然而沙國與以色列大致上對國家的掌控能力還是很強大。不同於其他陷入動亂的國家，沙以兩國政府未受到太大的破壞，因此對內部動蕩的壓制能力仍非常有效。此外，對於人民的不滿也能以經濟實力為後盾，大幅提高社會福利等政策以緩解人民的不滿。基此，阿拉伯之春帶來的動盪對沙以兩國的安全有害，但並未出現嚴重的影響。

真正對沙以兩國產生威脅的力量來自於伊朗。沙國在 2001 至 2009 年間向伊朗採取和解政策，但效果卻不彰(Teitelbaum, 2013 ; Rabi&Mueller, 2017)。沙國主要用意是緩和與伊朗的敵意，並共同解決中東區域內的動盪。事實上，哈瑪斯並未與 PLO 達成和解，而黎巴嫩真主黨仍在伊朗的資助下變得更加強大。同時，阿拉伯之春後的動盪，給予伊朗權利擴張的機會。在許多陷入內戰的國家中，例如葉門、巴林、敘利亞以及黎巴嫩均能見到伊朗資助的什葉派勢力崛起(Teitelbaum, 2013 ; Rabi&Mueller, 2017)。過去沙國與伊朗的競爭關係大抵上維持平衡，但阿拉伯之春浪潮席捲中東國家後，平衡伊朗擴張的遜尼派力量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伊朗利用什葉派力量在各地另闢戰場。伊朗的區域影響力非但沒減弱反而逐漸步增強，在在證明沙國採取的和解政策以失敗收場(Teitelbaum, 2013; Rabi&Mueller, 2017)。以利益平衡論的角度分析，伊朗在阿拉伯之春後區域影響力大增，均被沙以兩國視為現狀改變的威脅。沙以對伊朗改變現狀的立場一致，亦即將改變現狀視為威脅。因此，為使情況恢復現狀，沙以兩國遂採取合作的外交政策以壓制伊朗的進一步擴張。伊朗造成的安全威脅加劇，導致沙以兩國的外交關係升溫，一步步邁向合作以平衡伊朗的擴張企圖，此時，沙以的外交關係轉變為越來越緊密的盟友關係。

沙國武器進口趨勢圖

The trend in imports of major weapons by Saudi Arabia, 1998–2017*



*The SIPRI trend-indicator value (TIV) is a measure of the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major weapons. The method used to calculate the SIPRI TIV is described at the SIPRI website.

圖 10，資料來源：<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18/saudi-arabia-armaments-and-conflict-middle-east>

綜上所述，沙國意識到採取和解政策只會加速伊朗的崛起，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採取制衡，因而自阿拉伯之春後，沙國重新調整對伊朗的政策，由和解轉向制衡(Black, 2019)。另一方面，以色列長久以來即對伊朗保持強硬的態度，特別從海珊政權垮台後，伊朗向外擴張的企圖更逐漸加強(Ulrichsen, 2016)。沙國的外交戰略與以色列形成一致，如此更將沙以兩國推向有利的合作局勢，為雙方日後的全面和解拉開序幕。

(三) 外部勢力

2009 年後，美國中東政策再度發生變化。美國對伊朗的核武發展持完全反對的立場，認為這絕對會侵害中東區域和平(Dueck, 2015)。然而在處理伊朗核問題的手段上，美國傾向利用外交手段而非動用武力，希望能利用談判解決伊朗核武問題(Dueck, 2015)。美國試圖尋找與伊朗合作的機會，希望藉由政治、經濟的利益，將他們拉進自由主義的體系中，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多邊談判(Halabi, 2009)。

由於美國對伊朗態度趨於和緩，不再堅持對伊朗的強硬路線。這樣的政策明顯抵觸沙以兩國之國家安全，因為伊朗的壯大被沙以視為兩國重大的安全威脅，沙以絕對不容許伊朗在中東地區成為擁核國家(Guzansky, 2011; Rabi&Mueller, 2017; Rynhold&Yaari, 2019; Black, 2019)。長久對伊朗實施強硬政策的美國，一直是沙國與以色列的安全靠山。沙國與以色列之所以有先進的武器以及穩固的國家安全發展，均可歸因於美國對兩國的重視。特別是歷任美國總統無不堅持圍堵伊朗，強烈壓制其擴張意圖。如今，美國卻與伊朗緩和外交關係，亦即沙以背後的安全保證—美國，逐漸與最大的外部威脅—伊朗走向和解，美國將不再是沙以兩國對抗伊朗崛起的主要力量。沒有美國堅強的軍事、外交實力做後盾，伊朗成為中東區域霸權的可能性將大幅增加 (Guzansky, 2011; Rabi&Mueller, 2017; Rynhold&Yaari, 2019; Black, 2019)。

除此之外，美國在阿拉伯之春的態度為沙國與以色列敲響警鐘。美國中東政策不再著重於意識形態以及對伊斯蘭世界的仇恨，而主要奠基於實用主義(Pragmatism)³⁵。相對於過去的單邊主義，此時美國轉而擁抱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³⁶，不再強調預防性武力(preventive force)的重要性，反而較著重

³⁵ 實用主義強調效用與結果的重要性，將一切的指導準則功利化。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ragmatism-philosophy>

³⁶ 與多個不同國家一同解決國際社會的問題。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49>

外交解決，武力則成為最後的手段(Black, 2019)。在政治上，美國希望能和國際體系站在一起，開始重新調整美國和中東國家間的關係，審慎使用武力並帶領美國脫離戰爭泥沼，為減少財政赤字，逐年減少在中東駐軍的費用。

美國在阿拉伯之春時期，雖仍有介入中東盟國的內部動亂，但干預的力道卻不大(Ulrichsen, 2016 ; Black, 2019)。這樣的外交立場導致許多美國的中東盟國逐漸對美國失去信任，尤其是沙國王室看到埃及的處境後非常恐懼，認為美國的做法非常天真與危險，因而促使沙國開始尋求美國以外的合作對象(Gerges, 2013)。在眾多阿拉伯國家陷入混亂之時，伊朗藉由鼓動各國的什葉派起身反抗，影響力逐漸擴大。與此同時，一樣視伊朗為頭號敵人的以色列，漸成為沙國的潛在合作國家，並開啟沙以外交關係的新局勢(Ulrichsen, 2016 ; Black, 2019)。

當沙以面對美國伊朗政策改變時，唯一能繼續制衡伊朗崛起的方法就是增強雙方的合作關係。有鑒於美國勢力在中東的消極與衰退，此時的沙以外交關係來到高速發展的時期(Ulrichsen, 2016)。沙國與以色列體認到，不能再如同過去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證作為唯一後盾，取而代之的是雙方積極的合作。值得關注的是，沙以外交關係中的合作，最先觸碰的是政治、情報、軍事等領域(Ulrichsen, 2016 ; Black, 2019)。平衡伊朗崛起則是驅使雙方合作的最主要因素，這和一般用來解釋國家間合作的功能主義理論(functionalism)³⁷有很大的不同。迥異於由技術以及功能部門合作進而延伸到政治領域的合作模式，沙以此時外交關係的合作呈現反向關係，由政治、軍事等高階層次逐漸擴展至低階領域如經濟、科技、貿易等(Black, 2019)。

以色列與沙國的合作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由軍事跟情報合作進而延伸至貿易與科技，最後再擴及文化跟體育等一般交流(Black, 2019)。雖然檯面上沙國對

³⁷ 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國家間之某一功能部門的合作成功，會觸發另一功能部門之合作需要，構成國家間的互賴，並擴張到政治部門完成政治整合的目標。〈曾怡人&吳政燦(2009)。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一種比較的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五卷,第四期,頁 143-167。〉

以色列仍必須採取經濟抵制和禁止一切官方交流，然而沙國近年來仍透過第三方達成經濟貿易，而且貿易額逐漸增長(Black, 2019; Podeh, 2018)。不單只有政治的考量，沙以合作開始涉入經濟、醫藥、科技。透過第三方貿易所獲得的利潤也能夠支援沙國的願景 2030 計劃³⁸，使其擺脫對於石油的過度依賴(Black, 2019; Podeh, 2018)。與此同時，沙國官員逐漸不在公共場合抨擊以色列，沙國的大眾媒體開始對以色列展開許多正面報導，並打壓沙國境內的反猶太團體與巴勒斯坦當局(Podeh, 2018)。

另一方面，沙以的貿易範圍與金額不斷逐年擴大，更加拉近彼此的關係，沙國可藉由以色列先進的技術改善國內的經濟環境，而以色列能借助沙國，利用貿易為媒介將影響力擴大到更多的遜尼派穆斯林國家(Siddiqa, Hassan, & Khan, 2019)。此時，遠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也發生改變，以往強大的猶太遊說組織用盡一切手段，阻撓美國當局對沙國的軍售與經濟援助。然而，此時的猶太游說組織已不再反對美國給予沙國的軍售，甚至沙國從美國得到的援助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美國猶太游說組織的幫助下所獲得(Black, 2019)。沙國與以色列之間的外交關係已然徹底改變，一個新的聯盟隱然成形(Black, 2019; Siddiqa, Hassan & Khan, 2019)。

沙以合作的高峰發生在 2015 年，美國等西方大國與伊朗達成伊朗核協議後來到頂點。美國允諾假如伊朗落實核協議的內容，西方國家將會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Black, 2019)。沙以兩國長期依靠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制伊朗，如今此一情形即將逆轉，更加激化沙以全面的合作關係。自 2014 年開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已能夠直接搭乘約旦航空，由以色列飛往沙國進行朝聖(Siddiqa, Hassan & Khan, 2019)。與此同時，沙國與以色列摩薩德(Mossad)³⁹官員多次在境外密會，沙國石油部長甚至公開宣稱，會向以色列出口石油 (Abadi, 2019)。沙以

³⁸ 沙烏地阿拉伯為了擺脫對石油的過度依賴，因此於 2016 年公布此經濟計畫，擴展多方的產業發展，促進國際投資。<https://edition.cnn.com/2020/05/12/business/saudi-arabia-oil-mbs/index.html>

³⁹ 以色列的情報機關，成立於 1949 年，專責彙整情報、執行秘密任務。
<https://www.mossad.gov.il/eng/about/Pages/default.aspx>

之間的合作更擴大到電腦科技領域，他們共同開發電腦病毒，甚至互相翻譯、發行學術著作，顯示沙以在伊朗核協議後達到史無前例的緊密關係(Abadi, 2019)。

綜上所述，在 2009 年後，美國勢力在中東逐漸弱化，對伊朗的政策也不再強硬。此一決定無疑終止沙以兩國長年扞從美國的認知。一旦美國不再對伊朗實施強硬政策，沙以將不再享有保證制衡伊朗的能力。此一情勢迫使沙以必須重新思考，什麼才是有效防止伊朗崛起的辦法。也因此促成沙以間的合作，共同平衡伊朗的擴張，逐漸形成史無前例的緊密關係。

以色列和沙國的關係正經歷重大轉變，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國際關係由冷戰的極端形勢轉變為功能取向(Matza & Hoffman, 2019)。特別在後阿拉伯之春時代，美國的影響力逐漸弱化，導致以色列跟沙國的關係越走越近，沙國早已認定以色列的存在事實，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反而被實用性給取代(Siddiqi, Hassan & Khan, 2019)。基於安全觀點，以色列跟海灣遜尼派國家都畏懼伊朗的崛起，因此採取合作。然而，他們的合作並不需要依賴國家正常化以及和平協定，反而透過檯面下的實質合作即可(Matza & Hoffman, 2019; Black, 2019)。從以色列觀點來看，與沙國加深合作也能使以色列在以巴問題上佔有優勢。沙國與以色列正同時進行非正式的合作，沙國為維持阿拉伯世界的正統性，因此不能正式承認與以色列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沙國卻要提防伊朗的威脅並發展經濟多樣化，選擇與以色列發展實質合作(Guzansky, 2011; Black, 2019)。

三、結論

2001 至 2017 年沙以外交關係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仍是外部勢力。2001 至 2009 年，因美國的反恐政策，沙以對美國改變現狀的認知不一致，形塑出相異的外交戰略。沙國試圖在美國與中東國家間保持平衡，以色列則跟隨美國，因而影響雙方對伊朗崛起採取不同戰略，最終導致沙以關係在此時弱化。但弱化不等於惡

化，沙國深知美國的重要性，仍與美國維持一定的互動關係，在在顯示美國依然是沙以關係中的重要力量，將沙以維繫在低度互動的關係中。

2009年至2017年是沙以關係的關鍵時刻。首先，沙國對伊朗的和解政策失敗，伊朗並未因此減弱其擴張意圖。因此迫使沙國徹底改變伊朗政策，由和解轉為制衡。以色列方面則維持其一貫的外交政策，支持制衡伊朗，避免其進一步成為中東霸權。至此，沙以兩國對於權力平衡之手段開始趨於一致，然而，雙方最信賴的盟國—美國，卻在此時改變對伊朗的外交政策。美國對伊朗態度開始放緩，以談判的方式將伊朗整合進國際社會，並著手制定伊朗核協議。透過協議的落實，伊朗能換取西方國家解除經濟制裁。美國的轉變無疑給沙以兩國強烈的安全疑慮，勢必衝擊沙以制衡伊朗崛起的力度。美國勢力衰退此一對現狀的改變，被沙以視為威脅。為繼續確保自身的國家安全，沙國與以色列逐漸進行一系列的合作，填補美國力量的衰退。沙以合作模式最先由軍事、政治、情報開始，拓展至經濟、貿易、科技等領域，形成越來越緊密的合作關係。與此同時，美國當局對中東事務的涉入逐步減少，不僅裁減駐軍，更對武力干涉的行為越來越節制，因而加速沙以兩國之間的合作，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沙以之間的外交關係來到史無前例的緊密程度，不再受限於巴勒斯坦問題。

綜上所述，沙以關係在此時主要受到外部勢力的驅動，形塑出不一樣的互動模式。2001-2009年階段，受制於美國反恐政策，沙以採行相異之外交戰略，外交關係陷入低盪，但仍在美國的維繫下不至於惡化。2009-2017年，沙以因為美國勢力的衰退，無法作為沙以的安全保證，促成沙以展開史無前例的合作關係。

1979-2017 年沙以關係影響因素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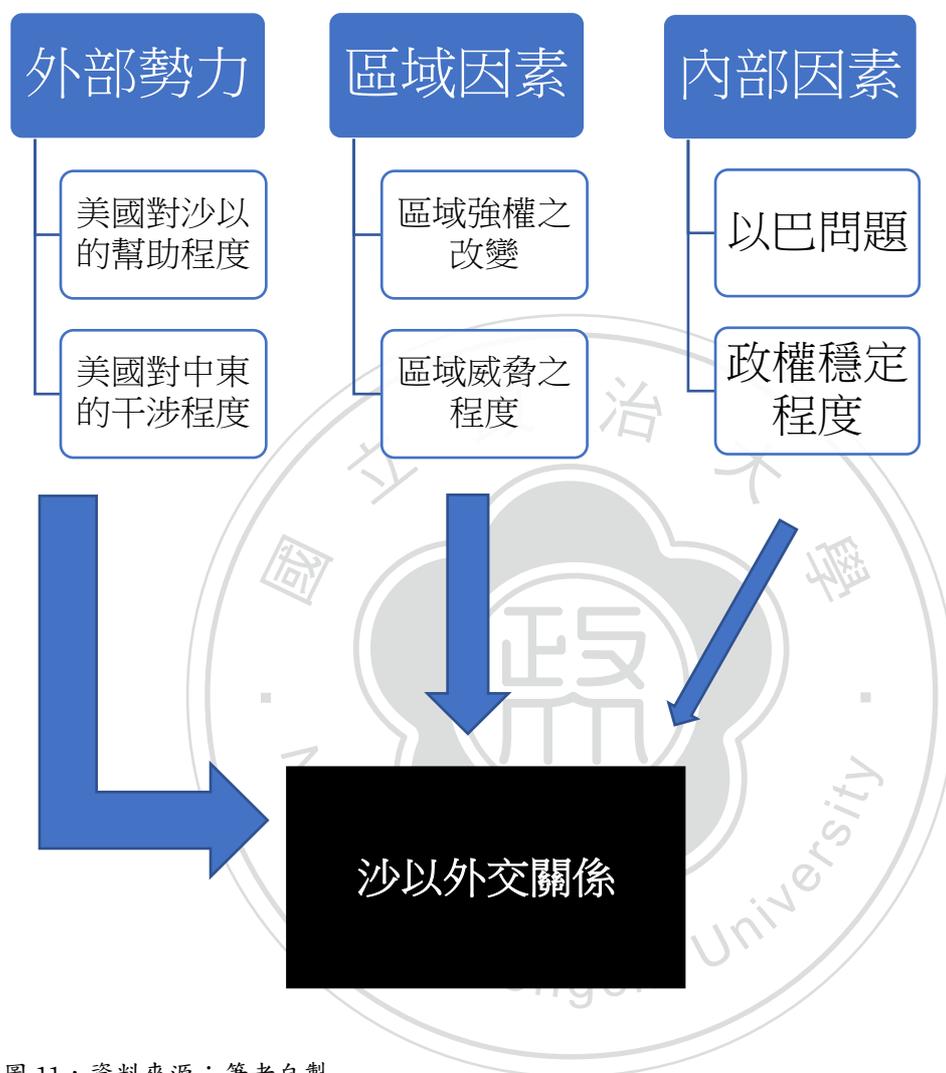


圖 11，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第五章 結論

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沙國與以色列自 1948-2017 年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為何。有鑒於各時期的沙以外交關係各有其發展特色，本文將沙以外交關係的時間序作為各章節的安排。本文採用利益平衡論作為沙以外交關係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另外以內部因素、區域因素與外部勢力為分析面向，以此三面向對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在 1948-1979 年時期，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區域因素所影響。沙國初期並未具有足夠實力抗衡以色列，因此多扈從於阿拉伯陣營，形成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態勢。儘管如此，阿拉伯世界中依然存在矛盾，沙國一方面聯合對抗以色列，但另一方面卻謹慎平衡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權力關係，因而開展出與以色列的競合關係。1950-1960 年代，埃及的崛起成為首次將沙以推向合作的關鍵因素，沙以畏懼埃及的威脅而展開合作。然而，隨著 1967 年以色列於六日戰爭大勝，沙以合作關係又出現轉變。過於強大的以色列使沙國感到威脅，因此轉而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合作，共同平衡以色列。沙國更在十月戰爭後對以色列與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震驚世界經貿發展。

綜上所述，1948-1979 年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區域內的威脅而改變，一旦區域內的威脅過於強大，將立即驅使沙以尋求任何潛在盟國，達成權力平衡，1948-1967 年沙以合作；1967-1979 年沙以則轉為對抗。在內部因素方面變化不大，沙以政權穩定、國力漸增，對以巴問題也長期處於對立意識形態，無法解釋沙以關係何以在合作與對抗之間擺盪。外部勢力則剛開始萌芽，大國仍在觀望中東局勢，尚未形成左右沙以關係的力量。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在十月戰爭後，遭到沙國石油禁運的報復，顯示出外部勢力尚未能完全左右沙以外交關係。

1979-2001 年時期，沙以關係出現結構性轉變，外部勢力成為影響沙以關係的關鍵因素。由於區域威脅急速增加，沙以不再僅憑相互合作就能平衡威脅。因此，給予美國深化影響力的機會，美國對沙以的軍售逐年上升，漸漸形塑出美、沙、以的同盟關係。這樣的現象產生出雙向關係，沙以大量接受美國的安全保證，同時，美國對沙以的控制力也隨著援助而加強。美國能將沙以關係形塑於符合美國中東利益的發展，美國逐漸成為沙以關係裡的中介角色，維持溝通管道，防止沙以關係惡化。隨後，美國更於冷戰後成為世界霸權，利用其優勢力量推進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美國對沙以關係的主宰力來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基此，沙以對美國採取扈從的外交戰略，美國對沙以關係因而形成牽制力量，足以解釋沙以在美國的控制下，於兩伊戰爭中的對立終究沒有變為衝突，以及在波灣戰爭後，創造出長達十年的和平紅利。

2001-2017 年時期，美國已確立對沙以關係的影響力，唯一不同的是各時期的美國中東政策，明顯改變沙以關係的發展方向。2001-2009 年，美國將反恐思維貫穿其中東政策當中，導致沙以對現狀改變的認知出現差異，沙國多樣化自身外交路線，以色列則持續追隨美國，連帶導致沙以關係的弱化。2009-2017 年，美國中東政策轉向，逐漸減弱該地區的干預，甚至與伊朗展開和談。此舉促使沙以展開自助，沒有美國的依靠，沙以快速地發展同盟關係，深化全面的合作，沙以關係由於美國的弱化，來到前所未有的緊密關係。

綜上所述，透過本研究可得知，“維護國家安全免受威脅”的思維貫穿沙以的外交戰略當中，特別位處於紛亂的中東局勢當中，如何確保自身的國家安全成為沙以在各時期最為關注的議題。沙以關係由各種影響因素交互影響而成，惟各時期仍有一關鍵因素發揮決定性影響力。1948-1979 年為區域因素，1979-2001 年為外部勢力，2001-2017 年是外部勢力。本研究發現，區域因素變動引發的安全疑慮，在 1948-1979 年對沙以關係產生最關鍵的影響。此時沙國與以色列均獨自承擔自身的安全保障，亦即只能透過自身與其他中東國家的合縱連橫，來達到制衡威脅的效果。但相異的是，在 1979 年後，對於安全保障的需求

由沙以自身轉移到外部強權美國身上，沙以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美國藉由強大的綜合實力確保沙以的國家安全，但也因如此，美國開始對沙以外交關係產生高度的影響力，能將沙以關係維持在符合美國利益的發展之下，因而減少沙以之間的衝突。基此，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因素從區域轉移至外部勢力的關鍵在於“對國家安全的承擔”，由沙以各自承擔轉變為由美國承擔沙以的安全保證。此後，雖然在 2001 年後，美國的反恐政策對沙國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使其轉往多樣化外交路線，但仍未破壞美國承擔沙以安全的責任，因此沙以關係仍然在美國勢力下維持穩定關係。最後，自 2009-2017 年，美國對中東干預減弱，並且和伊朗進行和解，導致過去沙以依賴美國安全保證的情形大幅改變，沙以不再扈從美國，反而各自加強合作以平衡伊朗的崛起，國家安全再次轉由沙以各自承擔。

此外，以利益平衡論分析，當沙以對現狀改變的認知相同會採取合作，相異則採取抗衡，但美國勢力的崛起進一步改變沙以的外交戰略。沙以關係自 1948-1979 年，由於受區域因素影響，會在合作與衝突之間擺盪。但到 1979 年之後，沙以關係大多介於合作與僵局之中，但並不會形成敵對關係，因為在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下，沙以大多維持同盟關係。惟至 2009-2017 年，美國勢力消退後再次改變現狀，沙以均將其視為威脅，由於無法繼續採取扈從美國作為外交戰略，沙以隨即展開相互同盟的自助行為。

內部因素在本研究中，影響力較不顯著，原因可歸納為“沙以政權的穩定性高”，“意識形態對立名存實亡”。沙以政權對社會掌控度高，可藉由威脅、利誘的方式輕易平息國內的動盪，因此內部動亂充其量只會帶給沙以騷動，較不易造成大規模的改變。此外，由本研究可得知，以巴問題完全不被沙以兩國所堅持，反而被當作外交關係的施展工具。以巴問題的好壞大多是沙以關係變化的產物，並非影響沙以關係的因素之一。最後，經由本研究可知，在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脈絡中，相互對抗並非常態，保持敵對狀態的時期僅有 1948-1952 年，1967-1979 年。相反地，透過非正式關係的合作才是沙以互動的常

態，雙方更在 1979 年後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至此已無大規模的實質性衝突。因此，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到物質、利益等較為現實取向的事物所支配，對於意識形態如以巴問題、阿拉伯民族情感等因素，在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上影響力較小。

研究建議

為突破研究之限制，筆者整理三點作為未來之研究建議，以補足現今研究之不足。首先，研究此領域之人員，可修習一定基礎之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以便能將研究資料的來源拓展至沙國與以色列之官方檔案。第二，有鑒於文獻分析法會遭遇文獻來源的立場，以及作者觀點之影響。建議可採用其他研究方法，例如調查法，由當事人的觀點分析事件。可實際訪談沙以兩國的政府官員、退休官員、智庫人員及當地人民等。

最後，近年來以色列與週邊海灣國家關係漸漸趨於緩和，雙方的互動關係因而逐年增加。除了沙國外，以色列也與其他海灣國家展開多項經貿、科技、軍事等往來。往後若要繼續進行此議題之研究，筆者建議能採行比較之研究方法，將以色列與沙國的外交關係與以色列和其他海灣國家之外交關係進行比較，梳理出以色列與沙國以及以色列與其他海灣國家的互動中，有什麼相同與不同的地方，而又是什麼因素導致這樣的差異，確實也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外文專書：

- Baxter Kylie and Akbarzadeh Shahram (2008).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 The roots of anti-Americanism*. New York. Routledge.
- Bergen Peter (2002). *Holy war: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sama bin Laden*. New York. Free press.
- Brown Carl (2004).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gional and Outside Powers*.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 Bronson Rachel (2006). *Thicker than oil :America ' 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ck Ian (2017). *Enemies and Neighbors: Arabs and Jews in Palestine, 1917-2017*.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Camille Mansour (1994). *Beyond Alliance: Israel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ueck Colin (2015). *The Obama Doctrin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mbrell John (2009). *Clinton ' 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Bushes, 1992 - 2000*. New York. Routledge.

- Feiler Gil (2011). *From boycott to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rab boycott of Israel*. New York. Routledge
- Freedman Robert (2012).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x Decades of us – Israel relations*.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 Gause III. Gregory (2011). *Saudi Arabia in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Golan Galia (2009).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two to Gorba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vin Yosef (1998). *Israel-Soviet Relations, 1953-1967: 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 London: Frank Cass.
- Halab Yakub (2009).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crises to change*. London. Shgate.
- Henriksen Thomas (2017). *Cycles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arsh Efraim (2002). *Israe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New York. Routledge.
- Kamrava Mehran (2005). *The modern Middle East : 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ye Dalia, Nader Alireza, Roshan Parisa (2012). *Israel and Iran: A dangerous rivalry*. New York. Rand corporation.

Kenneth Pollack (2002).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New York.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Little Douglas (2008).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ndelbaum Michael (2016). *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

cold are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koff Jeffrey (2011).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Matthiesen Toby (2015). *The other Saudi: Shiism, Dissent and Secta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Murray Donette (2010). *US foreign policy and Iran*. New York. Routledge.

Onea Tudor (2013).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cold war : restraint versus
assertiveness from George H W Bush to Barack Obam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Orkaby Asher (2017). *Beyond the Arab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Yemen civil war 1962-196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si Trita (2007). *Treacherius Alliance: the secret dealings of Israel,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Peterson. J. E (1993).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carecrow

press.

- Peterson. J. E (2002). *Saudi Arabia and the illusion of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 Podeh Elie (1999). *The decline of Arab Unity: the rise and fall of United Arab Republic*. Lond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 Prifti Bledar (2017).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ase for Continu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eich Bernard (2008).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Facts on file.
- Rogan Eugene & Shlaim Avi (2007).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fran Nadav (1988). *Saudi Arabia: the ceaseless quest for securit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andal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indler Colin (2014). *Israel and the world power : Diplomatic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 Tal David (2004). *War in Palestine: Israeli and Arab strategy and diplomacy*. New York, Routledge.
- Trofimov Yaroslav (2008).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 holiest shrine*. New York. Penguin book.

Ulrichsen Kristian (2015). *Insecure Gu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ger Craig (2004). *House of Bush, House of Saud*. New York. Scribner.

Varble Derek (2003). *The suez crisis 1956*.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Vassiliev Alexei (2000).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1998).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ynbrandt James (2010). *A brief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Zeev Maoz (2009). *Defending the Holy Land :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srael's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期刊、論文：

Aarts Paul (2007). Saudi Arabia Walks the Tightr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42:4, 545-550.

Abadi Jacob (2019). Saudi Arabia's rapprochement with Israel: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5:3, 433-449,

Bahgat G. (2005). Energy partnership: Israel and the Persian Gulf. *Energy Policy* 671 - 677.

Beck Martin (2019).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 an Israeli and Saudi alliance in the making. Center for Mellemostudier.

- Blanchard Christopher (2018).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Brands Hal (2011). *Saddam and Israel: What Do the New Iraqi Records Reveal?*, *Diplomacy & Statecraft*, 22:3, 500-520
- Bronson Rachel (2005).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28:4, 119-137.
- Black Ian (2019). Just Below the Surface: Israel, the Arab Gulf States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LSE Middle East Centre Report*.
- Chubin Shahram (2012). Iran and the Arab spring: Ascendancy Frustrated. *GRC GULF PAPER*
- Finkelstein Norman (1991). Israel and Iraq: A Double Standar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0, No. 2, pp. 43-56.
- Gerges Fawaza (2013). The Obama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 the end of America' s mo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 2 , 299 – 323.
- Gordon Philip (2003). Bush's middle east vision.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45:1, 155-165.
- Güney Aylın & Gökcan Fulya (2010).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s a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eopolitics*, 15:1, 22-38
- Guzansky Yoel (2011). Tacit Allies: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5:1, 9-17.

Guzansky Yoel & Yadlin Amos (2013). The Arab World's Response to an Israeli Attack on Iran, *Survival*, 55:4, 107-120

Guzansky Yoel (2015). Iran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Change amidst Continuity,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9:1, 63-74

Guzansky Yoel (2015).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from tacit cooperation to reconciliation?. *Israel Affairs*, 21:1, 131-147

Haji-Yousefi Amir Mohammad (2018). Political Culture and Iran`s Foreig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during Ahmadinejad and Rouhani. *Journal of World Socio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2*

Ibish Hussein (2017). In search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Inbar Efraim (2013). Israel is not isolated. *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No. 99*.

Ighani Helia (2016). Managing the Saudi-Iran Rivalr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Jones Clive & Guzansky Yoel (2017). Israel`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states: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a tacit security regim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8:3, 398-419.

Jack Thompson (2018). Trump middle east policy. *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No 233*.

Jain Sandhya (2015). Saudi Arabia: King salman faces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Analysis*, 39:3, 280-286

Koc Mehmet (2019).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se of the crown prince Muhammad Bin Salman and Saudi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barakah circle theory.

Journal of Islamic Jerusalem 19(2): 165-180.

Kostiner Joseph (2009).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 Israeli Peace Process: The Fluctu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6:3, 417-429.

Kahwaji Riad (2003).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Threat Perceptions. Deterrence Objectives, *Comparative Strategy*, 22:5, 515-520.

Karim Umer (2017). The Evolution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ol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Actor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52:2, 71-88

Larrabee Stephen (2002). US Middle East policy after 9/11: Implications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37:3, 43-56,

Neff Donald (1991). The U.S., Iraq, Israel, and Iran: Backdrop to Wa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0, No. 4, pp. 23-41.

Nye Joseph (1990). Twentieth Anniversary. *Foreign Policy* No. 80, pp. 153-171.

Ottaway David (2019). The King and Us - U.S.-Saudi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9/11. *Foreign Affairs*. 121.

Peretz Don (1991). The Impact of the Gulf War on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Autumn, 1991, Vol. 21, No. 1 pp. 17-35.

Podeh Elie (2014). Israel and the Arab peace initiative, 2002-2014: A plausible missed opportunit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8, No. 4, pp. 584-603.

Podeh Elie (2018).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From secret to public engagement 1948-2018.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72, No 4*.

Porat Guy & Mizrahi Shlomo (2005). Political culture, alternativ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Israel. *Policy Sciences 38*: 177 - 194.

Prados Alfred & Blanchard Christopher (2007). Saudi Arabia: Current Issues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abi Uzi & Mueller Chelsi (2017) The Gulf Arab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67: from 'no negotiation' to tacit coope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4:4, 576-592.

Rynhold Jonathan (2008).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Middle East Challenge.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s No. 50*.

Rynhold Jonathan & Yaari Michal (2019). The quiet revolution in Saudi-Israeli relation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Schweller Randal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9, No. 1 pp. 72-107.

Siddiqa Arhama & Abbas Muhammad & Hassan Asad Ullah Khan (2019). Saudi - Israeli Nexus: Implications for Iran. 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 in Ankara.

Stollman Elisheva (2004). Balancing Acts: The Gulf States and Israe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0:4, 185-208

Teitelbaum Joshua (2013). Saudi-Israeli relations: balancing legitimacy and security.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orrey Gordon & Devlin John (196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9, No. 1*, The Arab World: Paths to Modernization, pp. 47-62.

Ulrichsen Kristian (2016).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drivers and direction of chang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Weiss Martin(2017). Arab League Boycott of Israel.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Yamani Mai (2008). The Two Faces of Saudi Arabia. *Survival*, 50:1, 143-156.

Zanotti Jim (2012). Israel: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Zhao Weiming (2009). The New Middle East Polic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3:2, 12-24.

中文文獻

陳立樵(2019)，以色列史：改變西亞局勢的國家，台北，三民。

譚偉恩(2006)，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 第二十二期。

曾怡人&吳政燦(2009)。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一種比較的觀點。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五卷,第四期,頁 143-167。

網路資料

Gross Samantha (2017). The 1967 war and the oil weapon. 2019/12/1.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7/06/05/the-1967-war-and-the-oil-weapon/>

Gross Samantha; Riedel Bruce; Pita Adrianna (2017). The 1967 war, the rise of Saudi Arabia, and modern energy politics. 2019/12/1.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podcast-episode/the-1967-war-the-rise-of-saudi-arabia-and-modern-energy-politics/>

Matza Doron; Hoffman Adam (2019). *From taboo to cooperation: Israel is changing relation with Arab World*. 2020/12/16. LSE Middle East Center.

<https://blogs.lse.ac.uk/mec/2019/03/29/from-taboo-to-cooperation-israels-changing-relations-with-the-arab-world>

